

第 6 章

在華國鋒時期復出：1977–1978

1976 年 4 月華國鋒被任命為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後不久，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湯瑪斯·蓋茨（Thomas Gates）與華國鋒有過一次 1 小時 45 分鐘的會談。蓋茨手下的人根據會談寫了一份評價華國鋒的報告，上有蓋茨的簽名。這個報告頗有先見之明，它得出結論說，華國鋒是個「耳聰目明卻平淡無奇的人，他的突出特點是謹慎。他對材料掌握得還算充分，但沒有表現出絲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華看起來是一個理想的過渡人物，在內政外交領域都不太可能採取不同尋常的舉措。……我懷疑華缺乏長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領導能力，……我認為將會出現更有能力的新領導人，……單調乏味的華國鋒先生在完成他的歷史使命之後，將被迫靠邊站」。^[6-11]中國的幹部們絕不會有這樣的公開評論，但美國駐京聯絡處的官員無疑感覺到，他們中間也有人持類似觀點。

按中國政治史寫作中成王敗寇的悠久傳統，鄧小平一向被譽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者，華國鋒則因事事緊跟毛澤東的決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責。華國鋒過去一直在省一級工作，沒有北京的經歷，毫無外交經驗，在軍隊事務上也沒有多少資歷，這樣一個人登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確實有些勉強。華國鋒在會見外國人的第一年裏謹防出錯，因此不難理解，他只好空泛地講講政策，說些語焉不詳的話，喊幾句不會出問題的口號。華國鋒是個聰明的好幹部，但就整體能力和領導素質而言，他無法與鄧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張讓鄧小平先前屬下的老幹部全面復出，他也不能提供穩健而大膽的領導，或是像鄧小平那樣與外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後來的官方歷史對華國鋒脫離毛的路線的意願和支持中國對西方實行開放，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其實，在華國鋒當政的過渡期——從 1976 年 9 月毛澤東去世到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幫」，而且拋棄了毛的激進思想，減少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作用，更加強調現代化而不是階級鬥爭，將毛澤東時代不夠常規化的黨內會議轉為正常。華國鋒還派一個又一個代表團出國學習現代技術。是他——而不是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的經濟特區，並進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試驗。華國鋒確實想拖延鄧小平在 1977 年的復出，但他並沒有推翻鄧小平在 1975 年取得的進步，他贊成鄧小平 1977 年復出後採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動了國家的迅速開放，甚至因為在他的「洋躍進」中走得太遠而受到尖銳批評。^[6-21]

華國鋒的權威：有名無實

華國鋒的權威完全來自於毛澤東的選擇和他在黨政官僚體制中的官方職位。可是在 1976 年的中國，體制內的名義權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澤東位居黨政軍之首，統治了中國 27 年，使別人很難向他發起挑戰，但他權力的核心一直是個人性的。他的權威不是來自他的官方職位，而是源於他在領導革命取得軍事勝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對權力純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紀律嚴明的黨和受到控制的宣傳工具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華國鋒缺少毛澤東和鄧小平那種英雄般的革命經歷、宏大的歷史眼光、解決問題的穩健意識以及他們的沉著與自信。他對黨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瞭解；他當過公安部長，1971 年（獲邀參加政治局會議）和 1973 年（被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員）之後，他有大量機會瞭解全國的政治。但是，若論個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整體地位，他都難以跟那些經歷豐富的老革命家——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或李先念等人——相比。

毛澤東去世後，為了使華能夠治國，政治局給了他相應的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委主席。葉劍英及其同僚宣佈，黨應當加強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賴某個領導者的個人人格。早在 1950 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建立穩定的政權結構時，各部門便已制訂出各種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躍進這場災難後的 1960 年代早期和鄧小平領導下的 1975 年，中共又恢復了正常的組織程式，以限制領導人任意作出決定。^[6-31]然而，要使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組織結構取得像在西方國家那樣的法律效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級幹部在閱讀上面發來的文件時都知道，只要一出問題，上面又會造出新的文件，使過去的文件變成一紙空文。

在 1976 年底和 1977 年初，葉帥和汪東興努力樹立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以便加強其脆弱的個人權力基礎。華國鋒被捕「四人幫」取得的非凡勝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優秀幹部之上，也被大家廣泛慶賀。在 1976 年 10 月以後的幾個月裏，湧現出成百上千讚揚華國鋒領導的書籍和文章。^[6-4]大量歌頌他的領導的詩詞歌曲被創作出來廣為傳播，全國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畫像並排放在一起。當時電視尚不普及，但是從收音機和各個工作單位、農村的廣播喇叭裏，可以聽到對他領導國家的才能的歌頌。

不過，宣傳華國鋒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彈。很多曾為國家浴血奮戰的黨內革命老幹部，都瞧不起華國鋒這種 1938 年以後才入黨的年輕暴發戶，認為對他的大吹大擂既過頭又冒失。況且黨內不少有影響的領導人也不想看到個人崇拜，擔心這會破壞黨內民主。到 1978 年底時，華國鋒因為允許他人將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勢。人們對他並不信服，認為他的領導職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實際上並不具備與之匹配的個人威望。

華國鋒溫和的領導風格是他對北京這種環境的自然反應。不過他在湖南時就有這樣的名聲：和其他同級別的幹部相比，他是個謹慎的、瞻前顧後的人。^[6-5]人們覺得與他共事順心舒服，因為知道他不曾冒犯他們。誠然，華國鋒認為「四人幫」及其同夥做事太極端，但除了這些人以外，他盡量與大家搞好關係。

在 1949 年中共掌權之前，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已經花了 20 多年時間籌劃掌權之後應該做什麼，華國鋒卻幾乎沒有準備的時間。過去白手起家建國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寬廣的視野，為華國鋒和他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是學習如何貫徹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針。華國鋒在 1976 年 1 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為接毛澤東班的第一候選人之前，他對擔任最高領導人毫無準備。即便是在 1976 年 1 月成為代總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應付一些緊迫的問題——周恩來逝世、天安門事件、毛澤東之死、逮捕「四人幫」，幾乎無暇考慮重大的戰略問題。1976 年 10 月以後華國鋒面對這些重大的問題，就像剛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兩位元老臣——葉帥和李先念——的輔佐，而他們也願意為他出謀劃策。

華國鋒在 1976 年之前就認識葉帥和李先念，不過，在為實施抓捕「四人幫」的秘密計劃而結成相互信任的小團體之前，他與他們並無特別密切的交往。葉、李兩人像華國鋒一樣，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多大傷害，相對而言也沒有那些被罷官並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的情緒和怨恨。葉帥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屬於文革初期受到毛澤東打擊的當權派。李先念是「業務組」成員，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熱火朝天時，這裏的幹部一直在從事管理經濟之類的政府日常工作。華、葉和李在文革前就與老幹部有不錯的共事關係，而且他們三人都能同時與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幹部一起工作。

葉帥和李先念既不是整過人的激進派，也不屬於要求更多民主、在經濟領域進行更大膽嘗試的人。與此相反，他們打算協助華國鋒，以務實的方式在失去航圖的後毛澤東時代平穩航行。具體而言，葉帥能夠為華國鋒與軍隊的關係鋪路；李先念則能在經濟問題上為華國鋒提供指導。

華在毛的遺志和中國的開放之間尋找平衡

從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刻起，華國鋒就面對壓力要向激進派證明自己遵循著毛澤東的遺志。但後者不難看到，華國鋒雖然自稱毛的追隨者，卻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西方媒體報道說，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開始了一個「去毛化」過程，這給華國鋒造成了更大的負擔要去證明自己忠實於毛的遺志。

逮捕「四人幫」在黨的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中大快人心，但是這激怒了那些認為自己追隨的才是真正的毛主義的激進派。他們知道，毛澤東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黨內最高領導層為「四人幫」保留一席之地。這種異議使華國鋒和他的兩個老顧問葉帥和李先念處於守勢。他們得竭力證明抓捕「四人幫」與繼承毛的遺志相符。華國鋒搜集各種材料歷數「四人幫」的罪名，他下發的三份材料為逮捕「四人幫」符合毛的觀點提供了證據。

自從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一直宣稱自己在繼承毛的遺志，繼續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傳家和毛澤東的堅定追隨者，卻不斷批評他偏離了毛澤東為黨制定的路線。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華國鋒授意他的擁護者寫一篇理論文章，以證明他忠實於毛的遺志。由此而出籠的文章，便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社論。這篇社論宣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要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辦，此即後來著名的「兩個凡是」，它成了華國鋒表明自己完全忠實於毛主席遺志的標誌。^[6-6]華國鋒顯然沒有料到它會成為一些人攻擊的靶子，他們認為中國應當脫離毛在人生最後 20 年所奉行的路線。

對於華國鋒來說，為了在新時期全面領導國家，他需要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就像毛澤東在 1956 年召開八大、林彪在 1969 年召開九大、林彪死後毛在 1973 年召開十大一樣。一般需要數月時間才能制定出經濟計劃、在重要領域的政策上取得共識、為黨代會準備必要的文件。毛澤東剛去世不久華國鋒就立刻開始了這項工作，並於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開了黨的十一大，隨後又在 1978 年 3 月召開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領導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由於華國鋒在掌權之後召開的這次黨代會過於倉促，他只能把許多問題先放在一邊。在向十一大做的四個小時的報告中，他用意識形態和黨的套話來掩蓋政策分歧。但確實存在著一些需要領導人給予關注的實質問題，華國鋒也試圖對其中一部分作出說明。像周恩來和鄧小平一樣，華國鋒繼續強調四化建設。在選擇最可靠的經濟顧問時，他選的是「建設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緊擴大新的基建項目並從國外引進工廠的人，而不是較為謹慎的計劃派（cautious planners）和財政幹部（關於「建設派」和「謹慎的計劃派」詳見第 15 章）。華國鋒尤其倚重大慶油田的傑出領導人余秋里，讓他領導用更高的指標去充實鄧小平的十年規劃的工作。華國鋒也十分倚重國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澤東和周恩來在 1974 年 10 月就選他擔任了副總理。

最初，華國鋒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 年春天他在北京會見李光耀時，由於不瞭解中國的政策細節，他在回覆對方的意見和問題時，只能說些大而無當的套話和口號。但是接過毛澤東的位置後，他非常努力抓緊掌握外交政策問題：當 1978 年 8 月他率團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時，與 1976 年時相比，對外交事務已經有了更好的瞭解。

鄧小平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出國時，仍要受到毛的控制。與此不同，華國鋒在 1978 年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是 1957 年（毛澤東去莫斯科）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華國鋒回國後，對中國能向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學習什麼做了報告：這兩個國家都接受外國貨幣，與外國公司開辦合資企業，開展補償貿易，引進外國技術——所有這一切絲毫沒有損害兩國的主權。華國鋒表示，他在東歐看到的工廠論規模比不上中國的工廠，效率卻要高得多。結論顯而易見：中國應當以東歐為榜樣，引進更多的外國技術。

改進農村組織的問題，是華國鋒有豐富個人經驗的領域，他不但盡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開了幾次學大寨會議。大寨是被樹為全國農業集體化樣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生產勞動，並鼓勵興建大型引水渠這樣的農業工程項目。華國鋒把全面改善農業的希望放在技術上。和鄧小平一樣，他也要搶回被浪費的時間，加快發展，然而他在判斷取得這些進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設的速度上卻經驗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內（到 1980 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技術突破，這不過是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

鄧小平在 1978 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華國鋒對自己的冒進做法作了自我批評：他沒有考慮到中國外匯短缺，沒有能力迅速吸收國外技術，中國的預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例如，華國鋒鼓動余秋里考慮在幾年內開發十個大慶油田，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目標。但是，他要推動中國快速發展、加快引進外國技術的整體目標，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其他許多領導人是一樣的。

時常有人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包括願意學習國外經驗和急迫地想要引進外國技術——源於 1978 年 12 月鄧小平領導下的三中全會。其實這些做法始於 1977–1978 年華國鋒的領導，而華國鋒提出的政策也並非由他首創。華國鋒和鄧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幹部視為中國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鄧小平復出：1976 年 10 月–1977 年 4 月

鄧小平是否回來工作，以及回來之後幹什麼，從「四人幫」被捕那一刻起就是個議論紛紛的話題。黨的領導層一致認為鄧小平是個難得的人才，已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則把他視為他們認可的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公佈，香港和西方媒體就開始揣測華鄧兩人之間即將發生權爭。不過，在當時的中國，還無人敢向毛澤東挑選接班人或華國鋒擔任中共主席的權利提出嚴肅挑戰。當時的共識是，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華國鋒有權保留毛澤東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後的幾個月裏，高層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鄧小平回來後是讓他在華國鋒主席手下當總理呢——就像當年周恩來效力於毛澤東、或 1974 年鄧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樣，還是讓他成為頭號領導人？華國鋒的資深顧問葉帥和李先念主張讓鄧小平在某個時候回來擔任一定的職務，但是要在華國鋒的領導之下。逮捕「四人幫」後不久，李先念去看望當時在北京西山療養的鄧小平時，鼓勵他為回來工作作好準備。^[6-7]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擁立領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們支持鄧小平復出。^[6-8]

華國鋒從未明確說過不應讓鄧小平回來工作。但是他在 1976 年 10 月 26 日——「四人幫」被捕剛過兩周之後——作出指示，要繼續批判鄧小平及其讓更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即所謂的「右傾翻案風」）。^[6-9]

然而，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已經不再鼓勵批鄧了。鄧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對待，被認為要對「四五」抗議活動負責，很多幹部對此都有意見。華國鋒指示宣傳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還承認，參加抗議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反革命，鄧小平也沒有參與策劃此事。

1976 年 12 月 12 日出現了有利於鄧小平的另一個突破。葉帥收到他的長期部下、時任中聯部部長耿飆的一封信。耿飆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證明「四人幫」篡改天安門事件報告中的證據，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葉劍英立即對他的部下說，這個新的證據很重要，應當為「四五」事件平反。^[6-10]葉帥收到這些材料兩天後，鄧小平便重新獲准看中央文件。這時有很多人認為，鄧小平的復出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儘管葉帥仍在說時機尚不成熟。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問題，決定應當讓他重新擔任一定的職務。

《人民日報》的「兩個凡是」的社論——標題是「學好文件抓住綱」（「綱」指階級鬥爭）——在 2 月 7 日一發表，立刻就成為高層幹部爭論的焦點。假如毛澤東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麼對於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話。「兩個凡是」的社論刺激了批評華國鋒的人，而是否讓鄧小平復出則成為爭論的中心。《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後來說，「兩個凡是」一文堵死了讓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復出的道路，也使參加過「四五」天安門事件的人無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錯案無法得到糾正。^[6-11]鄧力群是奮起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之一，他把這個問題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請政治局給予注意。^[6-12]

按照慣例，在預定召開的黨代會之前要舉行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允許比較自由的討論，取得共識，以便獲得參加黨代會的人一致擁護。1978 年 11 月至 12 月召開的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加強了鄧小平的地位，鞏固了對將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會上得到批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2 日，在為籌備 8 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開始大聲疾呼。

在離中南海只有幾個街區的京西賓館召開的這次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會議議程：（1）研究處理「四人幫」的下一步措施；（2）討論 1977 年的經濟計劃；（3）籌劃 1977 年下半年黨的工作，包括提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6-13]

這是在毛澤東去世半年後，中共領導幹部召開的第一次大型座談會。但與 1978 年 11 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相比，1977 年 3 月的會議氣氛仍受到那些認為坦率討論毛澤東的錯誤還為時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問題上還是取得了共識：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文革轉向四化，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增加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間經受過身心折磨的老幹部與這一政治運動的受益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分歧。許多在文革中靠整人發跡的領導人，托庇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想讓權力落入受過打擊的人手中；已經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則更願意讓他們仍未獲准恢復工作的朋友回來。

這兩派之間的力量對比在 1972 年就已經開始向老幹部一方傾斜，毛澤東本人在這年年初開始允許開展平反工作。在 1975 年 1 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上，有 10 名在文革中受過嚴重迫害的人擔任了部長。^[6-14]這個趨勢一直在繼續。在 1973 年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77 年 8 月仍在世的 174 人中，有 59 人在十一大上沒有重新當選（其中很多是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在十一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 201 人中，除了 19 人之外，都是 1949 年以前入黨的老幹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變化更緩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個人都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但其中只有葉帥和李先念贊成讓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和汪東興則拖延著。

1977 年 3 月，華國鋒在向中央工作會議做的冗長報告中解釋了為什麼抓捕「四人幫」之後他還要繼續批鄧，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因此要繼續進行。」^[6-16]他暗示鄧小平不會完全擁護毛主席，並且又加了一句尖銳的話：「我們要記取赫魯曉夫的教訓。」^[6-17]人人都知道鄧小平經常被批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華國鋒想進一步維護毛澤東的遺產，他也意識到了處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極反應，因此對代表們說，對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然而他並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權威：陳雲和王震兩人廣受尊敬，論資歷和個人威望也遠在華國鋒之上，他們仍然敢於在自己的小組會上大膽直言，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

陳雲是個冷靜審慎的人，對黨一向忠心耿耿，他由於為黨作出的巨大貢獻而享有崇高威望。當時他在西南組做了有力的發言，倡議鄧小平復出。陳雲在準備自己的發言稿時一向很認真，他讓胡喬木撰寫草稿，發言之前，還在耿飆家中與王震等人見面，以便確定講話稿中是否還有任何可能的問題。他在發言中說：「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

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6-18]

「王鬍子」（王震）暴躁粗魯，但也是個講義氣的直脾氣，在很多忠誠的黨員看來甚至十分可愛。他在另一個小組也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他的發言援引毛曾經對鄧小平的讚揚，讓毛派的處境尷尬，極難反駁他。他引用毛的話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是個能幹的戰士，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王震接著又說，在 1975 年領導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期間，鄧小平貫徹執行毛的路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幫」做鬥爭的先鋒。王震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熱切盼望他早日回到黨的領導崗位上來。^[6-19]

在小組討論中很多人支持陳雲和王震的意見，可是負責整理會議報告的汪東興沒有把陳雲和王震的發言以及隨後的討論收進去。汪東興對他們說，只要修改一下發言，就可以收進會議簡報。陳雲和王震長期為黨工作，資格遠在汪東興之上，他們回答說，不把他們的講話收進簡報，那就隨你的便。他們未經修改的發言雖然未被收入正式簡報，但在會上會下廣為流傳。^[6-20]

開會期間，華國鋒對很多想為 1976 年 4 月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他承認，是「四人幫」在 1976 年 4 月壓制群眾悼念周恩來去世，鄧小平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人民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稱為「反革命事件」，並且說，有極少數參與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說，反擊右傾翻案風——人人都知道鄧小平贊成翻案——是正確的。^[6-21]

華國鋒意識到了人們普遍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時機一到，鄧小平的復出之路自然會暢通，但不必操之過急。不過，華國鋒對鄧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讓步，他說，（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將在這一年夏天舉行）適合作出讓鄧小平復出的正式決定。

在發生著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華國鋒力求掌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以便加強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4 月 7 日，中央傳達了華國鋒關於如何學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澤東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一段話。一周後的 4 月 15 日，經華國鋒正式批准，《毛選》第五卷出版。^[6-22]但不論華的指示還是《毛選》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們對鄧小平重新擔任要職的不斷增長的支持。

在這期間，鄧小平明確表示他不支持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在 4 月 10 日寫給華國鋒、葉帥和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中，鄧小平表明了他對那篇有爭議的社論的看法。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6-23]鄧小平以這種聰明的說法承認了毛澤東的權威，但實際上他是在說，華國鋒並不是解釋毛澤東的觀點的唯一權威；任何具體問題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裏去看待，而與華國鋒相比，那些長期跟毛澤東一起工作、與毛關係密切的中共領導人，更有資格從這個「更大的背景」對毛的觀點作出判斷。鄧小平隨後感謝中央為他洗清了名聲，承認他沒有參與天安門事件。他說，至於他個人的工作安排，「做什麼，什麼時機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他還建議把他這封信，連同 1976 年 10 月 10 日他寫給華國鋒表示支持其領導的信一起，印發全黨。^[6-24]

華國鋒在收到鄧小平的信時意識到，必須對日益高漲的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力量作出回應，於是他派忠實於自己的高層幹部汪東興和李鑫去跟鄧小平商量他復出的事。^[6-25]此時華國鋒已經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動的積極意義，因此鄧小平對自己的好友說，他堅信天安門事件不久就會被看作一場革命運動。^[6-26]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沒有心情滿足汪東興和李鑫兩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為他的復出作準備時，他要肯定「兩個凡是」。鄧小平告訴他們，如果把「兩個凡是」奉為教條，為他平反的事就說不通，對天安門廣場示威的肯定也說不通。^[6-27]

鄧小平又解釋說，不能把毛澤東在某個場合做的事拿來解釋他在不同場合和時間做的事。毛澤東本人也承認自己犯過錯誤，不管什麼人，只要做事就會犯錯誤。一個人能做到七分正確就很不錯了。鄧小平說：如果我死後人們能給我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足了。^[6-28]

人們估計鄧小平為了重返工作崗位，會寫信公開表示接受華國鋒的領導。鄧小平也遂了他們的心願。他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的信中就已說過：「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6-29]4 月 14 日鄧小平對信作了稍許修改後，華國鋒同意將其印發黨內。5 月 3 日這些信在黨內印發，一直下發到縣團級。^[6-30]華國鋒一度盡可能合理地拖延鄧小平的復出，但最終，當鄧小平寫信表示接受他的領導後，華還是向勢力強大的老幹部所形成的氣氛作出了讓步——他們都希望鄧小平回來。

雖然直到三中全會才正式宣佈鄧小平的復出，但是印發他讚揚華國鋒領導的信等於向黨內中層以上幹部發出通知，鄧小平的復出已是指日可待。^[6-31]黨內人士對飽經考驗的鄧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認為他能在維護秩序和實現現代化上發揮重要作用。黨內人士也在私下議論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將來的關係，外國媒體則在公開討論此事。

到 5 月 12 日時已經很清楚，鄧小平將恢復的一切職務，包括接過軍隊和外交工作。他將像過去一樣擔任副總理。鄧小平還自告奮勇承擔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為在他看來科學是四個現代化中最關鍵的一環，能夠促進另外三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和國防）。鄧小平的請求被接受後，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討論如何促進科技發展的問題。^[6-32]在中國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必須首先對付一些殘留的反知識分子觀點。他對方毅和李昌說，必須強調要把腦力勞動者也視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階級的成員。^[6-33]

5 月 24 日，鄧小平為了給自己的復出作準備，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鄧力群請到家中，討論恢復他的寫作班子以及如何促進科技和教育的發展。鄧小平依然很看重他當年網羅到政研室的那個寫作小團隊，他要跟其中一些過去的成員初步討論一下如何組建寫作班子。在批鄧運動中，有為數極少的人極其堅定地不參加批判，鄧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為此受到了懲罰，被下放農村從事勞動。鄧力群帶來了鄧小平寫作班子前負責人胡喬木的一封檢討信，胡為自己參與批鄧表示道歉。鄧小平沒有看那封信，而是讓鄧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說，胡喬木的批評我不介意，胡喬木只是講了一些套話，這可以理解；沒有必要為這種裝樣子的事道歉。鄧小平還稱讚胡喬木為毛澤東起草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此文已收入《毛選》第五卷）。他說，他歡迎胡喬木回到寫作班子。

葉帥和鄧小平見面後，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負責軍隊工作。鄧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 1975 年要解決的問題：推動裁軍，徵召受過更好教育的兵員，改進訓練和紀律，提升軍事科學技術，使軍隊為現代戰爭作好準備。他在軍隊會議的講話中這些仍是中心話題，但他也講到了更大的政治問題：要「實事求是」。^[6-34]不過，他用於軍隊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鄧小平也沒有把很多時間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參與重要決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擔對日常外交工作的領導，他說那讓他感到厭倦。鄧小平還說，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認為這是現代化最重要的領域。

鄧小平估計，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落後世界 20 年。例如，他提到中國當時大約有 20 萬名科技人員，而美國是 120 萬。他說，為了急起直追，中國必須承認自己已經大大落後，也要著手培養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 1975 年支持的政策，他說，必須通過考試選拔中小學的尖子人才，讓他們在最好的大專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鄧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會很快就在關鍵的政治領域挑戰華國鋒。但是，為了促進科學的發展，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觸及仍然敏感的政治問題。與那些堅持「紅」比「專」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膽宣佈，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科技人員也是有用之人，軍隊也需要培養人才。^[6-36]

鄧小平的復出

7 月 17 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議需要得到一個月後召開的黨代會的正式批准，但鄧小平在全會上已正式恢復了他在 1975 年 4 月 5 日以前的全部職務：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鄧小平排名第三，位於華國鋒和葉帥之後，李先念和汪東興之前。^[6-37]

7 月 21 日，在實際上是他的復職演說中，鄧小平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沒有人對鄧小平的選擇感到驚訝：他是想做點工作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去世後依然揮之不去的大氣候，鄧小平在規劃自己的事業時仍要當心。他首先重複了一句套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然後他才談到他認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其次是黨的建設。他再一次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教導要有靈活性。他說，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話與當時的情況割裂開來，說它們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合，但毛澤東對不同的情況是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的，必須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把他的教導正確運用於每一種實際情況。他還說領導集體要促進黨內民主。^[6-38]四年後鄧小平的權力得以鞏固時，批評者說他對黨內民主已經不感興趣，而是把權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

7 月 23 日，鄧小平講話兩天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社論宣佈了他的新職務。社論說：「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體現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願望。」^[6-39]民眾在 1976 年清明節

時的感情宣洩和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辯論，都證明這句話並非誇大其辭。鄧小平復出之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在 7 月 30 日大陸和香港之間的一場足球賽上。當廣播喇叭宣佈他來到體育場時，全場起立對他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6-40]老百姓顯然覺得，鄧小平扎實穩健的領導讓他們放心，基於他在 1975 年取得的成績，他讓他們感到有希望。

在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們歡迎鄧小平的復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對此感到不安。當時代表們對於如何看待毛的歷史遺產，以及實行哪些具體政策，仍未達成明確的共識。黨的領導層試圖掩蓋分歧，展示團結，採用了一些肯定毛澤東遺產的口號，也泛泛地提到了現代化目標。大會宣佈文革已經結束，但也肯定了它的意義；儘管中國要學習國外的新技術，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要繼續批判右傾主義。一些代表在小組會上表達了對華國鋒領導的不滿，因為他在四個小時的報告中用套話來掩蓋分歧。當然，大會文件並沒有把這些批評意見記錄在案。^[6-41]

為迎合政治氣氛，鄧小平也講了一些套話，以便安撫那些仍然堅持毛澤東路線的人。他在 8 月 18 日簡短的閉幕講話中說，大會要「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群眾路線」。但是他也試圖創造一個更加靈活的空間。他又說：「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6-42]鄧小平談到毛的「真正路線」，以此表明他忠於毛澤東；但也強調「實事求是」，這就為自己留出了迴旋餘地，使他可以採取符合當前形勢需要的政策，主張毛的具體教導不會自動適用於一切情況。

鄧小平此前在 8 月初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作出保證說，他將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工作。他借用了一個軍事術語，把自己的工作稱為搞「後勤」。代表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為司令員華國鋒當助手。具體來說，他要「協助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6-43]鄧小平不想威脅華國鋒的領導，至少暫時不想。

事必躬親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閉幕幾周後，鄧小平在對教育部幹部的一次講話中說：「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6-44]鄧小平打算繼續 1975 年他在胡耀邦幫助下開始的工作，重新贏得科學家的好感。1977 年他對一名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科學家說，只要「馬克思不召見」，他打算在科技領域幹十年。他說，他希望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大見成效。^[6-45]

鄧小平知道中國亟須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水平，但他關注的是更高的目標：能夠取得科學突破，推動工業、農業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研究。在他看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6-46]

鄧小平不斷會見獲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提問的焦點始終如一：中國能為提高自身的科學水平做些什麼？鄧小平對科學在中國的復興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種近乎著魔的信念，並因此批准了一些相關項目。有人問過他，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剛剛開始，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搞離子加速器？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必須向前看。

1957 年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時，鄧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本能地厭惡知識分子。毛把他們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再想方設法羞辱他們，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鄧小平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但是他曾走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這條路，盡過最大努力想進一所法國大學唸書。他的妻子曾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學物理學，他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上大學，一個在北大學物理，一個學醫，還有一個女兒因病不勝課業繁重的理科轉而學了藝術。此外，鄧小平逐漸認識到，打擊知識分子是在摧殘中國的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是國家現代化的根基。1973 年回到北京後，他再也沒有像在 1957 年那樣整過知識分子。有些領導人還會不時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鄧小平不再如此。他認為科學沒有階級屬性，可以為所有階級和所有國家所用，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鄧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國科學水平的計劃：

要從科技系統中挑選出幾千名尖子人才。這些人挑選出來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裏有老人孩子，一個月工資幾十元，很多時間用於料理生活，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他們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6-47]

鄧小平認為，當中國需要青年知識分子推動科學發展時，把他們送去參加體力勞動是嚴重的浪費。雖然他沒有用過「精英治國論」的說法，但其實他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為他們提供條件，使其能夠為國家貢獻最大的才智。

鄧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當他對知識分子待遇表示不滿時，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講「四人幫」。他說，必須擺脫「四人幫」的惡習，不要搞給知識分子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棍子公司」。^[6-48]

鄧小平復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認為，建國後的前 17 年（1949 年到 1966 年）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政策，應當進行批判。鄧小平復出前夕，在 1977 年 6 月於山西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與會者就未來的政策究竟應該以文革期間、還是文革之前的政策為基礎展開了熱烈辯論，辯論的結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間的政策作為指導。^[6-49]很顯然，鄧小平任重而道遠。

鄧小平後來上了年紀，開始減少工作量，但 1977 年復出時，72 歲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於工作。鄧小平一般只抓大事，只對他認為的頭等大事才會事必躬親。在 1977 年到 1978 年他認為科學和教育就是頭等大事。他第一次談到這項工作時說：「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6-50]

鄧小平不斷會見各地領導，駁斥激進派對待知識分子的觀點，就如何養成尊重人才、促進國家進步的新風氣提出具體建議。從 1977 年 7 月 27 日開始，即三中全會正式讓他分管科技工作還不到一周，他用數天時間與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副院長李昌和教育部長劉西堯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向他們提出加快科技現代化的工作計劃。鄧小平說，現在的計劃還遠遠不夠，要把各專業最有學問的科學家列一個名單，確保他們得到必要的設備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工作。1964 年和 1965 年畢業的大學生仍沒有合適的工作的，要給他們安排更好的工作。^[6-51]鄧小平又說，對那些去海外留學的中國學者，要想辦法鼓勵他們回來，即使不想回來，也要把他們當作愛國人士，請他們回來講學。學者要搜集國外的教科書，用來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須做到簡明扼要。教育部要選出水平最高的學校，通過考試錄取分數最高的學生。鄧小平還說，要把國防科技作為整個科學規劃的一部分，幹部不必擔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發生重疊。^[6-52]

如今，鄧大司令成了事必躬親的人。他下達命令，並對執行命令的幹部說，我們不要「放空炮」。^[6-53]儘管鄧小平言辭堅定，但反對的勢力依然強大，因此在 8 月 3 日至 8 日有三十幾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駁當時仍佔上風的觀點，該論點將教育視為「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他認為，不能再置理論專家於不顧，只讚揚那些生產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在鄧看來，從生產單位固然可以選出一些科學家，但是從事尖端科學和基礎研究的大多數人肯定是出自大學。要想培養優秀的科學家，必須從小學就打好數學和外語基礎。大學應當減少校辦工廠的數量，增加實驗室。^[6-54]

鄧小平認為，應當把中國一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送到國外留學，他為此設立了出國留學計劃。他堅信，發明了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中國有大量的聰明人。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落後，必須向西方學習。為了向國外學習，中國可以購買其他國家的教材（用來改進中國的教科書），派學者去海外學習，邀請外國科學家來華訪問。

9 月份，已經是鄧小平敦促教育部幹部採取行動兩個月以後，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撓。毛澤東曾說部隊裏的人都怕鄧小平，現在鄧大司令又把槍口對準了教育部：「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要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贊成的，就改行。」^[6-55]他又說教育部還需要 20 到 40 個人：「要找一些 40 歲左右的人，天天到學校裏去跑。搞 40 個人，至少搞 20 個人專門下去跑。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下去當『學生』，到班裏聽聽課，瞭解情況，監督計劃、政策等的執行，然後回來報告。……不能只講空話。」^[6-56]

通過推行受學術界熱烈擁護的政策，鄧小平重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好感——他曾因 1957 年領導反右運動而在他們中間失去人心。這種好感對鄧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處，因為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為宣傳部門起草文件，給報刊寫文章。儘管他們要在領導人劃出的界線內工作，但仍有機會巧妙地潤色文件和講話——它們隨後會出現在報刊、廣播和電視中。有這些人的支持，對鄧小平有益無害。

恢復高考

不論對鄧小平還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質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恢復高考。鄧小平早在復出之前就認為，好的學校錄取學生，不能根據「階級出身好」和「思想覺悟高」（這是毛的標準），而應根據學習成績，必須通過有競爭的入學考試加以判定。1950 年代的孩子是在學校進行考試，但成績高低並不十分重要——幹部們不想令成績較差的農民和工人子弟難堪，因為其分數大多不如地主和資產階級子女，後者在 1949 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

1970 年代初，一些大學在小範圍內恢復教學後，也不是根據考試分數，而是根據工作單位的推薦，接受「階級出身好」的工農兵子女。幹部們固然不能明目張膽推薦自己的子女，但他們可以寫信推薦別人的孩子，再讓別人推薦自己的孩子。「階級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試成績不錯，那些關係硬但能力不濟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學校錄取。推薦制度變得徹底腐敗。

鄧小平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問題。他強烈感到，越早恢復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入學考試，越能使中國領導層盡快著手改善國家的教育。鄧小平尤其想恢復文革期間被終止的「大專院校統一入學考試」。但是在 1977 年 8 月 3 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正在制定的大學秋季開學計劃中錄取學生仍然是根據推薦。在秋季學期開學前的幾周之內還有可能恢復高考嗎？當這個問題在座談會上提出來時，鄧小平轉身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是否還有可能。從劉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鄧小平就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在 1977 年舉行高考。他在會議結束前宣佈：「應當結束推薦制度，直接從高中錄取學生。這是一個能夠迅速培養人才、見效快的好辦法。」^[6-57]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並非易事。要確定考試科目，挑選出考題的人員，公佈考試計劃，為數百萬人舉辦考試，組織和完成評分，確定哪些大學招生以及錄取多少學生——這是一項令人矚目的任務。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學的開學時間比預期晚了幾個月，也不是事事順利，但確實重新開學了。

1977 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從未在一年內開過兩次會。8 月 13 日，鄧小平作出決定沒過一周，他們就為籌備秋季入學考試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對他的政策變化作了進一步解釋：「過去我……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6-58]鄧小平指示說，當年進入大學的學生，要有 20% 到 30% 直接從高中錄取，將來大部分學生都要直接來自高中。是要對學生進行熱愛勞動的教育，但不必讓他們中斷學業。他正式下令在 1977 年舉行全國統一高考。但有些幹部抱怨說，這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辦到。鄧小平不耐煩地回覆：政策已定，就在 1977 年舉行高考，不能再變。^[6-59]根據會議內容準備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 10 月 5 日進行討論並予以批准，10 月 12 日經國務院同意後，刊登在 10 月 21 日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刊登了如何報名參加考試的說明。^[6-60]

共計約 578 萬在過去十年裏達到上大學年齡的人——其中很多人當時仍在農村勞動——在那年冬天參加了高考，但大學的錄取名額只有 27.3 萬。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參加高考者的實際錄取率只有 5.8%。^[6-61]自中共統治中國以來，大學第一次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因素，錄取完全根據考試成績。

對大學來說，即使最終在年底開了學，為迎接新生作準備仍然是一個負擔。要把已在大學安營紮寨的「工宣隊」請出去，要抓緊修好年久失修的設備，已經多年無法從事專業研究的老師要編制課程、準備教材。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抱怨說，由於大學倉促上陣，生活條件和授課經驗都不盡如人意。按一些學生的說法是：「80 年代的學生，用著 70 年代的教材，聽 60 年代的老師上課。」

鄧小平在 1977 年採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給中國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一樣，中國的高考提高了大學生和就業人口的素質。^[6-62]尤其是在恢復各級教育的考試之後，望子成龍的父母都開始為自己的獨生子女（因為城市人口只允許生一個孩子）學好數理化和外語而操心，希望他們能進入重點小學、中學和大學。中小學也開始為學生參加考試作準備，使他們能夠在教育階梯上更上一層樓，大學則開始幫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好的教育。

落在後面的人——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失落的年輕人中未能通過考試、或考分不夠上重點學校而只能就讀一般學校的人——對這種新制度未必高興。但是，很多考試過關的人，以及重視教育素質的人——父母、老師和用人單位——一直萬分感激鄧小平迅速恢復高考和堅決提高教育質量的做法。

推動科學進步

鄧小平在 1977 年復出不久後便說：「我總覺得科學、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6-63]儘管有胡耀邦在 1975 年的不懈努力，很多知識分子並未獲准回來從事有用的工作，因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學家與批過他們的年輕造反派之間仍然存在著尖銳衝突。科學家就像大學教師一樣，生活條件仍很惡劣。

科研人員幾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單位從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間被派到大學「支左」和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宣隊和軍隊，仍然佔據著校園並對科學家發號施令。鄧小平認為這種局面太不像話。他宣佈：「工宣隊的問題必須解決。他們和派去『支左』的軍隊都要撤出來，沒有任何例外。」^[6-64]

鄧小平對科學家不斷發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應。科學家們認為專業工作應當由內行來領導。鄧小平作出指示，每個科研單位要有三個最高負責人，黨的領導抓全面的政策，但單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給懂科研的人領導，還有一名領導要管「後勤」，負責改善生活條件，保證科研人員的工作有充足的供應。鄧小平知道知識分子對仍要花大量時間參加勞動和政治學習感到不滿，因此作出一條規定：科技人員每週六個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於基礎研究。

由於國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銷，1977 年時沒有一個全面管理科學研究的部門。需要優先考慮恢復哪一些領域？如何培養人才以滿足不同領域的需求？對此，鄧小平 1975 年曾讓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小組起草有關科學發展的文件。但他在 1977 年又指示說，要重建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便協調科學發展的工作；還要制定一個七年規劃，取代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 年–1985 年）中有關科學的內容。1975 年按鄧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進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文件又被拿了出來，成為新規劃的基礎。

1975 年的規劃可能是鄧小平的起點，但是在賦閒期間，他對國家的夢想又有所提高。他認為，中國已經增加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這使規劃的制定者能夠、也應該為科學發展確定比 1975 年更高的目標。為了雄心勃勃的新戰略，他不斷從傑出的美國華裔科學家中尋求建議，並且與全面負責科學和教育發展的政治局委員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國家科委被指定負責抓工業、軍事和其他部門的科學發展，但他們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大學以及獨立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尤其是中國科學院和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6-65]

與社會科學相比，鄧小平更加重視自然科學，但是他相信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對不同社會的研究——也是引導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 年 5 月，華國鋒同意了根據鄧小平 1975 年的指示成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1977 年秋天中國社科院成立時有 2,000 人，鄧小平復出後指派 1975 年擬定這項計劃的胡喬木擔任了第一任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了直屬國務院領導的部級單位。^[6-66]它獨立於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對擺脫宣傳的壓力，學者們得以集中精力從事研究，不必去做傳播現成知識這種相對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學發展七年規劃的初步方案包括 108 個項目，提交給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科學大會的開幕詞中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說法曾在 1975 年給他帶來麻煩，毛澤東認為這是把科學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然後他介紹了從美國華裔科學家那裏學到的東西。他說，世界上正在進行一場科技革命，出現了一些全新的領域：高分子、核能、電子計算機、半導體、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後鄧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撫並提醒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聽眾說，勞動總是與科技知識聯繫在一起的，科學的進步具有普遍性，可以為全人類所用。鄧小平承認，一些科學家有必要從事工程學之類應用領域的研究，這可以使工業自動化等領域加快進步。但是他關注的重點是科學，他一再強調要學習國外的尖端科學。^[6-67]

鄧小平的講話表明他得玩點花樣——在與專家共同制訂該領域具體發展規劃的同時，還得打一場政治戰。甚至在領導挑選項目及計劃工作時，他也必須繼續挑戰一些舊式毛派領導的認識。他說，科學十分重要，應當把它看作生產力，應當把腦力勞動也視為勞動，要允許科學家專心從事專業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動的干擾。他雖然沒有提到「紅」與「專」哪一個更重要的爭論，但他的回答是明確的：「專」更重要。為了能讓專家去做對實現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隨時準備打一場政治戰。

1977 年 7 月鄧小平恢復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後，他的正式排名在華國鋒主席之後。但作為總參謀長，他要負責軍隊的規劃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領導軍隊的經歷，他要維持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權，以免落入華國鋒手中。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希望軍隊的領導幹部嚴格服從自己，他也隨時準備要求他們嚴格服從。軍隊很清楚鄧小平與華國鋒相比，對軍隊握有更大的權力。

「實踐標準」挑戰「兩個凡是」

中央黨校在 1977 年重新開學後，很快就成了黨內立意革新的學者和學員的一個中心。研究黨的理論和黨史的學者從 1977 年 3 月開始工作，學校則是在 10 月迎來它的第一批學員。這一級學員共有 807 人，其中大約有 100 名學員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選送的特別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幹部。他們要在一個「高級班」學習半年。^[6-69]

在頭幾批畢業後有望躍升要職的學員中，有一種特殊的興奮感。高級班的 100 名學員中，大多數人都在文革中受過罪，他們既想分析過去 20 年出了什麼問題，也想討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當然，這些學員的批評和設想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界限之內，他們對各種新思想持十分開放的態度。黨校的教員和研究人員也分享著他們的熱情，急切地想為確定新時期的理論和政策方向作出貢獻。^[6-70]

這種探索新思想的願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黨校的名義校長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但是作為第二副校長的胡耀邦要比他們更經常地到學校裏來，對學員、教師和他們的思想也有著更大的興趣。他鼓勵新思想，教師學員對他的鼓勵也反應熱烈。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黨內創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幹部也偶爾放下日常工作，來這裏跟教師和學員一起探討新思想。

第一批學員來到中央黨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 7 月 15 日創辦了一份名為《理論動態》的期刊，它只供一小批高級幹部閱讀，旨在探討新思想，提出新解釋，在形式上要比黨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幾天就出一期的帶有序號的簡報，不對外發行，只供內部傳閱；但是它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因為它代表可以被黨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沿。

《理論動態》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出了第 60 期簡報，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6-71]該文已經醞釀了數月，是由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胡福明、中央黨校理論教研室孫長江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是中央黨校 1977 年秋季入學的學員——數易其稿而完成。^[6-72]楊西光在 1978 年初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他一向注重為讀者提供新思想，在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報》上轉載了這篇文章。為安全起見，文章的署名是「特約評論員」。5 月 12 日《人民日報》和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也轉載了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

這篇文章認為，評價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眾廣泛的社會經驗。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而是必須根據經驗不斷重新作出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某些情況下，對真理的認識有可能出錯，但是如果經驗表明它是錯誤的，就應當加以改正。這樣一來新的經驗和實踐可以帶來新的理論。如果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現有表述帶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災難，也應當加以糾正。^[6-73]

文章問世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讀者大加讚揚，但是政治局中負責抓宣傳工作的常委汪東興和《人民日報》前主編吳冷西卻十分惱火。一周前的一篇題為「按勞分配」的文章就曾讓汪東興光火，他要求查清發表這篇文章得到了哪位中央領導的同意（後來他才知道是鄧小平及其部下支持這篇文章）。

胡耀邦和幾位自由派幹部利用了一項規定的空子，才使這篇文章得以面世。這項規定是，《理論動態》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文章，可以不經汪東興及其手下人的常規審查就由報紙轉載。^[6-74]否則，汪東興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馬在文章見報前就會將其扼殺。汪東興和吳冷西準確地意識到，此文是在鼓勵對他們所信奉的正統毛澤東思想提出質疑：如果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造成了災難，那就應當加以拋棄。汪東興和吳冷西也正確認識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的人——華國鋒和汪東興。汪東興認為，沒有共同的信條就無法維護黨的團結，他親自給胡耀邦打電話，批評他同意發表這種文章。^[6-75]

鄧小平後來對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發表時，他並沒有注意，爭論熱起來以後他才找來看。他說，這是一篇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文章。他表揚了胡耀邦組織的《理論動態》理論班子，並且說應當讓它繼續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東興等領導人搞好關係，鄧小平安慰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因為另一些領導人支持「兩個凡是」而發生一點鬥爭也是難免的。鄧小平在爭論的關鍵時刻給予了支持，這讓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沒有這種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許會心灰意冷地屈服。^[6-76]

「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這兩篇文章成了磁鐵的兩極，各自吸引著持有兩種不同觀點的人。雙方的爭論暴露和加劇了華國鋒支持者和鄧小平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前者擔心正統思想鬆動的後果，後者則要極力擺脫頑固僵化的教條。辯論使用的是意識形態語言，其熱情卻是源於政治背景。在中共內部，公開直接批評領導人一向屬於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華國鋒，文革的受害者則普遍支持鄧小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團結了這樣一批幹部——他們認為華國鋒不足以擔當領導國家大任，但又不敢明說。它也有助於軍隊領導人站到鄧小平一邊，其中包括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極為幹練的領導人，曾與鄧小平共事多年。^[6-77]在此後的幾個月裏，隨著圍繞兩篇文章的論戰如火如荼地進行，它也日益成為雙方的一場政治鬥爭：一方贊成「實踐是唯一標準」，認為鄧小平才是最好的領導人；另一方則堅持「兩個凡是」，擁護華國鋒。攤牌似乎無可避免。

[6-1]U.S. Dept. of State, "Ambassador Gates' Discussion in Peking," DNSA, doc. CH00407, Secret, Action Memorandum, April 22, 1976.

[6-2]對華國鋒當政兩年的深入分析，見程美東：〈1976–1978 年中國社會的演化：兼論華國鋒的時期政治環境的變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學習與探索》，2008 年第 6 期，頁 32–41。感謝孫萬國提供給我的有關華國鋒支持改革的證據。

[6-3]在另一些層級和部門，例如經濟部門，個人權力仍然很大。參見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該書有中譯本：《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華爾德著，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中文版編者註)

[6-4]葉劍英的傳記作者認為葉在籌劃逮捕「四人幫」上起著首要作用。一些黨史研究者相信葉的作用大，另一些人則認為華的作用大，泰偉斯和孫萬國研究了這些看法後認為華的作用更大一些；他是領導人並採取了主動。見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7), pp. 591–594. 類似的結論見高原明生：〈現代中國史の再検討——華國鋒と鄧小平、そして 1978 年の劃期性について〉（再論中國現代史：華國鋒與鄧小平，及 1978 年之劃時代意義），《東亞》，2008 年 9 月，第 495 期，頁 32–40。

[6-5]例如參見于光遠：〈我對華國鋒的印象〉，《領導文萃》，2008 年第 16 期，頁 68–70。

[6-6]「兩個凡是」有多種英文翻譯，作者採用的是 SWDXP-2 一書第 137 頁中所用的官方譯法。

[6-7]2005 年 10 月對程中原的採訪。

[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6 年 10 月逮捕「四人幫」以後。

[6-9]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3.

[6-10]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1976 年 12 月 12 日。

[6-1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331–332。

[6-12]2005 年 10 月對程中原的訪談。

[6-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 1447–1450。

[6-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38–240.

[6-15]程美東：《1976–1978 年中國社會的演化》，頁 34。

[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43。

[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44。

[6-18]《陳雲傳》，下冊，頁 1447–14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77 年 3 月 17 日。陳雲對上海代表團也說過同樣的話，見《陳雲年譜（1905–1995）》，1977 年 3 月 13 日。另參見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4。

[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

[6-20]《陳雲年譜（1905–1995）》，1977 年 3 月 17 日。

[6-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頁15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5–46。

[6-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4月7日，頁156–157。

[6-23]鄧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的三中全會上更全面地闡明了這些觀點。見他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

[6-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10日，頁157。

[6-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10日後，頁157。

[6-26]例如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收入于光遠等編：《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頁230。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6。

[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59–160；SWDXP-2, pp. 51–52.

[6-29]〈中發十五號——鄧小平致華國鋒的兩封信（一）〉（1977年5月3日，鄧小平由汪東興轉華國鋒），未出版文件，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6-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4月10日，頁157。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20日，頁156。

[6-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頁157–159。

[6-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頁157–159。

[6-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頁53–87。

[6-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59–161；SWDXP-2, pp. 53–54.

[6-3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86–96。

[6-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SWDXP-2, pp. 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

[6-4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30日；與一些當時在場者的交談，無日期。

[6-4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0。

[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1977), pp. 189–195.

[6-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4。

[6-44]SWDXP-2, p. 82.

[6-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10月10日，頁221–220。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 54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60–161。

[6-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5。

[6-49]吉偉青：〈教育戰線推翻「四人幫」兩個估計前後〉，《炎黃春秋》，2003年第5期，頁40–42。關於鄧小平在1997年努力推動教育的概述，見夏杏珍：〈鄧小平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50–58。

- [6-50]SWDXP-2, p. 85.
- [6-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7日，頁166。
- [6-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1日，頁169。
- [6-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9日，頁167。
- [6-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4日，頁172–173；另見他在1977年8月8日的講話；英文版可見於SWDXP-2, pp. 61–72.
- [6-55]SWDXP-2, p. 82–83.
- [6-56]SWDXP-2, pp. 83.
-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5–56；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湖南電視台，2004）。
- [6-58]SWDXP-2, p. 82.
- [6-59]第3集《破冰》。
-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6–77。
-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7。
- [6-62]這遵循了日本、南韓、臺灣和東亞各國的社會模式，那些地方的統一高考也起著類似作用。參見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 [6-63]SWDXP-2, pp. 64.
- [6-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9月19日，頁204。
-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1977年8月8日有關教育和科學的講話中有闡述，見SWDXP-2, p. 61–72.
- [6-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223–230。
- [6-67]SWDXP-2, pp. 101–116.
- [6-6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4–165。
- [6-69]對中央黨校和其他黨校的概述，見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 [6-70]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另參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49–61。
-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譯應是："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 [6-72]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 [6-7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m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
- [6-75]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2。
- [6-76]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7–1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7月22日，頁345–346。
- [6-77]馬立誠、凌志軍：《交鋒》，頁41。

第 7 章

三個轉折點：1978

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岩倉使團」。從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的 51 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 15 個不同的國家。這個考察團由當時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員之一的宮廷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隨行官員來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門：工業、農業、採礦業、金融、文化、教育、軍事和治安。岩倉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這些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這令他們眼界大開，認識到日本不但要引進新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這次出訪，讓使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的落後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對如何進行變革形成了共識。這些官員沒有因所見所聞而沮喪，反而在回國後充滿幹勁。他們對日本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熱衷於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團進行更細緻的考察。

中國派出的官員考察團，沒有一個像岩倉使團那樣考察了如此長的時間，但是從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高層官員分別進行的考察訪問，也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類似的影響。鄧小平在 1975 年開創性的五天訪法之行為中國樹立了一個先例，當時陪同他的有負責工業、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層幹部，他們分別對各自的領域進行考察。鄧小平回國後對出國考察的益處深信不疑，開始鼓勵另一些考察團出國。他批評其他幹部不明白中國有多麼落後，並堅信走出國門能打開他們的眼界。華國鋒曾率團出訪過東歐，回國之後也成了派團去現代國家考察的支持者。

過去幾百年裏，中國人也曾去過西方，並為中國帶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紀的翻譯家王韜從倫敦回國後，曾著文大力推崇中國可以從西方現代化中學到的東西。^[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點在於，身居要職的幹部們一起出國考察，並且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堅定支持下，他們得以大規模地採用所學到的東西。

鄧小平訪法歸國和毛澤東去世之後，將出國願望壓抑已久的幹部們終於有了新的機會。多年來一直告誡群眾資本主義如何悲慘的官員們，開始爭先恐後地親自去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已退休的老幹部也爭相走出國門，把這當作對他們多年獻身於共產主義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補償。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出國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到 1978 年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後，很多高級幹部第一次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這一年裏有 13 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 20 次，共訪問了 50 個國家。^[7-2]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倉使團一樣，他們回國之後也對所見所聞異常興奮，對國家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團進行細緻的考察。

鄧小平在 1978 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7-3]在他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訴那些為他起草啟動改革開放政策講稿的人：「基本的要點是，必須承認自己落後，我們的很多做法都不對頭，需要加以改變。」^[7-4]出國考察使很多高層幹部更加相信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中國必須改弦易轍。

1978 年中國所派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是當年春天組織的四個考察團，他們分別去了香港、東歐、日本和西歐。從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喬石和于光遠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7-5]他們考察了工廠、農莊和科技部門，回國後就中國可以採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7-6]但更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之後，中國領導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稱為「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批判脫離正確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時使用的罵名。中共領導也同南斯拉夫共產黨恢復了關係。^[7-7]這些變化擴大了中國能夠考慮的改革範圍；現在可以借鑒東歐的改革經驗，不會再被指責為思想不純了。

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的幹部於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訪問香港，評估了它在金融、工業和管理方式領域幫助中國發展的潛力。這些幹部探討了在臨近香港邊境的廣東寶安縣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可能性。這種加工區從國外運進原料，用中國的勞動力進行加工後重新出口，既無關稅也不受任何限制。沒過幾個月，國務院就正式批准建立這個加工區，這就是後來的深圳經濟特區。當時廣東存在著實際的治安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逃往香港。鄧小平 1977 年視察廣

東時有人向他談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說，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鐵絲網和邊境哨所強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發展廣東經濟，這樣年輕人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謀生了。

國家計委的代表團從香港回來後，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個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強也在1978年12月訪港，以加強北京和港英政府的關係。他在香港期間促請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採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他還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在國務院官員訪港之前，香港與大陸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這次訪問為使香港成為向中國輸入資本和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的主要渠道鋪平了道路。

中國領導人對日本感興趣，不僅因為它是獲得現代工業技術的來源，還因為它提供了管理整個現代化過程的成功戰略。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上海市副市長）林乎加率領的代表團於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訪問了日本，代表團成員來自國家計委、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國銀行。日本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國當時面對的類似難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一片蕭條，但在戰後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下，日本經濟迅速進步，很快就趕上了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從經濟管制、中央計劃經濟、配給制和價格管制的戰時經濟，轉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間經濟，其中消費產業是工業成長的主動力。

林乎加的代表團甫一回國，就向政治局彙報了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進步：日本人大膽引進國外技術，利用外資，大力推動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團彙報說，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願意提供援助和技術，幫助中國的發展。代表團推薦了各種項目，其中包括建設一個千萬噸級的鋼鐵廠。儘管由於此後中日關係惡化，中國政府降低了日本對中國振興的影響力，但這個代表團以及稍後鄧小平10月的訪日，使日本在資本、技術和工業管理方面對中國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在1978年的所有出國考察中，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領的考察團於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對西歐的訪問。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會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轉折點。

谷牧的出訪和四化建設務虛會：1978年5–9月

在中國的經濟領導人中，谷牧的地位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領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了歐洲五國——法國、瑞士、德國、丹麥和比利時。代表團成員在出國前聽過簡單的情況介紹，但他們對西方都瞭解甚少。這些備受尊敬的幹部們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和所學習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回國後在國務院座談會上為中國勾畫的新圖景，使得這次考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力。鄧小平在1975年對法國的五天訪問側重於外交關係，只短暫考察了企業。與此不同，谷牧的訪問為期五周，成員包括來自各個專業的幹部，他們深入考察了對中國有用的技術和觀念。谷牧回憶說，出行前夕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示說，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7-8]

谷牧代表團的20名成員是由華國鋒指定的。^[7-9]出訪成員中至少有六名部級幹部，包括農業部和水利部副部長，還有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像岩倉使團成員一樣，之所以選定這些官員是希望他們回國後領導不同的經濟部門。^[7-10]

谷牧副總理是個經驗豐富、廣受尊敬的經濟幹部。1954年他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建委副主任後，一直是經濟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文革期間，他是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的「業務組」領導人，為經濟工作提供全面領導。他不但抓經濟計劃，而且分管科技。鄧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對他有所懷疑，但是看到谷牧是個幹練而務實的幹部，並支持現代化，鄧便很快打消了疑慮。谷牧與復職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發跡的人都能搞好關係。事實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從歐洲考察歸來後，他就被委以指導促進外貿和發展經濟特區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團動身時，中美關係能否正常化仍然懸而未決，但是中國與考察團出訪的五個歐洲國家已經實現了正常邦交，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都曾派出高級代表團訪華。因此，當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級代表團出訪這些歐洲主要國家時，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時駐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國駐華大使都飛回本國，陪同中國代表團訪問他們各自的國家。^[7-11]

由於中國剛開始走出冷戰的思維模式，谷牧代表團的成員以為他們會被當作敵人看待。雖然有出國之前為他們準備的情況簡報，但東道主的友好和開放還是讓他們吃驚。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工廠等設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對一般中國人也不開放，因此對於歐洲人願意讓他們參觀工廠、辦公樓、商店和幾乎所有其他設施，他們無不感到詫異。^[7-12]

考察團訪問了五個國家的15個城市。他們參觀港口，乘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旅行。他們考察了發電廠、農場、工廠、商場、研究所和生活區。考察團在一些訪問中分成小組，總共考察了80個不同的地點。^[7-13]他們一路聽取情況介

紹，收集各種資料。^[7-14]他們的重點是經濟事務，因此會見最多的是經濟專家，但他們也會見了外交官、政治家和軍官。他們考察了製造硅片、光學儀器和化學製品的工廠。他們幾乎沒有觀光時間，但還是訪問了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在考察德國資本主義成就的同時，也向共產主義的起源地表達他們的敬意。^[7-15]這些國家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體生產效率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發電廠用計算機進行管理，戴高樂機場則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這些情景令他們震驚。而在不來梅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見到被吊運到貨船上的集裝箱。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率之高也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就像幾年前的鄧小平一樣，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7-16]

考察團的成員本來以為會看到工人受剝削的證據，然而這些國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讓他們大跌眼鏡。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在總結考察印象時說：「這一個月多的考察讓人大開眼界。……所見所聞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吃驚。我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原來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是落後腐朽的，走出國門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7-17]歐洲人願意向中國提供貸款和現代技術，也讓代表團成員大感意外。僅僅在一次宴會上，在座的一群歐洲人就宣佈準備提供多達 200 億美元的貸款。^[7-18]他們還驚奇地看到，歐洲國家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財政和徵稅，並對當地事務作出決策。代表團回國後認為，中國的財政過於集中，沒有給黨的地方領導人留出足夠的工作空間。^[7-19]

谷牧的代表團回國後，根據安排立刻向政治局會議彙報了出訪情況。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於下午 3 點召開。政治局委員們是如此之興奮，他們決定晚飯後繼續討論，會議一直持續到夜裏 11 點才結束。^[7-20]他們聽過谷牧的彙報後，才知道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些懷疑對西方情況的彙報，但他們瞭解並尊重谷牧代表團的成員，知道這些人是可信的。由於多年來懼怕西方，他們對歐洲人熱情好客的開放態度、以及提供貸款和技術的意願更是感到吃驚。谷牧知道他的同事們對資本家抱有疑慮，他解釋說，歐洲人願意投資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開工不足，因此想把產品和技術賣給中國。谷牧提出了外國人能夠幫助中國改進生產的一些可能方式——補償貿易、合資生產和外國投資，並且建議說，所有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細研究。為了打消對谷牧在彙報中有所誇大的顧慮，最熟悉國外發展狀況的老幹部——葉帥、聶榮臻和李先念——都稱讚谷牧的介紹既客觀又清楚。這次彙報給政治局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致同意，中國應該抓住機遇，立即行動起來。^[7-21]既然其他國家能夠引進資本和原料從事出口商品加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7-22]

在此後的十幾天裏，代表團把彙報材料整理成正式的書面報告，於 6 月 30 日提交政治局。鄧小平因為聽力不好，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而是單獨接見了谷牧。他在見面時說，中國應當根據谷牧的所有建議，盡早採取行動，包括向國外借款。^[7-23]中國領導人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紡織業，因為中國的布匹十分短缺，購買任何布料都要憑票。增加布匹的供應，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對外開放的價值，進一步獲得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況且由於糧食短缺，難以通過迅速擴大棉花種植來增加衣物的供給。因此谷牧主張抓緊引進織造工廠，這樣可以生產所需的合成纖維，就像日本、臺灣、南韓和香港一樣，用紡織和服裝業推動中國輕工業的起飛。^[7-24]

谷牧的出訪使中國有了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合作的新願望，但這不僅需要重新考慮具體的產業計劃，而且要改變政府的規章制度，以便外國企業來華經營。西方資本家是否會利用中國對國際慣例的無知，佔中國的便宜？這樣的疑慮並未消失，但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大步前進。他們思考涉及所有經濟領域的新問題：允許哪些中國企業跟外國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國人佔它們的便宜？如何將外資融入中國的計劃體制？如何決定哪些地方和單位可以接受貸款和技術？

明治時期的日本有寬鬆的時間，岩倉使團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 21 卷《殖產興業建議書》，作為產業發展的指南。與之不同，谷牧出訪之後的幾周之內，代表團就完成了報告，中國領導人立即組織了相關單位對考察的內容進行討論。

報告完成後，國務院立刻召開了四化建設的務虛會。會議從 1978 年 7 月 6 日一直開到 9 月 9 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在開幕式上，谷牧做了關於他們考察過程的長篇報告，並談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會議由當時主管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李先念主持。與會者被告知，不要專注於過去的錯誤，要思考國家在未來應當做些什麼。鄧小平因為正忙於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沒有出席會議，但他一直看會議簡報，並在看過會議總結報告的草稿後提出了修改意見。^[7-26]

不同於與會者被關在賓館裏數日的工作會議，務虛會在兩個月裏開了 23 次上午會。一向很少參加國務院會議的華國鋒認為這些會議很重要，因此參加了其中的 13 次。^[7-27]會議當日的下午幹部們回各自單位彙報上午的討論，並準備其單位對會上所提問題的書面回覆。務虛會議 60 名主管經濟的部委代表介紹各自單位的整體工作和計劃。這樣一來，各單位能夠瞭解其他單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對具體分配和生產指標進行爭論——這些細節將在以後的計劃會議上討論。

曾在中國幾乎對外隔絕的時期領導著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在 9 月 9 日的閉幕會上宣佈，中國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他在務虛會的總結報告中說，中國不能再維持封閉的經濟，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利用當前的有利條件，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資本和管理經驗。李先念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人能夠充分利用現在的有利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在 20 世紀取得重大進展。他宣佈，為達到這個目標，從 1978 到 1985 年要進口價值 180 億美元的貨物和設備。^[7-28]

在 1978 年的夏天，參加務虛會的人剛剛開始瞭解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還未準備好進行市場化試驗。但是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下，與會者得以提出將在未來 20 年不斷被討論的所有重大問題：市場、放權、價格、外貿、微觀和宏觀管理等等。其中最緊迫的兩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擴大外貿和外國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調動個人、地方和外國人的積極性，又能保持對全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控制？

在務虛會的討論中所形成的對未來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訪帶來的樂觀主義和興奮情緒。有些設想——例如，中國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錢為進口新工廠設備買單——後來被證明完全不切實際。在前所未有的機會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經驗的幹部們要為國家搶回失去的 20 年的願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過，儘管存在過度樂觀的傾向，務虛會的幹部們並沒有放棄政府管制。外國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的經濟；外國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要通過與外貿有關的特定政府部門，由這些部門中會講外語、對外國人有一定瞭解的幹部來維護中國的利益。

在務虛會期間，樂觀的與會者自然無意聽取陳雲——他代表了一批冷靜謹慎的幹部——所說的話。陳雲自 1962 年受到毛的排擠後一直沒有官職，但是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樂觀的大躍進給經濟造成的破壞，當時也沒有人能比他更敢於給樂觀情緒潑冷水。務虛會臨近結束時，陳雲得知務虛會上的一些發言後，對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說，會議應該延長幾天，聽一聽不同意見。^[7-29]陳雲說：「從外國借錢是對的……但一下子借這麼多……我們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我國的現實。我們的工業基礎沒法跟人家比，我們的技術能力也趕不上人家。他們只看到我們可以借錢……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國外貸款，這樣做是不行的。」^[7-30]但是與會者都想大幹快上，華國鋒沒有延長會期聽取其他的觀點。

鄧小平沒有參加務虛會，但他一直在看會議通報，對樂觀情緒也未給予限制。當聽說決定借價值 180 億美元的技術和設備時，他隨口說道：「怎麼不借 800 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務虛會兩個月前曾與鄧小平見過一面，他準確地觀察到了鄧小平當時的心情（見第 11 章），他對卡特總統（Jimmy Carter）說，鄧小平很著急。

點燃星星之火：1978 年 9 月 13–20 日

當年毛澤東謀劃點燃中國革命時，曾寫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與此相對應，胡耀邦說，鄧小平的東北之行（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也點燃了將使中國發生巨變的星星之火，而這些變化就反映在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31]或許他還應再加上一句，這些變化也包括鄧小平登上頭號領導人的位置。鄧小平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去各地為改革開放計劃「點燃星星之火」有三個重要時刻。第一次是 1977 年 11 月在廣州，他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7-32]第二次是 1978 年 2 月出訪緬甸和尼泊爾時在四川停留，當時他與趙紫陽見面，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在四川時，他曾嘲笑那些說農民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人。^[7-33]鄧小平說，這種抱著僵化教條不放的人應該開開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次便是這次他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 30 周年慶典後歸途中的東北之行。

在最後這次點燃星星之火的東北之行中，鄧小平在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日本人舊稱「滿洲」）停留了數日，隨後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這些地方呼籲更大膽地脫離毛的思想，不要囿於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去東北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就在鄧東北之行的幾周前，華國鋒的宣傳部長張平化去東北各地視察，要求幹部擁護「兩個凡是」。（後來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獲得更大權力後，張平化成為了最先被他撤職的幹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鄧小平的東北之行其實是回應張平化意見的一種方式，他要鼓動人們在支持改革開放上作出更大膽的努力。由於華主席控制著北京的宣傳機器，鄧小平為了避免引起直接衝突，在北京時說話比較謹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講話，言論上也較少保留。而且他這些非正式的講話不必通過正式講話的批准程序。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汪東興，但他確實批了「兩個凡是」，支持了「實踐標準」，這等於間接地批評了華國鋒的班子。中國那些有政治頭腦的幹部們認為，鄧小平贊成「實踐標準」，

反對「兩個凡是」，是為自己在與華國鋒競爭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中爭取更多支持。他選擇在東北開始點火自有道理，因為這裏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據地——遼寧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都最先宣佈支持「實踐標準」。

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鄧小平批評了鼓吹「兩個凡是」的人，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馬列主義並沒有告訴中國革命者要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能在軍事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他使馬列主義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情況。鄧小平說，同樣，當外國人拒絕賣貨物給中國時，發展外貿的條件還不成熟，但現在與外國改善經濟關係的條件已經變得有利了。「四人幫」也許會把跟外國人改善關係說成「賣國」，但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正確方式，正是適應這些變化，促進對外貿易。^[7-34]

鄧小平在遼寧時說，中國的領導人，包括他本人在內，必須承認我們辜負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國人民。深諳政治複雜性的人都聽得懂鄧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鄧無需再講下面的話：「當『我們』辜負了人民群眾，誰應該對此負責？是誰不願作出改變來糾正錯誤？是誰相信凡是毛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我國的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它很落後，只解決表面問題，造成機構重疊，助長官僚主義。……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就無法證明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不難斷定，鄧小平認為，在改變體制、為經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方面，華國鋒做得不夠。

鄧小平在東北期間還要鞏固他在軍隊中獲得的支持。東北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鄧小平視察工廠、農村和部隊時，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兩人有很多機會交談。^[7-35]不過，鄧小平對海軍第一政委——常來旅順大連港視察的蘇振華上將——的個人忠誠有所擔心。蘇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忠誠——1976 年幹部們被要求批鄧時，他對鄧的批判在鄧小平看來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 年 4 月湛江港一艘驅逐艦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鄧小平認為蘇振華——他是中國海軍最高級別的領導和軍隊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對此事負責。蘇振華在受到鄧的批評後不久得到通知，華國鋒從北韓訪問回國時將在東北停留。他知道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對立，又對自己挨批心中不快，於是想在大連舉行一次有 120 艘軍艦參加的海軍檢閱，作為歡迎華國鋒到來的儀式。在獲悉蘇振華要用這種排場支持華國鋒後，鄧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對軍隊的影響力取消了這次檢閱。鄧小平在視察東北期間，要確保軍隊中沒有人再支持華國鋒。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視察期間和自己過去的忠實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鄧小平一再對他的聽眾說，要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轉向增加生產需要做的事情。鄧小平已經準備好為增加生產而工作，而聽他講話的人也可以肯定他決心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中央工作會議：1978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5 日

在中共的官方歷史中，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准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召開工作會議時距離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已經兩年，對各種觀點都可以重新展開討論，人們不必再擔心被指責為對毛澤東不敬。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稱讚這次會議說，它標誌著我們黨又恢復了暢所欲言的民主討論傳統。他說，這是自 1957 年（當時的「雙百方針」鼓勵自由表達）以來黨的會議上最好的討論。^[7-36]有人認為，它是自 1945 年中共七大以來最好的會議，還有人認為，它是自 1941 年至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最好的一次會議。^[7-37]

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講話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麼。他在 11 月 10 日宣佈開會時說，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農業和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國家發展計劃，還要繼續討論國務院四化建設務虛會的內容。他的會議計劃，與鄧小平一年前在廣東軍隊會議上倡議的完全一致：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但是會議開始兩天之後，華國鋒的會議計劃卻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氣氛會發生如此徹底而迅速的改變。鄧小平在幾周前就為會議準備好了講話提綱，並安排胡喬木和于光遠幫他作了充實。^[7-38]但是 11 月 14 日他訪問東南亞歸來後，聽說北京的氣氛已變，又讓他的筆桿子為他寫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7-39]

葉帥很快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11 月 11 日，他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 11 月 11 日到 25 日之間。當鄧小平 15 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老領導後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7-40]

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共有 210 名中共最高層幹部。與會者中有很多黨政軍大員，包括中央各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各省級單位黨委的兩名最高領導和一些退居二線的德高望重的老幹部，還包括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員。華國鋒在致開幕詞時宣佈，會議原計劃開 20 天，但也許要開得更長一些。最後，會議一直開了 36 天。與會者們把自己關在從中南海步行即可到達的京西賓館，因此討論在晚上、週末和正式會議之外都可以繼續進行。^[7-41]會議的形式——包括全體大會和分組會——以及把與會者關在賓館中的做法，都與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規定和方式一樣，但是在上次會議的 20 個月之後，政治氣氛已全然不同。

這種會議的形式便於所有與會者參與。除了四次全體會議之外，與會人員按地區分為六個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組的與會者都要發表自己的意見，每天會有一份各組的會議簡報分發給全體與會者。當某一分組要把它觀點寫入報告時，成員以舉手表決方式作出決定。^[7-42]鄧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樣，沒有參加分組會，但他每天都密切關注著會議的報告。^[7-43]

華國鋒在會議開始時就意識到，很多與會者不滿於「兩個凡是」和對 1976 年「四五」運動示威者的嚴厲批判，不滿於他不願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個特別棘手的問題，華國鋒已經作出的調整仍不足以使眾多參會者滿意——他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上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承認，4 月 5 日去天安門廣場的大多數人都是為了悼念周恩來，然而，這次示威仍被貼著「反革命事件」的標籤。1978 年 11 月的大多數與會者對這種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氣憤。^[7-45]儘管華國鋒再次表示，鄧小平沒有參與「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幹部認為，正是由於這個事件，鄧小平才被再次打倒並為華國鋒所取代。因此對該事件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鄧小平的評價，很多人堅持要對它重新評價，把它定性為一場「革命運動」。^[7-46]

華國鋒在最初的講話中著重於四個現代化，希望以此迴避政治分歧，只討論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的經濟問題。華國鋒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是精心準備的，為安撫他的批評者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他完全不提「兩個凡是」。在說明了會議日程之後，他明確表示準備接受外國的貸款、技術和商品，將其作為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准許的。他沒有直接否定政治運動，但是他說，他曾慎重考慮過是否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對全社會進行動員的運動，但最後認為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還不如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華國鋒還對與會者表示，他曾經指示在批判大會上不應當遊街。^[7-47]很多希望推進改革、加快老幹部復出的與會者也承認，儘管華國鋒沒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階級鬥爭，但他為結束這些運動裏最惡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也很難不贊同華國鋒講話的主調。

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紀登奎副總理就農業問題發言時，華國鋒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數與會者都曾有過負責農村基層工作的經歷，親眼見證過大躍進後的饑荒。雖然中共是依靠農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執政，但與會者深知由於政策失誤，造成了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嚴重的糧食短缺仍在繼續，寶貴的外匯需要用來進口糧食。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面對忍饑挨餓的農民和六神無主的基層幹部，不得不處理這些災難造成的後果。儘管中共把犯下這些令人痛心的錯誤的主要原因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它仍難以免除施行這些惡劣決策的責任。幹部們越來越願意私下說出當時還不便公開講的話：毛澤東要承擔部分責任。^[7-48]

在這種背景下，紀登奎的講話讓與會者感到農業政策的制定又恢復了誠實坦率的作風。他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浮誇吹牛、盲目樂觀、空話連篇的語言，坦率而全面地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承認，國家的農業政策變化太快，難以預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況。與會者知道黨必須解決仍然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紀登奎提議，為了解決農業問題，要增加農業投資，改善種子和化肥供應，將農民可用的貸款數量翻一番，把糧食收購價提高 30%。^[7-49]

但是，紀登奎的開放態度和華國鋒的安撫姿態，卻不足以平復對華國鋒的不滿。很多與會者認為，華國鋒已不再能提供黨所需要的最高領導。例如，會議開始後不久，中南組的與會者就一致宣佈，他們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7-50]11 月 11 日，即會議的第二天和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很多與會者就群起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進一步開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們要求為那些已故的備受尊敬的幹部正名，並讓自己過去的同事恢復工作。

11 月 11 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幹部，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一天結束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葉帥在當天勸告華國鋒說，要麼接受已經變化的政治情緒，要麼做好被人拋在後面的準備。^[7-51]華國鋒很清楚自己別無選擇。包括他在內的所有與會者都知道，赫魯曉夫在 1964 年是如何被布列茲尼夫等人領導的政變趕出了領導層。

11 月 12 日又有九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華國鋒和汪東興此前拒絕糾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雲。有的會議紀錄錯誤地認為，是他那篇由胡喬木潤色的講話改變了會議的氣氛，其實在他講話之前氣氛已經發生了變

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在小組討論裏提出了這一點。不過，陳雲的發言利用人事紀錄，確實提供了全新而詳盡的材料。陳雲做人事工作幾乎可以追溯到 40 年以前，這使他的發言更有份量。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否定了華國鋒把經濟問題作為重點的做法。他反駁說，為了調動幹部的熱情做好經濟工作，黨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好懸而未決的政治分歧。具體而言，受到錯誤批判的五類人，必須還他們以清白：

- (1) 以薄一波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鬥的 61 人「叛徒集團」；^[7-52]
- (2) 在 1940 年中組部決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錯定為叛徒的人，應予恢復黨籍；
- (3) 1937 年入獄的陶鑄、王鶴壽等人，他們被毫無根據地定為叛徒；
- (4) 已故的彭德懷元帥，應當為他恢復名譽，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門事件，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陳雲還說，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黨的傑出領導人，斷送了他們的前途和生命，雖然他已經去世，但仍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7-53]

不難想像，陳雲是帶著某種情緒講話的：他的怨氣很深。這尤其是因為，華國鋒沒有重新安排他擔任要職，而且汪東興拒絕印發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應當讓鄧小平復出的講話。但是他並非唯一帶著強烈情緒發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組中，發言者們長久受到壓抑的怒氣都噴湧而出，他們強烈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那些被冤枉的好幹部回來工作。發言者能夠對那些仍沒有獲准恢復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為很多人都瞭解受到凌辱和肉體摧殘是怎麼一回事。在所有六個小組中，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要求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要求譴責已故的康生——他對許多人的死亡負有責任，而且，他的前秘書李鑫甚至當時仍在協助汪東興阻止平反冤案。正是這種情緒，使人們對汪東興乃至華國鋒的不滿越燒越旺。

中央工作會議進行的前幾天，會議氣氛就已經反映在了承擔著維護北京治安責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動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取代了曾經負責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吳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開始考慮何時以及如何釋放那些因參加「四五」示威仍被關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他們已經在準備可能發表的聲明草稿。

林乎加也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並且是華北組的組長。在葉帥與華國鋒見面和陳雲發言之後，他充分意識到氣氛正在發生變化，並於 11 月 13 日召開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會後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佈了一個公報，其內容遠遠超出華國鋒有關「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讓步。公報說：「廣大群眾在 1976 年清明節聚集到天安門悼念敬愛的周總理……他們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犯下的罪行。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對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應當全部予以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7-54]

北京市委屬下、當時由林乎加負責的《北京日報》立刻刊登了這份公告。接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三位媒體幹部——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們還同時兼任中宣部副部長——大膽地決定在各自的媒體上報道《北京日報》的文章內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北京日報》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 1976 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新華社也立刻宣佈不僅群眾從事的是革命行動，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質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又在 11 月 16 日轉載了新華社的聲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聲明必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這三位大膽的主編覺察到正在變化的政治氣氛，未經上面允許就冒險採取了行動。^[7-55]胡耀邦責怪他們三人不但不告訴政治局，甚至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濤回答說，他們認為假如請示胡耀邦，他就要為這個決定承擔重大責任。那還不如讓他們來承擔責任，先把它發表出來再說。^[7-56]

公告的發表在會議上掀起一股興奮的熱浪。不難理解，林乎加會擔心他的大膽舉動將招來批評。11 月 16 日，文章在兩家報紙上登出後，他打電話問其中一個主編，那個頭條新聞是由誰批准的。當得到答覆說轉載《北京日報》內容的決定只是由主編作出之後，林乎加說，他可以為《北京日報》的文章承擔責任，但其他兩個主編則要為自己報紙上的頭條新聞負責。林乎加害怕華國鋒會生氣，又打電話給華國鋒作出解釋，並請求他諒解。讓他大感意外的是，華國鋒並沒有責怪公告的發表。^[7-57]事實上，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三天後的 11 月 18 日，華國鋒竟然為《天安門詩抄》這本歌頌「四

五」運動參與者的新書親筆題寫了書名。報紙還印發了華國鋒題寫書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華國鋒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華聽從了葉帥的勸告：順應正在變化的氣氛，以免被人拋到後面。

[7-58]

11月25日華國鋒按計劃做了例行講話。這篇講話並不是檢討，而是宣佈他接受黨內的主流觀點，並打算繼續任職，即使這意味著他要代表與他先前贊成的意見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對參與者要全部給予平反。

華國鋒承認，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繼續對導致批鄧的「右傾翻案風」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他建議，給1967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將彭德懷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陶鑄案平反；摘掉給楊尚昆扣上的反黨陰謀分子的帽子，恢復他的組織生活並重新作出任命；對康生進行批判。

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解決政治問題。^[7-59]他還承認，大多數與會者感到紀登奎關於農業的講話仍不夠充分。華國鋒在講話中也不再提大寨這個樣板。他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7-60]12月13日他又做了一次講話，承認自己也犯過一些錯誤。

通過對已經變化的政治氣氛作出讓步，並在一些問題上完全改變自己的觀點，華國鋒避免了一場內訌。^[7-61]如他所說，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但是有不少人認為，由於氣氛的決定性變化在當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並且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三天變得十分明顯，華國鋒其實沒有別的選擇。他被允許保留黨主席、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當新的政策路線被採用時，擁護以往路線（現在被稱為「錯誤路線」）的人需要進行自我批評，宣佈支持「正確路線」。然而，華國鋒的一些親密同事並沒像他那樣圓滑地趕緊調頭。時任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就堅決反對為大批幹部平反和打破毛澤東思想的束縛，他當時仍掌管著「專案」和宣傳工作。老幹部們認為，汪原本是作為毛的忠實衛士獲得了他不能勝任的職位；而他在兩年前逮捕「四人幫」時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又讓他保住了這個本來就不應屬於他的職位，並使他能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阻礙進步。華國鋒在11月25日接受了黨內的大氣候以後，有兩名與會者確信風向已變，於是未經協商就開始點名批評汪東興。他們斥責汪阻礙老幹部復出，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兩個凡是」，講鄧小平的壞話。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將汪看成給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擺脫僵化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

汪東興拒絕作出口頭檢討，不過他在12月13日會議結束時提交了一份書面檢討。^[7-62]他承認自己在處理專案工作上犯了錯誤：「我對糾正冤假錯案重視不夠，行動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決定，將中央專案組和「五一六」專案組的材料轉交中組部：「我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我懇求黨中央免去我的這些職務。」^[7-63]吳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評，張平化則在三中全會之後不久就被撤職。吳冷西、熊復和胡繩這三個筆桿子——他們跟華國鋒和「兩個凡是」站在一邊——受到了嚴肅但較為溫和的批評。

華國鋒和汪東興暫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三個支持者——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也留在政治局內。迅速崛起的頭號領導人鄧小平對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變，但是他決定，已經作了檢討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員不必撤換。^[7-64]他要避免對抗，以免讓國內外的人知道中國正在進行權力鬥爭。

中央工作會議不但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提供了推動力，而且成為一個高層幹部更坦率地檢討以往的錯誤、思考未來新路線的論壇。在小組討論中，一個又一個發言人介紹自己應付糧食短缺的工作經歷，主張國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許多領導人來說，這些討論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舒解的機會，他們可以公開承認自己過去不敢正視的失敗，這些失敗造成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大量苦難與死亡。即使他們把主要責任推給上級，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對許多幹部來說，這是一個從未徹底癒合的傷疤。

有關農業的最大膽的發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他認為紀登奎的建議不足以解決農業問題，並仍然反映著思想上受到的禁錮。胡耀邦還大膽主張，政治和經濟活動全部統一在公社這個單位是不行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黨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和當地幹部的積極性。他說，如果集體所有制管理不善，調動不起農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7-65]這些話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對於把農業生產隊分解成生產小組的普遍支持。不過，當時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萬里（他當時在安徽試驗在生產隊下面搞更小的生產組）在內，都沒有提到包產到戶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們知道，這種討論將在黨內上層引起很大爭議，動搖那些仍在試圖維持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幹部的權威。^[7-66]

參加分組會的人也討論了各種經濟問題。輕工業部部長梁靈光（後出任廣東省省長）強調了政治穩定的重要。他提醒人們說，1949年以後有三個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建國後的最初幾年、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和

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1961 年–1965 年），這些也正是政治比較穩定的時期。他還提出，應當優先發展輕工業，更好地滿足對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認為，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他看來，應當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並降低出口稅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會議快要結束時，與會者轉向了另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哪些人應當增補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會議無權作出人事決定，但以後將作出這種決定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工作會議。由於鄧小平不想撤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現任委員，因此與會者同意，為了在短期內補充新成員，只能擴大政治局。他們認為，以後只要有人退休或發現不合適的人，政治局的規模就會再次縮小。與會者接受了鄧小平「只進不出」的意見，以及新委員應當是「敢做事」的人。^[7-68]西北組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推薦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政治局。^[7-69]在工作會議之後的正式會議上，這些推薦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會議上普遍認為，在經濟工作擺到第一位的時代，應當對陳雲這位經濟上最有智慧和經驗的專家委以重任。陳雲十分清楚，鄧小平在外交和軍事這兩個重要領域裏經驗豐富，而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說，就最高職位而言，鄧小平是唯一合適的人。^[7-70]但是與會者熱情推薦陳雲擔任黨的副主席。

鄧小平和陳雲能夠在工作會議期間團結一致，是因為兩人都決心給老幹部平反，為他們恢復工作。鄧小平實際上成了集體領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時他已經和葉帥一起掌握著對軍隊的權力。但是，陳雲獲得了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幾周之內又接過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就整體政治地位而論，也就是說，在決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選關鍵人選方面，陳雲與鄧小平平起平坐。

鄧為改革開放作準備

當鄧小平從東南亞回國時，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葉帥向他簡單介紹了政治氣氛的變化，建議他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準備。葉帥德高望重，論資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廣州起義，但他從不貪圖個人權力，現在則成了「擁立領袖的人」。葉帥深信，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請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合作共事，一起領導黨和國家。葉帥與鄧小平見面時，鄧小平同意應當加強集體領導，對個人宣傳加以限制。^[7-71]華國鋒也接受了葉帥的勸告，在黨的政策內容上作出讓步，並且同意由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代言人。儘管沒有舉行任何公開的慶祝，而且華國鋒名義上仍保留著黨政軍首腦的頭銜，但鄧小平按葉帥的建議，已開始為自己的新角色作準備。

在為新工作作準備時，鄧小平必須讓他的同事們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再次向同事們——他們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證，他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主席為黨作出了卓越貢獻，黨不應當像赫魯曉夫抨擊史太林那樣批判毛澤東。他還向他們保證，國家要繼續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通過看每天的簡報瞭解情況，鄧小平觀察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急切的樂觀情緒。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資歷較淺的同事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他告誡說，中國不可能很快解決它的所有問題，不可以想當然地急於求成。^[7-72]有一些難題只能留給下一代人解決。為了避免再次揭開文革的傷疤，他建議對此事進一步研究。就像他過去多次講過的那樣，他再次建議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講大道理，再講小道理。他說，在吸收外國投資和技術之前，首先需要國內的穩定。國家只有穩定了，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7-73]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讓群眾和外界產生中國存在權力鬥爭的印象。鄧小平給政治局常委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採納，成為了黨的觀點。會議幾天之後，他的講話被印發給全體與會者。^[7-74]

鄧小平現在要成為頭號領導人，因此他必須重寫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到 12 月 2 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作出讓步之後，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他當時正忙於結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在準備對越南可能進攻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不過，至少從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來，鄧小平就一直在思考這次講話中所要談到的問題。胡耀邦和于光遠得到了另外一些實際起草人的協助，並且像通常一樣，由胡喬木作最後的潤色。^[7-75]

鄧小平很少為講話寫提綱，但是為了這次會議，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頁紙、共計 1,600 字的說明。他就講話的風格、內容和要點，向負責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對稿子的要求。他對起草人說，講稿要簡明扼要，句子要簡短，聽起來鏗鏘有力。他要說明中國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鄧小平讀過初稿後，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見。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兩次與起草人見面審閱新的草稿，並重複了同樣的詳細過程。

鄧小平在講話中並沒有提出新的政策，因為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手作這樣的準備。他向齊聚一堂的中共領導幹部概述了他在新時代的思路。講話反映著他對自己當時苦苦思索的一些大問題的想法：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又要擺脫他的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維護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的發展重點。

在他為了與講稿起草人第一次見面而準備的提綱中，鄧小平列出了七個主題：（1）解放思想；（2）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法制；（3）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4）克服嚴重的官僚主義；（5）允許一些地方和部分企業先富起來；（6）在經營管理上「加強責任制」；（7）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第二次見面時，鄧小平對起草人說，他決定把後面幾個主題合併成一個，在最後的講稿中只談四個問題。

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直奔主題：「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稱讚這次工作會議是 1957 年以來黨內最好、最開放的一次討論會。他說，要允許大家說出對真實情況的看法。「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太少。……應當允許群眾提一些意見，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無論在當時還是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倡過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當人們開始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把自己的觀點張貼到牆上幾天之後，鄧小平就在 11 月 29 日表示，「民主牆」上張貼的一些言論是錯誤的。

鄧小平既要讚揚毛澤東，又要為脫離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間。他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犯過錯誤，他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誤。他表達了黨內高層的一種主流觀點：中國的兩次大災難——大躍進和文革，是由於制度造成的，這種制度允許一人統治，容不下不同的聲音。因此中國需要建立法制，這樣的話一個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法制一開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變得公正合理。

鄧小平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與毛澤東依靠精神鼓勵搞大躍進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說：「調動積極性不能沒有經濟手段。少數先進分子可以響應號召，但這種方法只能短時間內有效。」^[7-76]鄧小平認為，必須建立一種制度，通過提拔和改善生活條件，獎勵那些促進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人。鄧小平還特別提出，要給地方幹部更大的靈活性，讓他們發揮主動精神。

鄧小平說，集體負責論實際上是「無人負責」。他主張將責任落實到個人，同時承認為此必須給予個人權力。當他在 1975 年對下級幹部說要敢想敢幹時，幹部們擔心毛澤東會在政策上變卦；而他在 1978 年再說這些話時，聽他講話的人已經不必再為政策的變化擔心了：他們覺得幹勁十足，要努力為國家做事，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

鄧小平支持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們的原則是錯必糾。」但他堅決反對人們向過去整過自己或自己親友的人「算賬」。為了避免冤冤相報，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帶水。「但是，」他說，「搞清楚每個細節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不應糾纏於文革，因為他知道這只會造成分裂，可以讓時間去解決問題：「安定團結是頭等大事。」對參與過打砸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決不能重用。但是，對犯過錯誤但作了真誠檢討的人，要給他們機會。然而，鄧小平也特別提到一點：黨對那些今後再犯錯誤的人將更加嚴厲。^[7-77]

鄧小平試圖提前考慮一些新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並淡化那些將會對新政策不滿的人的敵意。他知道不平等會增大——由於即將發生的那些變化的速度和中國人民的多種需求，「一部分人會先富起來」。但是他說，其他人以後也會有機會，先富可以幫後富。他告誡說，可能會出現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人都不熟悉的新問題，但是要以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要「不斷學習」。^[7-78]

鄧小平雖然沒有說得很具體，但是他打算開放一部分市場。他對同事們說，不要擔心市場會帶來經濟混亂。他承認，在負責整體計劃的人和獲得更多自主權的地方幹部之間會產生一些矛盾。利益衝突可能比以前更嚴重，但是他認為，從長遠看，生產力的發展會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7-79]

為了對即將到來的很多變化作好準備，鄧小平建議黨的幹部學習三種知識：經濟學、科學技術和管理。他具體說明了應當如何評價幹部：對經濟單位的黨委進行評價，主要是看它採用的先進管理方法的情況，它在技術創新上取得進步的多少，它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潤增長狀況——而這是以其工人個人收入及提供的集體福利作為部分衡量標準的。與會者急切地想得到在這種新環境下的更具體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會議最後的重要講話之後，參加者就

會散會；但是這次鄧小平講話之後，會議又延長了兩天，以便來自各個地區的小組繼續討論如何貫徹落實鄧小平講話中的新指示。^[7-80]

鄧小平講話中的很多思想，對於西方的工商業管理者來說就像常識，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從中國 1949 年以前和 1950 年代初及 1960 年代初較穩定時期的政策中找到來源。但是對於 1978 年領導國家的人來說，鄧小平這些思想代表著從根本上擺脫毛澤東時代。與會者有理由期待，那個由大規模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僵化的意識形態、英雄崇拜、高度集體化和全面計劃經濟所構成的痛苦時代終於結束，中國開始進入可控狀態。

三中全會：1978 年 12 月 18–22 日

三中全會於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在京西賓館召開，而中央工作會議上週五剛在這裏結束。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委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也參加了工作會議。但是參加全會的還包括全體中央委員——他們都擔任黨政軍要職，而出席工作會議的則包括另外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內領導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委員們在其他人到來之前，聚在一起閱讀了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便能夠統一認識。接下來的三天是中央全會的正式會議和分組會，擔任組長的人與工作會議的分組會相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慶祝會，是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佈新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儀式。通常全會的序號是與此前的黨代表大會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變化是如此巨大，因此當中國人只簡單說「三中全會」時，聽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人眼裏，三中全會標誌著使中國轉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開始。雖然改革開放其實是由華國鋒啟動的，但它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現的。

按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一致意見，華國鋒保留了他的正式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則繼續擔任他的職務：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外國媒體和外交界像中國民眾一樣，很快就明白了副總理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頭號領導人。早在 11 月 23 日，即華國鋒 11 月 25 日講話的前兩天，香港記者就向到訪的美國專欄作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說：「鄧小平只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的集權政府。」

^[7-81]

在三中全會上收穫最大的是陳雲。三中全會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全會上他卻成了政治局常委。全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取代汪東興獲得了對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後拍板的權力。不難理解，很多老幹部的案件將在以後幾年得到平反，使他們得以回來工作。

通常最高領導人都要在全會上做主題報告，但是由於華國鋒是名義首腦，鄧小平才是頭號領導人，因此很難決定由誰來做這個報告。全會的組織者解決這種尷尬局面的辦法是取消了報告，但他們實際上把鄧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作是給黨的工作定下了基調。雖然華國鋒主持了最後的會議，但與會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兩個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相鄰而坐，真正握有實權並且今後將領導國家的人物身上：鄧小平和陳雲。東北組的組長任仲夷說，就像遵義會議代表著毛澤東思想對教條主義的勝利一樣，三中全會代表著黨內民主討論的優良傳統對「兩個凡是」的勝利。^[7-82]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陳雲用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就像延安整風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在 1949 年以後領導國家一樣，中央工作會議也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領導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7-83]

沒有加冕禮的權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已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

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 1976 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的兩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

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帥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很難有所作為。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鄧小平充滿自信，做事堅決果斷，穩健踏實，因此他們害怕鄧有可能變得跟他的導師毛澤東一樣。於是他們決定不給他全部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陳雲——之間維持權力平衡。給鄧小平實際權力，卻不給他正式的名銜，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名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

從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到 1979 年 12 月，當鄧小平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開始架空華國鋒時，他和華國鋒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中談起對方時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們都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使中國變得強盛，也都願意採取務實靈活的作風。但是在 1979 年華國鋒畢竟仍是主席，而鄧小平行使著非正式的權力，兩人的關係難免特別尷尬。如果攤牌的話，鄧小平的非正式權力足以壓倒華國鋒名義上的權威，但鄧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樣，力求避免任何公開的不和。華國鋒繼續主持會議，在公開會議上仍然代表黨和政府。不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擁有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老資格顧問的支持，他們擔心一人獨裁，主張集體領導。在 1979 年，用西方的話來說，華國鋒是個不能當家的軟弱的董事會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觀點也不能輕視。鄧小平當時還沒有成為高居於華國鋒之上的頭號領導人，他尚未配備好自己的團隊和自己的統治架構。但是鄧小平有權有勢，又具備削弱華國鋒權力基礎的政治技巧。到 1979 年夏天，鄧小平要收緊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統治架構，便開始逐步削弱華國鋒並終於讓他靠邊站了。

當三中全會上開始提升鄧小平的權力時，離天安門數百米遠的地方，示威者們正在往牆上貼大字報，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鄧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幫」；有些人甚至大膽抨擊毛澤東本人。沒過多久，一些大字報甚至開始批評中共和鄧小平。這些大字報不只讓鄧小平頭痛，還迫使他處理一個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始終糾纏著他的問題：應當允許多大程度的自由？黨和政府應當以何種尺度和方式為異見的公開表達劃定界線？

[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7-2]《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 1949–1992》（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 77–109.

[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 轉引自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載吳敬璉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回顧與反思》（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7-4]李向前、韓綱：〈新近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等三次談話紀錄〉，《百年潮》，1999 年第 3 期，頁 4–11，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92。

[7-5]DXPSTW, pp. 55–56.

[7-6]關於中國經濟學家對東歐改革的看法，可以參見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17–30.

[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

[7-8]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 155–156。另參見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頁 4–11，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203–204。

[7-9]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炎黃春秋》，2004 年第 1 期，頁 3–5。

[7-10]徐璦：〈不看不知道：訪原國家輕工部部長楊波〉，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 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頁 539。

[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 [7-12]徐瑗：〈不看不知道〉，頁 540。
- [7-13]《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 1949–1992》，下冊，頁 1050–1054。
- [7-14]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頁 203–204。
- [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 [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263–266。
- [7-17]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訪原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 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頁 558。
- [7-18]徐瑗：〈不看不知道〉，頁 541。
- [7-19]同上，頁 541；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 558。
- [7-20]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 559。
- [7-21]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 156。
- [7-22]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頁 3。
- [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70；蕭冬連：〈1979 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大轉折紀實之一〉，《黨史博覽》，2004 年第 10 期，頁 4–10。
- [7-24]蕭冬連：〈1979 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
- [7-25]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 156–157。
- [7-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8 年 9 月 20 日，頁 387–388。
- [7-27]蕭冬連：〈1978–1984 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59–70；DXPSTW, pp. 53–61.
- [7-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9 月 20 日，頁 388。
- [7-29]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頁 235。
- [7-3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第 3 卷，頁 252。
- [7-31]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625。
- [7-32]這時很多地方還有「革委會」，即包括很多擁有軍職的地方幹部和被授予軍職的地方幹部的政府機關。
- [7-33]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 2 卷，頁 623–624。
- [7-34]王恩茂（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決定中國命運的「工作重點轉移」〉，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 204–206；SWDXP-2, pp.141–144.
- [7-35]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31–235。
- [7-36]DXPSTW, pp.131. 于光遠的中文原著是《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 190–200。
- [7-37]DXPSTW, pp.131. 另見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46–181。
- [7-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頁；蘇台仁：《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 2 卷，頁 625。

[7-39]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 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7-43]這一信息來自自我與一些東南亞官員的交談，鄧小平訪問這一地區時曾與他們會談。

[7-44]朱佳木：〈胡喬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304；DXPSTW, p. 21.

[7-45]DXPSTW, pp. 65–72.

[7-46]DXPSTW, p. 24.

[7-47]Ibid., pp. 23–28.

[7-48]DXPSTW, pp. 51–53.

[7-49]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DXPSTW, pp. 39–42.

[7-50]王全國：〈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廣東的改革開放〉，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198–203。

[7-51]這個信息來自與葉選基的交談，當時他正與他的叔父葉劍英一起工作。另見他的文章：〈葉帥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讀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有感〉，載《南方周末》，2008 年 10 月 30 日，D23。于光遠是鄧小平的講話起草人之一，對談話都認真做筆記，但是他不知道 11 月 11 日的會議。

[7-52]錢江：〈張聞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縱橫》，2001 年第 2 期，頁 4–6。早在 6 月 25 日鄧小平就讀了有關 61 人案件的報告。鄧小平看報告時說，這些案子必須解決，但事實上直到 6 個月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才得到解決。這 61 個人是否為獲釋出獄而與國民黨配合過於密切的問題，中央領導人早在 1936 年 4 月已有結論，認為他們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 1967 年 3 月再次宣佈他們是叛徒。

[7-53]DXPSTW, pp. 63–65. 另見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77–79。

[7-54]DXPSTW, p. 70.

[7-55]DXPSTW, pp. 71–72.

[7-56]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85–86。

[7-57]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 90–91 頁。

[7-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978 年 11 月 10 至 15 日，頁 1155–1156；1978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頁 1156。

[7-59]DXPSTW, pp. 72–76.

[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

[7-61]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86。

[7-62]DXPSTW, pp. 80–90, 108；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115–125。

[7-63]DXPSTW, pp. 163–165.

[7-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12 月 22 日，頁 457。

[7-65]DXPSTW, pp. 39–46.

[7-66]吳象：〈萬里談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86–287。

[7-67]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73–274。

[7-68]任仲夷：《追尋 1978 年的歷史轉軌》，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16。

[7-69]DXPSTW, p. 127.

[7-70]朱學勤：〈30 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南方都市報》，2007 年 12 月 16 日。

[7-71]《葉劍英年譜（1897–1986）》，頁 1157，1978 年 11 月中旬。

[7-72]DXPSTW, pp. 76–78 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

[7-73]DXPSTW, pp. 76–78 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

[7-74]DXPSTW, p. 78.

[7-75]此處對鄧小平講話稿的準備工作的討論以及所引用的鄧小平講話，同上註，頁 129–148。我這裏的討論也利用了于光遠的採訪。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另見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頁 4–6，載楊天石：《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86–189；李向前、韓綱：〈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載《鄧小平寫真》，頁 190–200。

[7-76]DXPSTW, pp. 185–190.

[7-77]DXPSTW, pp. 129–143.

[7-78]〈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

[7-79]DXPSTW, pp. 132–139.

[7-80]Ibid., pp. 168–172. 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頁 175。

[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

[7-82]任仲夷：〈追尋 1978 年的歷史轉軌〉，頁 215–216。

[7-83]DXPSTW, pp. 205–207.

第 8 章

為自由設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反文化的革命」，它攻擊了舊文化，卻並沒有創造出新文化。紅衛兵引用歷史典故和歷史故事，不但打擊在位的幹部，而且批判幾乎所有的小說、故事、戲劇和文章。文革隨著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講話的中國人十分渴望有暢所欲言的機會。有人想反擊迫害過他們的人，有人要保護自己，還有人只是想訴說自己及其親友蒙受的苦難。

有些黨的領導人從這種被壓抑的怨氣中，看到了用來對付其敵人的機會。還有一些人並無政治目的，只想表達個人感情。但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對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領導人擔心，如果允許「太多的」自由，允許有組織的抗議，國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樣的混亂。在政治運動或大饑荒中本人或親人受過苦的有數千萬人。強烈的敵對情緒不但針對欺壓鄉里的地方幹部，而且針對上一級幹部，因為他們都屬於造成這種災難的體制的一部分。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社會如此龐大，人口眾多，百姓十分貧窮且相互對立嚴重，在行為方式上明顯缺乏共識，所以必須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權威。自由的邊界能夠放得多寬，又不至於使中國社會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亂？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個核心問題。

在判斷民眾的批評浪潮在何種情況下會導致秩序崩潰這一點上，中共領導人並無公認的標準。因此，對於如何設定和維護這條界線，他們內部也難免發生分歧。主管科學、高教、青年事務和統戰工作的幹部，往往會代表與他們共事的人的觀點，一般會贊成較多的言論自由。負責公共治安的幹部則較為慎重，主張對自由進行更多的限制。宣傳部門的領導者往往搖擺不定：其中有些人受過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願意為自己和他人爭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人在傳達和實施這些限制時變成了小暴君。

同時，敢於試探可允許的公開討論界線的人，一般說來都不是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人。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黨外知識分子多年來已經被嚇得噤若寒蟬，也沒有站在公開批評的前列。實際上，在後毛澤東時代衝擊言論邊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輕人、黨員和老幹部，或是有當權的親朋好友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的人。

從原則上說，鄧小平贊成擴大自由，他願意在這方面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但是由於他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最終責任，當他對秩序能否維持產生深切疑慮時，他會迅速收緊控制。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感受到了群眾對於結束文革、開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廣泛支持，因此他允許了兩次重要論戰的開展，這擴大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這兩次論戰一次是在民眾中自發產生並對公眾開放的，它最初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道牆上，即後來廣為人知的「西單民主牆」，後又擴散到全國其他城市。另一次是黨發起的論戰，只局限於黨內，它使一些知識分子和黨內主管文化政策的領導幹部走到了一起，探討他們在新時期工作的指導方針。

民主牆：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國的村鎮、城市社區以及公車站這類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傳欄上張貼官方公告和報紙，是一種延續了多年的習慣。北京最受公眾關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門以西幾百米處的西單一面牆上的宣傳欄。這道巨大的灰磚牆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長，它旁邊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車站之一，有多路公車交匯於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間，西單牆上貼滿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他們被稱為「走資派」——的大字報。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間，牆上又貼了許多譴責「四人幫」、歌頌周恩來和擁護鄧小平的大字報。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不到一周後，在新的政治氣氛下，報刊銷售點還尚未開售的共青團雜誌《中國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頁一頁貼到了牆上。共青團這個培養未來黨員的部門，此刻站在了群眾為擴大自由而努力的前線。這本共青團雜誌在文革期間被關閉，幾個月以前它成為最先獲得復刊批准的雜誌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勵下，

共青團的幹部把雜誌第一期送廠付印，計劃於 9 月 11 日發行。但是當時主管宣傳的汪東興看到打算刊出的內容後，立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評說，雜誌沒有華主席的題詞、沒有紀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

可是雜誌編輯部的人員並不那麼容易屈服。幾天後的 9 月 20 日，一些雜誌被送到了報刊銷售點。^[8-11]但是到了報刊銷售點後，汪東興馬上又讓人把雜誌全部收回，不許再發售，並禁止它再發行。11 月 19 日出現在西單牆上的，便是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發行的雜誌，這件事發生在北京市委決定給「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後。

張貼出來的雜誌引起了巨大的關注。這份共青團雜誌中的一些文章強烈要求為那些因參加「四五」遊行仍在蹲監獄的年輕人平反。還有一些文章反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問題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幫」，而且直接涉及毛澤東。有一篇文章說：「請大家捫心自問，沒有毛澤東的支持，林彪能獲得權力嗎？請大家捫心自問，難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沒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幫』能達到打倒鄧小平的目的嗎？」^[8-21]不難理解，毛澤東的前貼身衛士和忠實的維護者汪東興，為何會對這些批評感到惱火。

共青團的雜誌張貼出來以後，幾個大膽的人又開始張貼另一些材料，許多材料批評了 1976 年清明節的鎮壓。最初，一些路過的人對大字報連看都不敢看，更遑論張貼新的大字報。然而幾天以後，並沒有人受罰，尤其是有傳言說鄧小平支持張貼大字報的自由，於是人們變得大膽起來。經歷了信息受到嚴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後，很多人僅僅是好奇。還有些人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任何「錯誤觀點」都可能引致懲罰和侮辱，甚至被下放農村，所以仍然心有餘悸。然而隨著新的大字報在西單牆繼續出現，那裏開始瀰漫著一種興奮感。

有些人張貼詩詞、簡略的個人描述或哲學文章。有的大字報是用毛筆書寫的，也有的是用鋼筆寫在筆記本紙張上的詩文。許多大字報出自年輕人之手，他們是高幹子女，能窺探到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氛變化。還有一些貼大字報的，是因為突然獲得自由而異常興奮的年輕人，但他們一直生活在封閉的社會裏，缺少經驗和智慧去恰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文革的恐怖時期，個人不敢檢驗自己的觀點，群眾運動並不能使他們在策略上變得成熟。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們的批評者一樣，對國外的情況缺少體驗，知之甚少。他們開始質疑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又看到另一些國家在經濟上遠比中國發達，於是對西方民主表現出幾近天真的信仰。^[8-31]還有一些人寫道，他們被灌輸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全都是錯誤的。西單牆變成了聞名遐邇的「西單民主牆」，或簡稱「民主牆」，在最高峰時，每天有數萬群眾駐足於這道牆前。類似的牆也出现在了全國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報寫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報復採用了化名；也有些人為了要求得到賠償而採用真名實姓。一些偏遠地區的人，也千里迢迢來到城裏張貼他們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過迫害或有親人遇害的人，終於有機會訴說他們的遭遇。那些仍有親友在農村、監獄或被監視居住的人，要求為受害者恢復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親人，要求為他們的家人恢復名譽，以使他們自己能夠脫離苦海。在 1967 年後下鄉的 1,700 萬知青中，當時還只有大約 700 萬人獲准回城。^[8-41]很多抱怨來自於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機會、仍在農村忍受貧窮的人。還有一些政治上老練的人，隱晦地提到黨內正在發生的爭論，抨擊「兩個凡是」，要求重新評價「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兩個凡是」上公開作出讓步的次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和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8-51]鄧反問道：「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8-61]此外，葉帥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眾用大字報表達他們的觀點。

同一天下午，當《多倫多環球郵報》的約翰·弗萊澤（John Fraser）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一起去看西單民主牆時，圍在他們身邊的數百人聽說諾瓦克次日能見到鄧小平，便讓會講漢語的弗萊澤將一些問題轉告給諾瓦克，讓他向鄧小平提出。弗萊澤答應第二天下午向他們報告結果。當弗萊澤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回到民主牆時，有數千人已在等著聽鄧小平的答覆。當聽弗萊澤說到黨很快要為彭德懷正式恢復名譽時，喝彩聲響成一片。當他說鄧小平表示「民主牆」是一件好事情時，人們又釋然地報以歡呼。^[8-71]

隨著人群每天在西單牆前聚集，異常興奮的中國人渴望瞭解情況，急切地與外國人交談，向他們提出了一大堆有關民主和人權的既幼稚又極為真誠的問題。例如：你們國家由誰來決定報紙電台的報道內容？^[8-81]多年來一直希望民眾能表達自己的想法的外國記者，熱情地向本國報道了民主牆前真誠的交談和熱烈的氣氛。雖然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向中國人報道西單牆上的內容，但是它們透過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又傳回了中國。

西單牆前的群眾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幾周之後，有些人開始貼出有政治訴求的言論，要求民主與法治。北京的公安幹部報告民主牆附近有一些打鬥情況發生，並擔心那裏有增無減的人群可能會威脅到治安。事實上，鄧小平在 11 月

底與佐佐木良作的談話中就已經警告說，有些大字報的言論不利於安定團結和實現四化。但是，在民主牆出現一個月之後，當三中全會臨近結束時，中國的高層領導仍然願意支持用大字報表達意見的自由。例如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講話中說，這次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則是「人民民主的典範」。^[8-9]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鄧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員、也是為他寫三中全會講話稿的筆桿子之一于光遠叫到一邊，讓他草擬一篇支持西單民主牆的講話。他對於光遠說：「有點兒反對的聲音有什麼壞處？」^[8-10]儘管《人民日報》沒有報道西單的事情，但報社裏支持「民主牆」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發表了一篇大膽的社論〈發揚民主和實現四化〉，其中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真正可怕的倒是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害怕人民講話，實際是軟弱和神經衰弱的表現。……安定團結和發揚民主並不是對立的。」^[8-11]

民主牆上的言論在 1 月中旬變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寫有「全中國受迫害的人」的旗幟。他們宣佈「要民主，要人權」，從天安門遊行到中南海的大門口，這裏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要進入大門，但被武裝軍人攔住。目睹這些抗議者的英國外交官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憤怒的一群人。」^[8-12]

還有一些群體開始自印雜誌，向那些來看西單牆的人免費發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稱「中國人權聯盟」的抗議者印了一份「十九條宣言」，要求言論自由、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進行評價的權利、公開政府預算、允許旁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允許與外國大使館自由接觸、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這些憤怒的抗議發生在鄧小平出發訪美的前幾天，但鄧小平並沒有對此進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訪美前夕壓制「民主牆」，這種做法會被西方媒體報道，有礙訪問取得成功。然而，當 2 月 8 日鄧小平從美國和日本回來後，他沒有再讓于光遠給他看那篇支持「民主牆」的講話稿。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做過這次講話。^[8-14]到 3 月時，民主牆上張貼了更多抨擊中共統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於政府未加限制，人們變得更加大膽，他們開始批評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體制，甚至開始批評鄧小平。

3 月 25 日，曾經當過兵的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大膽邁出了突破舊框框的一步，他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點名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魏京生沒上過大學，這篇文章也缺乏對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彌補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個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監獄，母親被關起來後因不堪凌辱而自殺。魏京生本人曾被安排到新疆的邊遠地區工作，他所見到的乞討者讓他內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為什麼死了那麼多人，一些幹部卻享受著極為舒適的生活。他抨擊中共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遮掩這個事實上並未改變的階級鬥爭體制的弊病。他質問道：「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嗎？沒有。人民不想當家作主嗎？當然想……人民終於明白了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有了清楚的方向和真正的領導者——民主的旗幟。」^[8-15]魏京生的這些公開言論使他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關注焦點，他被奉為中國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頭號代言人。

大約就在這時，中國的對越戰爭（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已經結束，鄧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等國內事務（關於這場戰爭見第 18 章）。直到那時「民主牆」在政治上對鄧小平一直有很大價值：它使群眾能夠有一個渠道表明他們反對「兩個凡是」，反對「四五」事件的處理方式，反對毛澤東的錯誤；這為鄧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間，使他可以實行新的路線，而又不必親自參與這種批判。

鄧小平剛剛接過權杖時，可能理論上認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勵在黨內有更多的民主討論。但是，當抗議者吸引了大批群眾，開始反對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時，他斷然採取措施壓制了這種挑戰。正像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所說的，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雖然華國鋒是黨的主席和總理，但決定壓制批評的是鄧小平。3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的幹部根據正在發生變化的政治氣候和鄧小平本人的意見，發出規定宣佈：「禁止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大字報、書籍、雜誌、圖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國的帝制時代一樣，維持秩序靠的是統一命令，對為首者要嚴懲不貸，以儆效尤。3 月 29 日，即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要求民主的大字報四天後，他就被抓了起來，鄧小平的壓制也在繼續。魏京生被捕後，去西單民主牆的人一下子少了許多，只有少數大膽的人還在貼大字報。消息靈通的外國人估計，在隨後幾周裏北京大約逮捕了 30 人——與 1957 年或文革時期有成千上萬人被捕這一點相比可謂九牛一毛。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8-17]一些剩餘的大字報被轉移到了月壇公園，那裏距西單太遠，步行前往很不方便，遊客相對西單也少得多。媒體開始發表批評民主牆上一些大字報的文章。在月壇公園也派了幹部，查問想貼大字報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單位。^[8-18]西單的大字報在 1979 年 12 月才被

正式禁止，但是「民主牆」在 3 月底就已壽終正寢。據于光遠說，胡耀邦作為一名聽話的幹部公開支持了鄧小平的決定，但是參加過理論工作務虛會公開討論的幹部都知道，胡耀邦個人認為允許更大的自由並不會威脅到社會秩序。

民主牆被禁時，普通群眾中很少有人敢站出來抗議。^[8-19]雖然黨內有很多人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措施，認為這對阻止文革式的動亂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黨的幹部，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對鄧小平的決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遠看來，鄧小平從 12 月中旬支持「民主牆」到三個月後將其關閉，是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關鍵轉折點之一。^[8-21]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

1978 年 9 月底，葉帥擔心「兩個凡是」的擁護者和贊成「實踐標準」的人之間的爭論會造成分裂，於是提議開一個會，為黨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工作確立共同的基本指導原則。^[8-22]葉劍英對經濟工作務虛會的成功記憶猶新，他認為通過對理論原則展開自由討論，能夠把進入新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團結在一起。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在得到其他領導人的同意後，華國鋒正式宣佈了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計劃。^[8-23]

務虛會的第一階段從 1979 年 1 月 18 日開到 2 月 15 日，中間有從 1 月 26 日起的五天春節假期，主辦者是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8-24]會議的具體方案完成時，高層領導對「實踐標準」戰勝了「兩個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識。胡耀邦剛剛擔任了宣傳部長，保守勢力的領導人、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也作了檢討。負責籌備會議的人多是宣傳領域內思想開放的自由派幹部。胡耀邦在務虛會開幕式的全體會議上說明了會議的目的：檢討過去 30 年宣傳領域的工作，就黨如何支持對外開放和四化建設制訂藍圖。他讚揚了「四人幫」倒台後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進步，指出在倡導「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兩年的進步在最近幾個月裏有了新的收穫。胡耀邦又說，會議的第一階段一直開到 2 月中旬，將分成五個小組。^[8-25]第二階段是規模更大的會議，有來自全國各地宣傳部門的四百多名領導人參加，他們將為落實第一階段形成的共識制定計劃。

胡耀邦為各小組選定的召集人大都是來自報社、大學、研究機構或宣傳部門的一些思想開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儘管有些與會者，如吳冷西和胡繩，思想較為保守，但在五個小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胡績偉、于光遠、吳江和周揚——都是稍早進行的「實踐標準」論戰中的活躍分子，這場論戰間接批評了僵化的毛澤東正統思想；五人中的最後一個是跟于光遠關係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到會的兩個最重要的高級幹部是周揚和陸定一，1957 年反右運動期間他們在宣傳部門擔任要職，但後來他們都對反右運動十分後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張擴大自由的人。參加務虛會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北京的會議之後，很多地方也各自召開了類似的會議。^[8-27]

會議開始時民主牆前已經如火如荼，但西單的民主牆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群眾運動，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則自始至終都作了細心的安排。此外，西單的大字報作者和讀者都是在民主牆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參加務虛會的 160 人則是精心挑選出來的黨員，在一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幾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與民主牆上的大字報相比他們的討論更加細緻，反映著對黨史和世界局勢更全面的理解。儘管如此，這兩個場合也有著共同的基礎：即一種發自內心的願望，要為新時期營造更加開放的思想氣氛。這兩個場合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繫。《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是務虛會的成員之一，曾奉命彙報西單民主牆的情況。他去那兒看了之後，回來向務虛會的與會者彙報說，民主牆看起來氣氛活躍而平和，大字報上的言論是誠懇的。^[8-28]另一些參加務虛會的人根據自己對民主牆的觀察，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務虛會時，力求同時得到華國鋒和鄧小平兩個人的支持。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先請華國鋒過目批准，並在講話中讚揚了在華領導下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正忙於出訪美國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 1 月 27 日，即鄧動身前往美國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務虛會傳達了鄧聽取會議討論情況彙報時的講話。鄧小平說，現在誰也不清楚哪一種民主適合中國，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思考。他讓胡耀邦組織一個二十到三十個人的班子，搞清楚相關問題，然後準備一篇論述民主實踐的兩到三萬字的文章，在五卅運動 60 周年時發表。鄧小平說，文章要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將超越資產階級民主。^[8-29]

務虛會上的氣氛可以用《人民日報》前總編吳冷西的遭遇作為一個縮影。吳過去一直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被要求寫一份檢討，但他的第一份檢討被判定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寫了一份。自由派正在佔上風，但他們所採用的手法，與過去為支持極左事業而採用的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黨內團結的做法相類似。與會者提醒吳冷西說，鄧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明確告訴他，《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要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精神。吳冷西承認，他是因為不想損害毛澤東的威望才贊成「兩個凡是」。他承認自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會議開幕詞鼓勵與會者解放思想，暢所欲言，這在他們中間引起了熱烈的反響。^[8-31]新的氣氛突破了限制，使人們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評黨內事務。與會者可以批評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線，以便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間。《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強烈主張更大的自由，他在發言中談到一個問題：毛澤東及其少數幾個追隨者為何能把全國人民帶入大躍進這樣的災難？他指出，1957 年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讓他們變得噤若寒蟬，因此無法阻止毛澤東犯下可怕的錯誤。人民大學的哲學教授張顯揚走得更遠，他將「四人幫」稱為「法西斯專政」。後來擔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則提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應當對所有幹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從務虛會一開始，有些人就擔心一旦政治風向有變，最高領導人再度變得保守，他們就有可能惹上麻煩。一個與會者說，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齊放」時那樣，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於受到懲罰。^[8-33]

就像這類會議通常的做法一樣，印好的會議總結材料被分送給未出席會議的高層領導。有些高層領導看過報告後批評說，會上的理論家們走得太遠了。同時，香港和外國記者開始談論「非毛化」，這迫使中國領導人要證明他們沒有這樣做。有些領導人甚至擔心，赫魯曉夫實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黨的權威，理論家們有可能步他的後塵。^[8-34]黨內的老幹部們確實開始批評說，務虛會上的觀點很危險，理論家們近乎在批評毛澤東時代發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時代擔任要職的老幹部擔心，對毛澤東日益高漲的批評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牽連。有些人開始懷疑，胡耀邦等人在務虛會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黨的「修正主義」。

以某些老幹部為一方，以「民主牆」和務虛會上大膽敢言的人為另一方，這些人之間的裂痕被證明是難以彌合的。^[8-35]在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上支持鄧小平的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開始表示擔心：對黨的批評正在走得太遠，有可能威脅到黨維護紀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覺察到了保守派反擊的危險，他警告與會者說，有些個人的批評超出了善意批評和黨員行為準則的界限。在 2 月 28 日中宣部召開的新聞工作者會議上，胡耀邦又說，毛澤東雖然犯過錯誤，「但我們必須客觀地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8-36]然而這些話並不足以阻止黨內保守派繼續批評他和務虛會。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

3 月 16 日，即中國軍隊打了一個月的仗後撤出越南的當天，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對對越戰爭作出說明。此時他已經完成了訪美和對越戰爭，因此能夠重新關注國內的基本政治問題。他向與會者保證，總的形勢是好的，有利於全國的安定團結，但是他警告說，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因此必須堅定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他警告說，不然的話，黨本身也會受到攻擊，這有可能導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定，對整個這段歷史的否定。鄧小平認為，為了維護安定團結，黨應當把對一些歷史問題——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先放一放。這位中國頭號領導人提醒說，報紙對這個問題必須當心。^[8-37]

鄧小平看了務虛會第一階段小組會的報告後，同意其他高層領導人的觀點，認為黨內理論家在批評中共和毛澤東上已經走得太遠。毛澤東在 1957 年發動「雙百運動」後感到知識分子的批評太過分，鄧小平在 1979 年也覺得知識分子再一次走過了頭。然而，他接受了毛在 1957 年進行反擊的教訓，他不想作出過度的反應，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與此同時，支持「民主牆」和務虛會第一階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說，由保守派的胡喬木和鄧力群監督起草的會議總結報告誇大了對黨的批評，目的是為了刺激鄧小平，讓鄧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討論的人決裂。^[8-38]鄧小平對《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尤其氣憤，他不但批毛，還讓香港媒體發表了他的觀點。像黨的其他高層幹部一樣，鄧小平始終認為，黨內領導人的意見分歧不應當公之於眾。

在準備務虛會的講話時，鄧小平再次諮詢了胡喬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階段的務虛會。鄧小平在 3 月 27 日與胡喬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討論了講話草稿，這是在魏京生貼出那張讓黨內老幹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報兩天以後。鄧小平想要允許比毛時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確立一些原則，明確劃定哪一些政治言論可以接受，哪一些則不可接受。他對胡喬木、胡耀邦和其他講話起草人說，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說明自由的界限。^[8-39]雖然準備這篇講話只用了兩三天時間，但它不僅為務虛會第二階段定了調子，而且成為此後二十多年判斷文章、書籍或電影在政治上是否違規的指導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1979 年 3 月 30 日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闡明了不容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間劃定了界線。寫作不能挑戰以下四點：（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的領導；（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仍然承認，中國在某些領域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犯下嚴重錯誤，也會出現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幫」造成的情況。但是他否認中國的問題是由社會主義造成的；在他看來，中共統治之前的封建歷史和帝國主義才是成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縮小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還會繼續縮小這種差距。此外，儘管允許「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這仍然是現代化的基礎，但是為了對付反對社會主義及其社會秩序的敵對勢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敵特人員和犯罪分子——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必要的。他說，就像現代化一樣，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發展。^[8-40]

如果鄧小平認為有什麼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受到批評時他會本能地發怒，強調公開批評黨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認「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他說，歷史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但人民會對這個人表達崇敬。^[8-41]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氾濫的批評，能幫助鄧小平弱化對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堅持，不再死板地解釋毛澤東說過的每一句話，為批評黨在過去 20 年的錯誤創造了空間。但是，鄧小平仍不想讓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現，他仍要在公眾面前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形象。

葉帥希望統一全黨思想的目標未能達成，因為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願望與頑固保守派的擔心之間的裂痕太大，難以用一團和氣的辯論加以彌合。^[8-42]最終，鄧小平還是要自上而下地強行貫徹統一——他發表了一篇強硬的講話，並以國家權力作為後盾。鄧小平見過黨內分裂，並對此深惡痛絕，他深信，如不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中國還不足以達成國家團結。在鄧小平 3 月 30 日的講話之後，務虛會分成 12 個小組，與會者就如何貫徹鄧小平的指示討論了 3 天。

作為一名遵守紀律的黨員，胡耀邦於 4 月 3 日在務虛會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8-43]但是，在務虛會第一階段聽過胡耀邦講話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8-44]儘管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於現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劃定自由的界限上，他們的分歧卻愈演愈烈，最終導致鄧小平在 1987 年決定將胡耀邦撤職。

黨內領導人固然理解鄧小平的講話，但對知識分子來說，隱含的信息是令人沮喪的：自由的範圍已經收窄。民主牆未被正式關閉，但鄧小平的講話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對繼續貼大字報者的恐嚇，「民主牆」結束了，文化領域將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的希望也隨之破滅。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難以忘記「民主牆」那段熱情洋溢的時光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富有洞見的思想探討。中國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對新政策並不服氣。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所導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線，也逐漸反映在官方的媒體上，而參加務虛會的人也開始努力適應新的政治現實。《人民日報》5 月 5 日的一篇社論說：「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可以為所欲為……但我們主張的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8-45]下級幹部按照更為收緊的新路線開展宣傳。^[8-46]很多知識分子對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與毛澤東在 1957 年的反右相比，鄧小平的反應要有節制得多。鄧小平知道要實現現代化，他需要知識分子的合作。四項基本原則宣佈之後，知識分子在公開批評中共上變得更加謹慎，不過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職。^[8-47]一些最著名的批評者獲准出國居住，在國外繼續發表言論。事實上，從 1979 年到 1992 年這個時期，大趨勢是自由討論的空間在不斷擴大。雖然不滿於那些愚蠢而隨意地管制言論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尋機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為言論自由設定一勞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鄧小平允許嘗試新觀念，讓知識分子與他合作，他就得允許比 1978 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 1979 年 10 月底的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大會上，鄧小平盡力維持著自由與控制之間的這種微妙的平衡，採取的辦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動接受大多數知識分子，同時斥責那些他認為可能威脅到中共權威的批評。在準備大會的講話稿時，鄧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給了周揚一份——周在 1950 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 年代後期卻變成了為知識分子爭取更大自由的帶頭人。周揚建議鄧小平不要長篇大論，鄧按照他的建議唸了一篇簡短的賀詞，他讚揚了中國人民的藝術創造力，肯定了他們在 1950 年代取得的進步，批評了林彪和江青對創作自由的限制。他說，展望未來，他期待著文化領域的繼續進步。他的講話博得了文學藝術界人士的熱烈掌聲，包括那些仍對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感到不滿的人。^[8-48]不像 1957 年的毛澤東，1979 年的鄧小平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繼續為四化積極工作。但是，在鄧小平統治時期，到 1992 年他退出政治舞台為止，在自由的邊界問題上他將面對持續不斷的拉鋸戰。^[8-49]這場拉鋸戰最終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導致了一場悲劇。

- [8-1]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8-2]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8-3]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237, 243–244.
- [8-4]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241.
- [8-5]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8-6]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196–197; 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Merle 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and the Theory Conference of 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23.
- [8-7]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23–225, 237, 243–244.
- [8-8]*Ibid.*, pp. 220–221.
- [8-9] 胡 績 偉：
〈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
<http://www.shufa.org/bbs/viewthread.php?tid=85030>（2010年8月6日訪問）。
- [8-10]2001年1月對於光遠的採訪。
- [8-11]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47.
- [8-12]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5.
- [8-13]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431–434.
- [8-14]2001年1月對於光遠的採訪。
- [8-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31–233, 263–284.
- [8-16]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7.
- [8-17]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57–259.
- [8-18]一位西方學者的觀察，無日期。
- [8-19]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9.
- [8-20]朱佳木：〈胡喬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的41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308。
- [8-21]2001年1月對於光遠的採訪。
- [8-2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33。
- [8-2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321–325。對務虛會的記述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上冊，頁293–315、341–34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355–367、385–387；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0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69–82；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73–356。
- [8-24]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328。
- [8-25]發言全文見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冊，頁355–367。
- [8-26]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 229–237；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323–327。
- [8-27]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370–371。

[8-2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06；《國史·第 10 卷》，頁 67；2001 年 11 月作者對王若水的採訪。

[8-2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06；《國史·第 10 卷》，頁 67。

[8-30]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42–347。

[8-3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21–333。他的講話的部分內容見頁 321–323。

[8-32]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50–54.

[8-33]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29–235.

[8-34]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67–370。

[8-35]《國史·第 10 卷》，頁 65–74。

[8-3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22–324。

[8-37]DXPNP-2, 1979 年 3 月 16 日，頁 493。

[8-38]Ming Ruan, *Deng Xiaoping: The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 56.

[8-39]DXPNP-2, 1979 年 3 月 27 日，頁 498–500。

[8-40]SWDXP-2, pp. 183–184.

[8-41]SWDXP-2, pp. 181–183.

[8-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6–139。（葉劍英對鄧小平的講話不以為然。見頁 137。）

[8-43]〈胡耀邦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結束語〉，1979 年 4 月 3 日。這個講話的摘要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頁 345–347。

[8-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8–139。

[8-45]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36–237.

[8-46]《國史·第 10 卷》，頁 165–247。

[8-4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5–137。

[8-4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55–156 頁。

[8-49]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及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 9 章

蘇聯和越南的威脅：1978—1979

1977 年夏天鄧小平重新掌管國防和外交工作後，面對著兩個首當其衝的問題：一是對抗蘇聯和越南的威脅，維護國家安全；二是為爭取外國對中國現代化的幫助打下基礎。^[9-1]為了減少蘇聯的軍事威脅，他努力加強與鄰國的關係，阻止蘇聯的勢力擴張。為了給中國的現代化爭取幫助，他轉向日本和美國。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在 1978 年 1 月後的 14 個月裏出訪多國，訪問的國家數量超過了他一生其他時間到訪國家的總和。在這些出訪中，他改善了中國與亞洲大陸鄰國的關係，使中國的開放程度超過了 1949 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他使中國不可逆轉地走上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這五次出訪中，他去了緬甸、尼泊爾、北韓、日本、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和美國。在這 14 個月裏，鄧小平還同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與美國進行了關係正常化談判，並將中國帶入了一場對越戰爭。

鄧小平擔負起外交職責

1977 年夏天恢復黨內工作時，鄧小平並不想主持外交事務。有一次他甚至說，他不願承擔這項工作，因為它太耗神了。可是中國需要鄧小平主管外交，不僅因為 30 年來他幾乎一直陪同毛澤東或周恩來接見外賓，而且他本人從 1973 年夏天到 1975 年底就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指導下負責外交事務。他的同事都認為，周恩來去世之後，在外交知識、戰略思想、與外國領導人的個人關係以及既爭取外國人的善意又堅定地維護中國利益這些方面，其他領導人都難以與他相比。中國的外交官可以具備有關其他國家和以往談判的豐富知識，例如黃華^[9-2]——1976 年 12 月他取代喬冠華成為外交部長，但往往缺少作出重大政治判斷的自信，也沒有足夠的地位與外國領導人平等相處。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工作。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頂級的戰略家，他們充滿自信，能夠與外國領導人平等地打交道。在 1978 年以前，雖然中國仍然比較封閉，但他們都把外交視為大事，親自承擔著領導外交的工作。

毛澤東會見外國人時散發著帝王般的自信，談論哲學、歷史和文學，縱論天下大勢。周恩來在國內外會見外賓時，則表現得博學而儒雅，他態度親切，體貼入微，對客人照顧得十分周到。他既談大事，也願意討論細節。

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對國家有著出於本能的忠誠，具有戰略眼光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立場。也同他們一樣，鄧小平在會見外國人時，不但要完成既定的會談內容，還會努力摸清來訪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與毛和周相比，鄧關注與中國有關的重大問題時更有系統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會見外賓前，鄧小平不接受口頭的情況簡介；他會閱讀下屬準備的有關來訪者及其來訪目的和應討論議題的文件。像過去毛和周的情況一樣，通常會有一名外交官先行會見外賓，由他把來訪者的意圖告知鄧小平，鄧小平再接見他們。

駐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鄧小平，認為他是個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國來訪者也很喜歡鄧小平，他機智、專注，講話直言不諱，願意解決問題。喬治·布殊在 1975 年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時經常與鄧小平見面，他說：「他態度明確，講話直率，使人不會誤解他的意思。」^[9-3]黃華曾多次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國外的來訪者，他在談到鄧小平時說：「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問題，深刻理解並簡單說明問題的實質，果斷並且直截了當地作出判斷和決定。」^[9-4]

毛澤東對中國懷有過於宏大的、超越了現實國情國力的構想。鄧小平與毛不同，他一向很現實，承認中國的弱點和落後。但是他也具備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著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它有著悠久而偉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來自他個人戰勝重重挑戰而取得成功的經歷，也來自於他對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全面瞭解。和蘇聯的一些領導不同，他無意討好洋人。無論洋人如何擺出泰山壓頂的氣勢，他從不自覺矮個半截。相反，他在與外國領導人打交道時，把他們視為解決問題的夥伴，很快就直奔主題。由於沒有心理負擔，他便能既不畏強也不凌弱地堅決抵制他認為不符合中國利益的外來壓力。

但鄧小平並非總能展示這種自信。1974 年他第一次訪問紐約，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他的講話讓人覺得拘謹而刻板，因為他知道自己部下會把他的一言一行彙報給毛澤東。他在 1975 年時仍然很小心，因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上他仍要得到毛澤東的首肯。鄧小平也承認，周恩來的知識和經驗遠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後，他就可以自主地與外國領導人談判，不用擔心他人的意見。1977 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後，延續了他在 1975 年的政策。但是在這一年 7 月之後見過他的外國官員覺得，他變得更加從容自信，更願意就廣泛的外交政策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

從 1977 年 7 月到 1979 年底，他在同外國領導人會談時總會恭敬地提到「華主席」。但是自 1977 年他復出，外國客人就從未懷疑過他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當家人。他不但是代表中國的談判者，而且是偉大的外交戰略家。雖然他也閱讀外交官的報告，但在重大決策上，他更多依靠自己老到的判斷力。他之所以能表現得輕鬆自如，是因為他對當下的問題與總體戰略的關係有著可靠的理解，對自己和對手交涉的能力充滿自信。在與外國人的會談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先說幾句機智的開場白，對外國客人表示歡迎，然後迅速專注於他要討論的議題，直率、明確、強而有力地表明自己的觀點。

以蘇聯為大敵

鄧小平的戰略分析起點和毛澤東是一樣的：分清主要敵人，廣結盟友與之對抗；分化敵人的盟友，使其疏遠敵人。到 1969 年，蘇聯顯然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主要敵人——這一年 7 月尼克遜總統在關島宣佈，美國不會涉足亞洲大陸的戰爭；而 3 月和 8 月的兩次邊境衝突後，中蘇關係依然劍拔弩張。

1975 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和越南便趁此機會，填補了美國撤軍留下的空白。在鄧小平看來這加劇了對中國利益的威脅。他的結論是，蘇聯決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越南則想成為東南亞的霸主。因此中國要與大致處於同一緯度的另一些國家——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形成對抗蘇聯的「一條線」。同時，中國要努力使另一些國家——比如印度——疏遠蘇聯。

1977 年鄧小平復出時，蘇聯和越南正加緊合作，擴張它們在東南亞的勢力，這讓鄧小平感覺到日益增長的威脅。越南允許蘇聯使用美國在峴港和金蘭灣建造並留下來的現代化軍港，這將使蘇聯軍艦能夠自由出入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整個地區。越南還建設導彈基地，裝備了瞄準中國的蘇製導彈。蘇聯則向基地運送人員和電子設備，為其提供技術支持。蘇聯沿中國北部邊境駐有重兵，還預謀入侵阿富汗，而中國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蘇聯合作，這使局勢變得更加危險。同時，越南已經控制了老撾，並且正在策劃入侵中國的盟友柬埔寨。鄧小平，像下中國圍棋的棋手一樣，認為這些國際變化等於是在不同地點佈下棋子，欲將對手圍而殲之。在他看來，中國正處在四面受敵的危險之中。

在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中，鄧小平認為蘇越結盟對中國的威脅最大，因此假如中國能對越南這顆棋子大膽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蘇聯的包圍。他說，越南人趕走美國兵之後，開始變得趾高氣揚。1978 年 5 月布熱津斯基與鄧小平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小平對越南背信棄義的嚴厲譴責曾讓他感到吃驚。1978 年見過鄧小平的另一個外交官也說，只要一提到越南，鄧小平就不由自主地發怒。^[9-5]

鄧小平與越南的關係

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的角度來說，鄧小平都有被越南出賣的感覺，因為中國曾為越南反抗美國作出了巨大犧牲，而 50 年來他跟越南人也有著深厚的個人交往。半個世紀以前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與越南人一起參加了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鬥爭。鄧小平和胡志明（Ho Chi Minh）在上世紀 20 年代初都在法國，他們兩人當時是否見過面，已經無從考證，但鄧小平 1930 年代末確實在延安見過胡志明。周恩來則在法國時就認識胡志明，1920 年代中期他們還是黃埔軍校的同事。鄧小平在 1920 年代末被派往廣西時，曾數次取道越南，得到過越共地下黨的協助。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初，鄧小平和越南共產黨人曾是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革命戰友，1954 年以後他們卻又成了致力於維護各自國家利益的政府官員。

鄧小平的前部下韋國清將軍也與越南淵源很深。韋國清曾在廣西省和淮海戰役中供職於鄧小平手下。他是廣西壯族人，鄧小平 1929 年在他的家鄉建立過革命根據地。鄧小平後來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1954 年越南跟法國人打仗

時缺少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中國派去的韋國清將軍在指揮奠邊府戰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韋國清拒絕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務也是由中國飛行員執行的。

鄧小平理解中越關係的複雜性——因為國家利益發生了變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於數百年來中國的入侵和佔領，越南愛國者把中國視為大敵。他很清楚，越南想從中國和蘇聯雙方都得到盡可能多的援助，因為當時兩國都極力想將越南向自己拉近。他還明白，儘管中國認為韋國清將軍和中國志願部隊對奠邊府大捷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但越南人仍然對中國感到失望，因為當他們在 1954 年日內瓦和會上為統一國家而努力時，中國沒有為他們提供支持。^[9-6]鄧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 1965 年寫下的遺囑中說，越南要成為主宰印度支那的強國，而中國並不認同這種說法。^[9-7]他還知道，中國從 1972 年開始犧牲中越友誼跟美國改善關係，這也讓越南人心中不快。

但是，中國一向十分慷慨地幫助北越對抗美國。當越共總書記黎筍（Le Duan）在 1965 年 4 月 18 至 23 日訪問北京，為了對付美國對北越不斷升級的空中打擊尋求幫助時，劉少奇主席對黎筍說，無論越南需要什麼，中國都會盡力提供。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去機場迎接黎筍，陪同劉少奇與他會談，又去機場為他送行。^[9-8]此後，中國在國務院下面設了一個協調援助北越的小組，其成員來自政府的 21 個分支機構，包括軍事、運輸、建設和後勤等等。根據中方紀錄，從 1965 年 6 月到 1973 年 8 月，中國向越南共派出 32 萬志願部隊，為其提供防空武器、軍械修理、公路和鐵路建設、通訊、機場維護、排雷、後勤等各種支援。最高峰時，同時駐紮在越南的中國軍隊達到 17 萬人。據中方的報告，中國在越戰期間的傷亡人數約為 4,000 人，但有些中國學者估計傷亡者數以萬計。鄧小平在 1978 年對李光耀說，美國在越南期間，中國向越南運送的貨物按當時價格計算在 100 億美元以上，甚至超過了南北韓戰爭時中國對北韓的援助。^[9-9]隨著援越規模的擴大，中國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輔助物資也都運往越南。^[9-10]

鄧小平在 1965 年曾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結束和蘇聯的關係，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南的拒絕。當美國加大對北越的轟炸力度時，越南人為了自衛，更多地轉向蘇聯這個擁有高科技和現代武器的國家；在中蘇爭執中，蘇聯也利用這種實力向越南施壓，使其向自己靠近。

越南在 1960 年代中期不再批評「蘇聯修正主義」，中國為了表明對越南與蘇聯加強關係的不快，從越南撤出了一個師。中越之間的嫌隙越來越深。當 1966 年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胡志明時，他們對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明說，中國軍隊的傲慢表現就像歷史上經常入侵越南的中國軍隊一樣。鄧小平回答說，駐紮在那裏的 10 萬中國軍隊只是為了防範西方可能的入侵，周恩來則提出撤回軍隊。^[9-11]但是越南沒有要求他們撤軍，而中國繼續向越南提供大量軍需物資和武器裝備。

胡志明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中國住過多年，他努力與中國和蘇聯都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但是 1969 年 9 月他去世後，中越關係開始惡化，中國的援助也隨之減少，最後中國從越南撤出了軍隊。^[9-12]而中國在 1972 年尼克遜訪華後改善了中美關係，隨後減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這視為中國人背叛越南抗美戰爭的一個標誌。^[9-13]

美國人撤出越南後，蘇聯為重建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慷慨提供了大規模援助。與此相對照，在 1975 年 8 月 13 日，即美國人撤出越南後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蒼白的周恩來在醫院裏對越南最高計劃官員黎德壽（Le Thanh Nghi）說，中國已經無力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國被文革搞得元氣大傷，自己的經濟也捉襟見肘。周恩來說：「你們越南人得讓我們喘口氣，恢復一下元氣。」但是就在同一個月，中國其他官員歡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來，並答應在未來五年為他們提供十億美元的援助。^[9-14]那時蘇聯正在與越南加緊合作，中國則與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東南亞稱霸。鄧小平後來對李光耀說，停止援越不是因為中國難以同蘇聯的援助數量一爭高下，而是因為越南人要在東南亞謀求霸權。蘇聯很願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從中漁利，但中國不想這樣。

一個月後的 1975 年 9 月，越南最高領導人、越共第一書記黎筍率團訪問北京，希望避免與中國徹底決裂。他們想得到中國的部分援助，以便對蘇聯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處在毛澤東監督下的鄧小平接待了這個代表團的來訪。他和黎筍有著一樣的目標，不要讓兩國的關係徹底鬧翻。鄧小平去機場迎接代表團，在宴會上致歡迎辭，與黎筍連續會談，又去火車站為他們送行。^[9-15]他促成了一份在 9 月 25 日簽署的協定，向越南提供一小筆貸款和為數不多的物資援助。^[9-16]假如鄧小平在 1975 年以後仍然任職，他也許能暫時緩和越南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敵視和兩國當時的分歧。然而在鄧失勢後，「四人幫」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要求越南譴責蘇聯的「霸權」。^[9-17]中國激進派的這種要求對黎筍來說太過分了，他拒絕簽署聯合公報，未舉行常規的答謝宴會就離開了北京。^[9-18]

一個月後黎筭抵達莫斯科，在那兒如願得到了蘇聯長期援助的承諾。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於蘇聯，但它迫切需要為重建國家獲得幫助。黎筭沒有中國（或其他國家）做後盾去抵制蘇聯的要求，只好簽署了支持蘇聯外交立場的協定。^[9-19]越南與蘇聯的這些協議把越中關係推向絕境，促使中國加強了與柬埔寨的關係。^[9-20]

1977 年初越南駐華大使說，假如鄧小平重新掌權，他會更加務實地處理分歧，中越關係將得到改善。如果說中國在鄧小平 1975 年下台後有什麼外交政策的話，那麼這種外交政策也只是充斥著革命口號，既缺少眼光，更不講究表達技巧。^[9-21]激進派實際上切斷了中越的關係，把越南進一步推向蘇聯。鄧小平失去外交控制權後不久，越南在 1975 年 11 月 9 日宣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為南北統一作準備。其他共產黨國家都發了賀電，唯獨中國沒有。會議三天後，《光明日報》一反鄧小平承認南沙群島存在爭議的態度，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文章，把南沙群島稱為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9-22]（1976 年 4 月鄧小平被正式撤職後，受到的批判之一正是他支持就南沙問題與越南談判。）^[9-23]1976 年，東歐各國、北韓和蘇聯應越南的請求全都答應援助越南，只有中國除外。鄧小平和黎筭維持兩國關係的努力，在激進派的手裏付諸東流。

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捕後，有過一段中越兩國領導人試圖改善關係的短暫插曲。1976 年 10 月 15 日，「四人幫」被捕後沒幾天，越南官員期望中國現在會採取更加友好的政策，為他們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一定幫助，便向北京提出了提供經援的請求，但是卻沒有回音。1976 年 12 月，有 29 個兄弟共產黨派出代表團去河內參加了越共代表大會，而華國鋒領導下的中國甚至沒有對此邀請作出答覆。1977 年 2 月，鄧小平復出前五個月，北京對一個來訪的越南代表團簡單地重申，以後不會再提供任何援助。^[9-24]

中越衝突的前奏

如果鄧小平在 1975 年底沒有被趕下台，他也許能避免中越兩國的徹底決裂。但是他在 1977 年 7 月恢復工作後面對的局面已經改變：蘇越合作有增無減，中國和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都已嚴重惡化。

鄧小平復出的幾個月前，越南的武元甲將軍（Vo Nguyen Giap）於 1977 年 3 月和 5 月兩次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署了擴大雙方軍事合作的協議。^[9-25]蘇聯開始向金蘭灣和峴港的海軍基地派出人員，這預示著蘇聯軍艦不久將會遊弋於中國的所有海岸。此外，在越南與中國和柬埔寨的邊境地區，越南軍隊與兩國之間的摩擦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越南過去對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共產黨國家的經貿組織）一直遲疑不決，因為它要求越南放棄它所珍視的一部分經濟自主權。但是在 1977 年 6 月 28 日，迫切需要重建經濟但又沒有其他經援來源的越南，同意加入經互會。^[9-26]

與此同時，華人開始逃離越南。越共領導人在 1975 年奪取南方後，著手對經濟實行大規模的集體化和國有化。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開始打擊南越的 150 萬華人，其中很多是反對集體化的小商人。越南領導人擔心，假如入侵柬埔寨或是與中國邊境衝突加劇，華人有可能轉而反對他們。他們發動了規模浩大的運動，把大批華人成群結隊送往拘留中心，致使很多華人逃離越南。中國政府要求越南停止迫害當地華人，但越南官員置若罔聞。當 1977 年 7 月鄧小平復出時，最終導致大約 16 萬華人背井離鄉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9-27]1978 年 5 月，中國中止了 21 個援越項目以示報復。^[9-28]鄧小平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國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讓越南疏遠蘇聯。^[9-29]

就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從十分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在 1978 年，中國所面臨的威脅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種更大的危險：假如蘇聯繼續擴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將導致蘇聯和越南對中國的包圍。鄧小平在向西方人解釋這種局勢時說，越南就像亞洲的古巴，它是中國旁邊的一個基地，蘇聯能在這裏佈置它的軍艦、飛機和導彈。就在十幾年前的 1962 年，由於美國威脅動用其優勢軍力，蘇聯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然而蘇聯的軍力遠勝過中國，如果它把導彈部署到越南，中國無論如何也難以迫使蘇聯拆除它們。鄧小平認為，在這些基地強大起來之前，亟須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

鄧小平在出訪的 14 個月裏，只訪問了一個共產黨國家——北韓，其他七個全是非共產黨國家。他首先訪問了一直與中國關係良好、能幫助中國加強邊境安全的幾個國家。在他的五次出訪中，前三個都是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就像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一樣，鄧小平也需要靖邊，但是為了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攻勢，他還要爭取得到這些國家的合作。

之後他又出訪了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最有助於中國的四化建設，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有助於遏阻蘇聯和越南。歐洲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幫助的另一個重要地區，不過鄧小平 1975 年的訪法已經使中歐合作有了保障，與歐洲的後續安排可以由谷牧的代表團去處理，不需要鄧小平再次到訪。

出訪緬甸和尼泊爾：1978 年 1–2 月

鄧小平接過外交工作後第一次出訪的兩個國家是緬甸和尼泊爾，它們與中國西南部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國和緬甸的共同邊境大約有 2,170 公里，與尼泊爾的有近 1,360 公里。鄧小平的首要目的不是與這兩個國家簽署任何具體協議。因為野蠻的紅衛兵曾使中國的所有鄰國感到害怕，所以為了發展良好的合作關係，首先要修補好籬笆。有了更好的關係，與中國接壤的國家才會更願意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勢力在該地區的擴張。

儘管對紅衛兵的記憶猶存，緬甸和尼泊爾都與中國有較好的關係。例如，鄧小平訪緬時能夠利用與該國將近 20 年的友好關係，這種關係相對而言沒有受到文革的影響。中緬兩國在 1960 年就解決了邊界糾紛。1962 年奈溫(Ne Win)發動政變後，緬甸一直孤立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但中國與它維持著密切關係，包括在建設發電站等基礎設施項目上提供幫助。周恩來至少出訪過緬甸 9 次；到 1977 年止，從 1962 年到 1981 年統治著緬甸的奈溫將軍先後 12 次訪華。^[9-30]1969 年中緬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曾於 1977 年到訪緬甸，鄧小平本人則在北京兩次接待過奈溫。在其中一次訪問時，鄧小平敦促奈溫加強與中國的附庸國柬埔寨的關係，當時後者已處在越南的壓力之下。奈溫訪問北京一周後，便成了第一個訪問柬埔寨的國家首腦。

鄧小平在緬甸講話時很謹慎，他恭敬地提到華國鋒主席，甚至重複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但是就在這一年內不久以後，隨著黨內氣氛開始脫離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個人地位的上升，這些說法就從他的講話中消失了。鄧小平相信，為了深化關係，訪問其他國家時不應只跟政治領導人會面，還要表現出對當地文化和社會的喜愛。他在緬甸和不同社會團體的重要領袖交談，通過參觀著名的佛寺和其他場所，向當地文化表達敬意。由於佛教在中國也廣泛傳播，通過佛教顯然可以形成文化紐帶。他在講話中強調中緬友誼源遠流長，並且談到兩國對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勢力持有共同的觀點。

奈溫對中國繼續跟緬甸和東南亞各地的共產黨叛亂分子保持聯繫表示關切，而中國至今仍不打算切斷這種聯繫，這個問題限制著中緬合作的範圍。但是在鄧小平訪問之後，兩國增加了文化交流，次年又簽署了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更重要的是，儘管緬甸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但是在中國與蘇越霸權的鬥爭中，它進一步偏向了中國。^[9-31]

和緬甸一樣，尼泊爾也給予鄧小平熱情的歡迎。在五六十年代，尼泊爾力求在印度和中國之間保持中立，但是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對尼泊爾採取強硬路線後，尼泊爾的比蘭德拉國王(Birendra)轉而向中國尋求支持。中國支持尼泊爾建立和平區，擴大對尼泊爾的援助，與尼泊爾開通直達航線，同意開展高層官員的互訪。比蘭德拉國王還在 1976 年 6 月訪問了四川和西藏。

鄧小平在尼泊爾參觀了寺院、博物館和一些歷史遺跡。他談到中尼兩國兩千年的友誼，重申了中國對比蘭德拉國王建立和平區的支持。鄧小平說，每個國家都渴望獨立，他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加強合作，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其他外來強權。他說，兩個超級大國的相互對抗在南亞造成了嚴重的不穩定，但這種不穩定的局勢對於這兩個大國來說也仍然是不利的。中國將繼續幫助尼泊爾維護國家獨立。他不但避免批評印度，而且在尼泊爾傳遞出有可能打動印度的信息：中國將幫助該地區的所有國家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鄧小平在為改善中印關係鋪路，希望這有助於使印度疏遠蘇聯。

^[9-32]

鄧小平在 1978 年 1 月還沒有充分的自主權，他不能過於背離毛的思想。就像在緬甸一樣，他不但談到要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並且表示要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外交政策。^[9-33]還要再等上幾個月，北京才能達成新的共識，使鄧小平能夠向階級鬥爭說再見。不過，鄧對緬甸和尼泊爾的訪問十分順利，有助於加強兩國與中國的合作。

出訪北韓：1978 年 9 月 8–13 日

越南一旦和蘇聯聯手，中國能否與亞洲另一個較大的共產黨國家北韓維持良好關係、不使其變成另一個「亞洲的古巴」，就變得更加重要了。金日成能說一口流利漢語，他在中國總共住了將近 20 年，直到 1945 年才回到北韓。他回國後繼續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保持著密切關係，毛周則在南北韓戰爭期間派出大量軍隊（「志願軍」）幫助北韓，並從東北為其提供後勤支持。北韓和越南一樣，巧妙地利用中蘇之爭獲取雙方的援助，雖然總體而言它更偏向於中國。

鄧小平與北韓的關係，得益於 1953 年他擔任財政部長時開展過援助南北韓戰後重建的項目，也得益於他在 1975 年 4 月接待過金日成。^[9-34]北韓首都與北京的距離，相比於其他任何國家的首都都是最近的，它和中國的關係也比與蘇聯的更為密切。1977 年夏天鄧小平復出後，接待的第一個外國官員就是北韓駐華大使。^[9-35]1978 年華國鋒出訪了四個國家，鄧小平出訪了七個國家，但只有北韓是他們兩人都去過的國家。作為兩個共產黨國家，中朝之間不但維持著他們政府之間的關係，還維持著兩國的黨和軍隊之間的關係，而中國利用了所有這些渠道。南北韓戰爭期間並肩作戰的兩國將軍經常會面，中共的中聯部與北韓的同行也一直保持來往。

中國決定發展中美關係，而美國是對北韓的敵人南韓提供幫助的大國，這會深深觸怒北韓。鄧小平不久後將出訪日本，後者是北韓長久以來的敵人，並且也在幫助南韓發展經濟，這同樣會引起北韓的嚴重關切。鄧小平要應付的一個棘手問題是，與日美恢復關係時，如何盡量減少對中朝關係的傷害。鄧小平不想讓北韓更加靠近蘇聯。因此他決定，上策是事先向北韓人作出充分解釋，不使他們事後感到意外。

鄧小平為給兩國關係加溫作出了特別的努力，他以北韓最喜歡的方式向它表示尊重。北韓國土雖小，自視卻很高，表現之一是，它很在意出席每年國慶日慶典的外國官員的人數和級別。中國的文革已經結束，各國領導人紛紛恢復對北京的訪問，金日成便搞起了「請帖外交」，告訴那些計劃訪問北京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他們如果來北韓訪問也會受到歡迎。在 1977 年有三位外國高級官員接受了金日成的邀請，即東德、南斯拉夫和柬埔寨的三位代表。^[9-36]金日成以宮廷式的排場接待了他們。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被單獨安排在宮殿一般的住處；東德領導昂納克（Erich Honecker）到訪時，受到了他有生以來最隆重的歡迎。^[9-37]

金日成為了 1978 年 9 月 9 日的建國 30 周年大慶，想方設法讓外國高級官員來北韓出席慶典。鄧小平在北韓訪問五天，給足了金日成面子。他也是出席慶典的外國官員中級別最高的。金日成很高興有這樣一位中國高官接受他的邀請，在整周的群眾大會上，一直讓鄧小平陪伴在身邊。^[9-38]

在北韓，金日成和鄧小平進行了數次私下或公開會談。鄧小平解釋了中國的嚴重經濟問題和致力於現代化的必要性。當時北韓的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高於中國，但已經開始落在正全力起飛的南韓工業後面。鄧小平說：「必須把世界的尖端技術作為我們現代化的起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越看越知道自己落後。」中國需要獲得最先進的技術去改進它的工業能力。金日成是在蘇聯和中國的幫助下開始進行現代化的，因此他不難理解鄧小平這些話。鄧小平又解釋說，中國好不容易才讓日本同意了反對蘇聯霸權的條款。他還向金日成提到了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的秘密會談的進展。^[9-39]在談到蘇聯的危險時他說，為了避免戰爭，必須備戰：只有這樣蘇聯才會更加謹慎。鄧小平提醒說，對蘇聯切不可姑息遷就。^[9-40]

鑒於鄧小平正在執行的對美對日政策，他的訪問可以說相當成功。金日成沒有和越南一起加入包圍中國的行列，繼續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在以後的歲月裏，金日成總是確信地對人說，鄧小平是他的朋友。他甚至在一個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代表團面前，替鄧小平的經濟和政治開放政策辯護。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完成了一項十分棘手的使命，否則北韓很有可能由於中國打算與它的敵國（美國和日本）交往，而疏遠中國，靠近蘇聯。

在東南亞尋求盟友：1978 年 11 月 5—15 日

在中國，劃時代的中央工作會議定於 1978 年 11 月 10 日召開。但是鄧小平認為，越南對柬埔寨迫在眉睫的入侵已經敲響警鐘，這足以讓他把參加工作會議和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都放到一邊，而要前往東南亞進行十天訪問，以便為下一步攻打越南作好準備。

到 1978 年夏天時，中國認為越南正在策劃入侵柬埔寨，而這一預測成為了中國採取行動的導火索。柬埔寨已是中國的附庸國，就像越南成了蘇聯的附庸國一樣。中國要支持這個它一直給予援助的盟友。讓中國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更多的蘇聯「顧問」和裝備抵達越南，支援進攻。美國官員估計，截止到 1978 年 8 月，在越南大約有 3,500 到 4,000 名蘇聯顧問；10 月中旬又有報道說，蘇聯的貨船正在卸下飛機、導彈、坦克和軍用物資。這對於鄧小平來說已經夠了。他決定，首先要立場強硬，現代化的和平環境只能等等再說。他甚至決定與柬埔寨的波爾布特（Pol Pot）合作，此人因大肆殺戮而在國際上惡名昭彰，但在鄧小平看來，他是唯一擁有足夠軍隊的柬埔寨人，能夠成為對抗越南人的盟友。

越南從 1978 年 7 月開始轟炸柬埔寨，每天出動飛機多達 30 架次，9 月份又增加到 100 架次。^[9-41]11 月，中國領導人觀察了越南的備戰情況後斷定，越南將在 12 月的旱季能夠調動坦克時入侵柬埔寨。^[9-42]

鄧小平認為，作出強烈的軍事反應是絕對必要的。他警告越南人說，法國和美國的軍隊在越南遭受重創後，就無心戀戰了，但中國作為越南的鄰國是可以在那裏呆下去的。然而越南人並沒有把他的警告當回事。三年前鄧小平對基辛格和福特說，希特拉入侵西方，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不願意表明他們將作出強硬的軍事反應。鄧小平根據自己與蘇聯打交道的長期經驗，認為談判是沒用的。他相信，要讓蘇聯停止在東南亞的擴張，就得採取強而有力的軍事行動。他打算「教訓一下」越南，讓它知道無視中國的警告以及向蘇聯提供軍事基地，將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

越南的強權先擴張至老撾，後又伸向柬埔寨，這使東南亞的陸地國家也受到向越南屈服的壓力。這些國家不想受越南的擺佈，可是又覺得無力對抗有蘇聯撐腰的越南，更難以對抗蘇聯在該地區的進一步擴張。鄧小平擔心這些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感到只能向蘇越強權讓步，從而損害中國的長遠利益，因此他認為，努力讓東南亞各國疏遠越南至關重要。

越南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 1978 年 9 月出訪東南亞，試圖使東南亞各國對越南準備入侵柬埔寨給予諒解。儘管范文同未能與東盟簽訂友好條約，但東南亞各國已打算向越南的強權屈服，因為它們沒有其他選擇。鄧小平在 11 月決定必須出訪這個地區，阻止它們向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低頭。

鄧小平啟程前往東南亞訪問時，已開始準備針對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軍事行動，但並沒公佈這一計劃。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國也不會像南北韓戰爭時幫助北韓那樣，應波爾布特的請求出兵。鄧小平擔心陷入其中難以自拔。他決定以入侵的方式「給越南一個教訓」，拿下幾個縣城，表明中國可以繼續深入，然後迅速撤出。這也可以減少蘇聯派兵增援越南的風險。越南將由此明白，蘇聯並不總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斂在這個地區的野心。通過攻打越南而不是蘇聯，中國也可以向蘇聯表明，它在該地區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價高昂的。鄧小平抱有信心，中國軍隊儘管因文革荒廢了軍事訓練和紀律，缺少戰鬥經驗，仍然足以同更有經驗、裝備更好的敵人作戰，並達成他的政治目標。中國軍隊撤出後，將會繼續沿邊境一帶給越南軍隊製造麻煩。

幸運的是，鄧小平於 1978 年 11 月 5 日出訪東南亞的前兩天，蘇聯和越南簽訂為期 25 年的和平友好條約，把兩個國家綁在了一起。^[9-43]這個條約給東南亞國家敲響了警鐘，使它們更能接受鄧小平的建議，合作對抗蘇越的擴張。東南亞的領導人毫不懷疑鄧小平掌管著中國的外交，他在外交政策上說的話，中國的其他領導人都會接受。

訪問泰國：1978 年 11 月 5–9 日

鄧小平在 11 月 5 日抵達泰國，成為出訪泰國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泰國總理克里安薩（Kriangsak Chomanan）熱烈歡迎鄧小平的到來。

鄧小平以泰國作為東南亞之行的起點，不僅因為中國對柬埔寨波爾布特軍隊的援軍要借道泰國，還因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中泰兩國關係較好。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各有大約 500 萬華人，三國領導人都擔心華人更效忠於中國而不是自己的國家。中國在 1960 年代初開始向這些國家進行無線電廣播，鼓動當地人民鬧革命，更加劇了這種擔心。在鄧小平出訪時這種廣播鼓動仍未停止。印尼的問題最為嚴重，因為當地華人曾加入反抗蘇加諾（Sukarno）的運動，幾乎導致他的統治被推翻（印尼出於憤怒，直到 1990 年才與中國正式建交）。但是，泰國的華人融入當地社會較深，泰國對華人有可能組成「第五縱隊」的擔心，要比馬來西亞或印尼小得多。如果鄧小平訪泰取得成功，泰國有可能幫助說服其他東南亞國家同中國和柬埔寨合作，共同對抗越南的擴張主義。

泰國在歷史上一直試圖通過迎合大國——法國、英國或日本——的意願來維護自身獨立。鄧小平認為，如果中國不明確宣示自己的利益，泰國很快就會偏向越南。鄧小平很幸運，在他訪問泰國時，當時的泰國領導人是美國的親密盟友，因而他們不想討好蘇聯和越南的強權，願意與中國合作對抗越南稱霸這個地區。

為了營造出訪之前的泰國輿論，並且及時瞭解泰國的關切，鄧小平在這年年初泰國首相克里安薩訪華時，與他舉行了幾次會談；10 月初又在北京接見過一個泰國記者代表團。^[9-44]在克里安薩訪華期間，鄧小平對這位泰國總理說，他希望同東盟合作，與印尼和新加坡實現正常邦交。兩位領導人對國際問題持有共同觀點，原則上同意加強合作對抗蘇聯和越南的霸權。^[9-45]鄧小平還同意支持克里安薩的努力，使東盟能夠保持和平中立。^[9-46]或許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 6 月在北京接見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曾敦促泰國解決它與柬埔寨的分歧。一個月以後泰柬兩國便宣佈，原則上同意解決它們之間長期的邊界爭端並互換大使。^[9-47]

11 月鄧小平在泰國與克里安薩的會談中，再次表達了與東盟合作、與印尼和新加坡正式建交的願望。他闡述了自己對蘇聯的全球野心和越南的地區野心的分析。他說，蘇聯在越南的軍事基地不僅威脅到中國，也威脅著這個地區和全世界。在同克里安薩的一次私下會談中——只有一名記錄員和一名翻譯在場，鄧小平警告說，越南軍隊正在準備入侵和佔領柬埔寨。泰國和柬埔寨有漫長的邊境線，所以很快也會受到威脅。克里安薩於是同意讓中國使用它的領空為柬埔寨提供援助。^[9-48]

對於泰國華人的忠誠問題，鄧小平也再次向克里安薩作出保證。他說，中國鼓勵海外華人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只要他們選擇了泰國國籍，就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他進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經取得泰國國籍的華人遵守泰國法律，尊重當地風俗，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那些仍保留中國國籍的人要為泰中友誼和泰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福利作貢獻。^[9-49]鄧小平這些建立彼此信任的訊息，與僅僅十年之前毛澤東鼓動泰國人民鬧革命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在泰國，受到毛澤東鼓動的大多是華人。在 11 月 9 日曼谷的新聞發佈會上，相對於他和克里安薩的私下會談，鄧小平對可能發生的中越衝突不再那麼直言不諱。他強調中泰兩國共同對抗企圖稱霸的國家的必要性，尤其是加強中泰合作、維護東南亞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他承認，中國和泰國共產黨的歷史關係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結束，但是他說，這不會影響到兩國政府的關係。然而他也私下向克里安薩保證，中國將不再支持泰共。^[9-50]他還說，只要他有機會能讓跟中國合作的當地人和中國國內支持他們的人作好準備，他很快會停止鼓動革命的秘密廣播。八個月後的 1979 年 7 月 10 日，這些電台廣播消失了。^[9-51]

就像其他出訪一樣，鄧小平出現在公眾場合，並饒有興致地參與當地文化活動。鄧小平訪泰期間，在這個九成人口是佛教徒的國家，他參加一個佛教儀式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他還拜會國王夫婦，觀看體育比賽和軍事表演，並且出席了一個支持兩國科技合作的儀式。^[9-52]

馬來西亞之行：1978 年 11 月 9–12 日

對於鄧小平來說，馬來西亞是比泰國更嚴峻的挑戰。馬來西亞的領導人確實擔心越南和蘇聯對這個地區的覬覦，然而他們更擔心當地華人的活動。鄧小平很清楚這一點，他不期望得到像泰國那樣的熱情接待。通過沿用傳統的統戰戰略，他頂多希望抵消越南向馬來西亞示好的努力，讓馬來西亞向中國更靠近一些。

接待鄧小平的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奧恩（Datuk Hussein Bin Onn）有充分理由擔心當地華人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在 1950 年代，馬來西亞這片英國殖民地上的共產主義運動十分強大，以至於很多馬來人擔心馬來西亞獨立之後會被共產主義者接管。^[9-53]1963 年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後，馬來人害怕擁有強大政黨的華人可能主導他們的政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人口的 75% 是華人、當時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的新加坡在 1965 年遭到遺棄，被迫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此後馬來人成為明確的多數，但華人仍然支配著經濟和大學，並且他們強大的政黨一直是侯賽因·奧恩的心頭大患。

華人還與他們的祖國保持著密切聯繫。1969 年 5 月爆發的種族騷亂一直持續了大約兩個月，很多當地華人擔心自己的前途，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當鄧小平 1978 年 11 月到訪時，馬來西亞共產黨（1983 年後改稱馬來亞共產黨）仍很活躍，其中大多數成員都是華人，他們的總書記陳平有時會到中國避難。

和越南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態度相比，鄧小平對馬共的態度更為中立。雖然他不能立刻關閉秘密電台的廣播，但他決心終止這類做法。（1981 年 6 月，華國鋒在六中全會上被正式撤職的同時，中國終於關閉了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9-54]但是鄧小平也謹慎地避免過於疏遠馬共。例如，在他到訪馬來西亞的兩個月之前，越南總理范文同——儘管他也是共產黨——向在鎮壓共產黨叛亂時犧牲的馬來軍人紀念碑獻了花圈。鄧小平同樣想得到馬來西亞的支持，而且中共也不再是個革命政黨，因此鄧小平本來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但是他既沒有獻花圈，也沒有譴責當地的共產黨。鄧小平向侯賽因·奧恩解釋說，如果突然背棄過去的盟友，中國將難以吸引和維持海外的支持者。他說，中國政府希望與馬來西亞政府合作，但中共將繼續與海外的共產黨保持聯繫，包括馬來西亞共產黨。侯賽因·奧恩回答說，馬來西亞難以接受這種做法，但鄧小平的態度很堅決。^[9-55]因為他心中有數，馬來西亞政府本來就不會全心全意與中國合作。並且他知道自己不能突然拋棄中國過去的政策和曾經與中國合作過的人。^[9-56]

中馬兩國在 1974 年正式建交時，周恩來曾宣佈中國不接受雙重國籍。鄧小平重申了周恩來的政策。他說，已經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分的華人就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中國鼓勵所有生活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尊重當地風俗。^[9-57]在被問到波爾布特這個在馬來西亞臭名昭著的人物時，鄧小平為他作了辯護。他承認存在問題，但他解釋說，波爾布特是唯一

能夠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領導人，而柬埔寨對中國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不能倉促推動有可能導致其不穩定的領導層變動。^[9-58]

鄧小平與馬來西亞找到共同點的最大希望，來自於他支持馬來西亞建立中立區的倡議。馬來西亞領導人拉扎克（Tun Abdul Razak）在 1971 年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區」的建議，旨在維護該地區相對於冷戰中的大國的獨立。鄧小平讚揚了這一倡議，敦促所有東盟國家團結一致，捍衛東南亞作為中立地區的理想，以抵抗越南的滲透和擴張。侯賽因·奧恩總理也擔心越南擴張的危險，他也知道中國是馬來西亞橡膠的重要進口國，因此同意鄧小平的觀點。儘管侯賽因只是間接談到了越南的危險，但是他同意外國的入侵、干涉和控制都是不可接受的。^[9-59]

在馬來西亞的會談中，鄧小平並沒有迴避兩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坦率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訪問結束時，侯賽因·奧恩在評價這種新的開放態度時說，鄧小平的訪問是進一步促進兩國相互理解的重要機會，兩輪會談「十分有益」，他相信「兩國關係將在未來得到發展和加強」。^[9-60]鑒於當時的環境，這是鄧小平所能期待的最佳結果。

新加坡：1978 年 11 月 12–14 日

鄧小平很清楚，新加坡這個 75%人口是華人的國家，並不想在它更強大的鄰國面前顯得過於親中。鄧小平也明白，新加坡作為一個只有 200 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面對蘇聯和越南在該地區的擴張勢力，只能適應強權的現實。但是他還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力，並且在東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響。因此，他希望李光耀幫助他說服東盟對抗越南，甚至說服美國在中越發生衝突時為中國提供幫助，或至少不給中國造成妨礙。

李光耀在 1976 年 5 月初次訪華時，鄧小平正賦閒在家，因此 1978 年 11 月 12 日他抵達新加坡時，兩個人是第一次見面。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卓越領導人都清楚對方的威望，他們互相尊敬，但也保持著一定距離。李光耀對中國的瞭解更多地來自於學習，而不是個人經歷。他在一個英式家庭長大，接受的是英國而非中國學校的教育，是英國劍橋大學出類拔萃的法科學生。事實上，儘管他會講四種語言，但他的漢語說得並不流利；他在與鄧的會談中講英語，這既表示他不受制於自己的種族背景，也表示他首先效忠於新加坡。而鄧小平只會講一種語言，那就是帶有四川口音的漢語。他比李光耀大 18 歲，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李光耀則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李光耀要應對選舉，鄧小平則要面對政治局。當他們見面時，新加坡已經取得了快速發展，是個秩序井然、乾淨整潔的城市國家，而巨大的中國仍然貧窮而混亂。中國的人口是新加坡的 400 多倍，但新加坡是東南亞的知識和金融中心，它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具備超越其國土面積的影響力。鄧小平和李光耀都態度謙和，希望淡化個人差異；李光耀事先簡單瞭解了鄧小平的習慣，專門為他備好痰盂和煙灰缸（還在牆上專門安裝了一個排煙管道）；但是鄧小平也瞭解李光耀的習慣和過敏症，與他在一起時既不抽煙也不吐痰。

在會談中，鄧小平用了整整兩個半小時來闡述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他不用筆記，像基辛格和周恩來一樣，全憑自己的綜合分析和長遠歷史眼光縱論地緣政治的大勢。最讓李光耀印象深刻的，鄧小平對蘇聯和越南的威脅給予嚴重專注，猶如芒刺在背。他說，蘇聯的軍費開支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20%，比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還多。它的軍隊人數已達 450 萬。俄國沙皇曾妄想得到一條南方通道，蘇聯領導人現在也希望向南擴張，首先在印度洋建立港口，然後控制往來於中東的海上通道。鄧小平警告說，蘇聯為達到這個目標已經裝備了 750 艘戰艦，而且在迅速擴充它的太平洋艦隊，同時蘇聯還到處尋找軍事基地和尋求控制資源。但是，鄧小平說，儘管戰爭看來不可避免，中國仍然決心對抗蘇聯的戰略部署。

鄧小平接著討論了越南的動向。越南人有個由來已久的夢想，希望通過成立印支聯邦控制老撾和柬埔寨，從而主宰整個東南亞。越南人已經控制了老撾，他們認為蘇聯的幫助對於統一印度支那這個當前目標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國則被視為這個目標的主要障礙。鄧小平說，在這一背景下，即使中國繼續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蘇聯為它的霸權夢所提供的援助，反而會幫助越南的擴張。因此中國決定停止對越援助。^[9-61]

當鄧小平專注地談論蘇越霸權的危險時，李光耀問鄧小平，中國會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作何反應。鄧小平只是說，這要看越南走得有多遠。李光耀從這種回答中推測，假如越南跨過湄公河攻入金邊，中國肯定會作出軍事反應。^[9-62]

鄧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國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說，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訪美之前向美國轉告中國十分擔心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後來確實這樣做了。^[9-63]接下來鄧小平討論了地區關係的遠景。他特別講到，中國讓越南脫離蘇聯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在未來八到十年可能會出現更好的機會。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的估計極有遠見。

次日，即 11 月 13 日的上午，李光耀向鄧小平說明了西方對蘇聯軍力的不同估計。蘇聯的軍力無疑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並且還在增長中。但是儘管有的專家認為蘇聯已構成迫切的危險，也有人相信蘇聯已不堪重負。為了消除鄧小平對新加坡歡迎蘇聯進入該地區的顧慮，李光耀解釋說，新加坡的外貿以日本、美國、馬來西亞和西歐為主，對蘇貿易只佔其貿易量的 0.3%（當時新加坡的對華貿易僅佔其貿易量的 1.8%）。

李光耀說，東盟各國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族融合。使鄧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訴他，東南亞各國更害怕中國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後描述了東南亞國家如何擔心中國那些鼓動革命——尤其是在華人中間——的電台廣播。這再次印證了鄧小平已經從泰國和馬來西亞領導人那裏聽到的憂慮。李光耀說，東南亞人也注意到，越南總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犧牲的馬來西亞人的紀念碑獻了花圈，鄧小平卻沒有。讓李光耀感到吃驚的是，鄧小平接著問他：「那麼你和東盟各國想讓我們做些什麼？」李光耀答道：「停止電台廣播。」鄧小平說，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這讓李光耀很意外，鄧小平不同於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領導人，他在面對令人不快的事實時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9-64]但是，他不會考慮向剿共的馬來西亞人獻花圈這種事。他說，范文同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他接著又說，中國領導人是說話算數的，只要答應了的事情就一定辦到。

當鄧小平在 11 月 14 日離開新加坡時，這兩位領導人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就像周恩來和基辛格的關係一樣，他們能夠相互尊重，並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鄧小平都經歷過與殖民主義作鬥爭的年代，並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國生活過。他們在各自國家的革命鬥爭中都是敢作敢為的領袖，也都知道怎樣才能在亂局中重建秩序。雖然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國教育，但他學過中國史，能夠體會鄧小平的生活背景。他們都是坦率的現實主義者，對自己的國家忠心耿耿；他們年輕時便擔當大任，堅信強勢的個人領導之必要；他們深諳權力之道，在戰略思考中考慮歷史大勢。在中國大陸以外，除了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創建人包玉剛，沒有任何領導人，能夠像李光耀那樣與鄧小平建立如此深刻的交往。鄧小平和很多外國領導人關係親密，但是他和李光耀的關係反映著一種更深層的相互理解。從鄧小平的角度說，李光耀和包玉剛吸引他的地方，是他們在處理現實事務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與世界級的領袖有著直接交往，瞭解國際事務，能夠把握大趨勢，願意面對事實，說話直言不諱。在李光耀看來，鄧小平是他遇到過的印象最為深刻的領導人：鄧小平對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問題時他會承認錯誤並加以改正。

鄧小平讚賞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則欣賞鄧小平處理中國問題的方式。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之前，中國媒體把新加坡人稱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幾周後，這種說法就從中國媒體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為一個在環保、公屋建設和旅遊方面都值得學習的地方。^[9-65]李光耀和鄧小平此後又分別在 1980 年、1985 年、1988 年數次會面。

鄧小平出訪新加坡的目的，是為阻止越南和蘇聯在東南亞的擴張爭取支持，但新加坡也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訪問過紐約、巴黎和東京，對於這些地方比中國更加現代化並不感到奇怪。但是 1920 年他去法國時曾在新加坡停留過兩天，這讓他對新加坡在其後五十八年間所取得的進步大為驚歎，因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在貧困中掙扎。鄧小平當時尚未決定在中國實行什麼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堅信中國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許能讓它迅速改變面貌，可是我得管整個中國。」^[9-66]

儘管鄧小平看過有關新加坡的報告，但其中的信息主要來源於新加坡的左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發現自己並未受到當地大批華人的熱情歡迎，人們有自己獨立的想法，不想屈從於中國。^[9-67]顯然，新加坡當地的共產黨人就像在中國大陸的一些黨員一樣，喜歡說一些北京愛聽的話，因此他們的報告並不可靠。但鄧小平要親自瞭解當地的真實情況。結果他親眼看到了這個城市國家社會發達，秩序井然，大大超出他的預料。一年以後對越戰爭結束時，鄧小平在國內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他在新加坡看到的外國人開設的工廠的一些優點：它們向政府交稅，提供就業機會，工人通過工作獲得報酬。他說，不要害怕外國的資本家。^[9-68]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改革榜樣，他準備派人去那裏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制腐敗的經驗。

向東南亞華人示好

回國之後，鄧小平要繼續解決促使他出訪東南亞的難題：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但是由於這次訪問，他對海外華人的作用產生了更大興趣，認為他們既可以為中國的四化作貢獻，又可成為幫助改善中國與所在國關係的好公民。鄧小平及其同事開始更加關注如何讓海外華人為中國大陸提供資金和國外發展的知識，在鄧小平看來後者更加重要。

在 50 年代初，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因為海外的親屬關係而失去了土地和生意，有些人甚至丟了性命。很多倖存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一些海外華人因中共對其大陸親人的殘暴而永遠不能寬恕這些共產黨人，但也有一些人的親戚沒有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因而願意利用機會為家鄉作貢獻；作為對他們的回報，一些建築和醫療設施會以他們的名字命名。也有些海外華人看到了中國的商機。1978 年 10 月，鄧小平出訪東南亞的幾周前，廖承志發起了對過去「四人幫」的「華僑政策」的大規模批判，顯示了上層醫治沉痾的努力。要承認這些導致迫害的政策其實源於毛澤東仍然為時尚早，但廖承志對以往錯誤政策的批判，使鄧小平等領導人能與過去的苦難拉開距離，致力於翻開歷史新的一頁。

鄧小平也支持對在大陸受過迫害的華僑親屬作出賠償。其中一些移居海外的人還被請了回來，重新住進他們以前被充公的房子。當這樣的方法不可行的時候，很多人則因為失去工作和財產而得到了一定的補償，往往是通過提供較好的工作和住房，以及給予其子女更好的教育機會。鄧小平知道華僑的疑慮不會很快消失，但他著眼於長遠，而他實行的華僑政策在他當政的時期和退下來之後一直未變。鄧小平希望能同時與東南亞華人和他們所在國的政府搞好關係。因此當東南亞華人與所在國政府的衝突特別嚴重時，例如馬來西亞的情況，中國很難挺身而出，為華僑爭取公正待遇。但是中國跟越南的關係惡劣，因此當越南政府把華人大批趕進拘留營或驅逐他們時——這種做法導致大約 16 萬華人逃離該國——中國政府給予了高調的批評。^[9-69]

鄧小平對東南亞的訪問有助於增強中國的決心，要鼓勵東南亞華人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鄧小平訪問後的兩年內，中國對革命廣播電台的支持停止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都致力於同東南亞各國政府和執政黨開展合作。這一變化也伴隨著中共在內政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甚至於「海外華僑」這個說法也不再時興，因為它有著海外華人終究也是中國人的含義。他們被改稱為「華裔馬來西亞人（或泰國人、新加坡人）」。

鄧小平的東南亞之行促進了與該地區各國政府關係的改善。到 1990 年印尼和新加坡同中國建交時，中國已經與該地區所有國家有了欣欣向榮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交流。當時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看到了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好處，並且主要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那些祖籍中國的公民——他們成了中國與他們居住國之間互惠互利的潛在橋樑。

解決問題以促進變革

鄧小平對越南決定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應，鮮明地展示了鄧小平時代很多變化的發生過程。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在遇到新問題時，他首先會盡量搞清楚癥結所在，然後才決定如何應付。如果他的行動引發一些新問題，他會逐個加以處理。當鄧小平看到蘇聯和越南擴張主義的威脅時，他決定為中國的軍事反應作出準備；後來當中國軍隊的能力被證明有嚴重問題時，他又專注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關於對越戰爭見第 18 章）。在思考如何對付蘇聯和越南的威脅時，鄧小平認識到他迫切需要東南亞鄰國的合作，於是他安排出訪這些國家，以便加強同它們的關係。但是到了那裏之後他又認識到，為了爭取這些國家的合作，必須逐漸停止中國對當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勵華人對其居住國忠誠。為了對付蘇聯和越南日益增長的威脅，也是為了給實現四化尋求支持，鄧小平還將要尋求深化中國與兩個有能力遏制蘇聯的大國的關係，這兩個大國便是日本和美國。

[9-1]鄧小平正式接手外交工作是從 1978 年 3 月 10 日開始，但他恢復工作後不久就主持了與萬斯的會談並處理與美國相關的事務，這被認為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政策問題。

[9-2]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9-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93.

[9-4]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p. 289.

[9-5]Nayan Chandra,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259.

[9-6]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7; Jian Chen,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3 (March 1993): 85–110.

[9-7]Henry J.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le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3), p. 218.

[9-8]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65年4月18、19、22、23日。

[9-9]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 661. 整個援助計劃可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頁549–570。美國的文獻普遍低估了越戰期間中國派出的軍隊數量。例如一個估計是五萬人。見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17; Donald S. Zagoria and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n Zagoria,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3–173.

[9-10]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 221–229.

[9-11]William J. Duiker, *Ho Chi Minh* (New York: Hyperion, 2000), pp. 541, 550.

[9-12]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229–237.

[9-1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6–287.

[9-14]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4–65.

[9-15]《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外活動大事記》，1975年9月22–25日。

[9-16]《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外活動大事記》，1975年9月25日。

[9-17]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7–68.

[9-18]Chandra, *Brother Enemy*, pp. 134–135;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p. 26–28, 222–223;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67.

[9-19]Chanda, *Brother Enemy*, p. 28.

[9-20]Ross, *Indochina Tangle*, p. 75.

[9-21]例如可參見1976年5月李光耀與華國鋒長達七小時的談話紀錄：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42–650.

[9-22]Chanda, *Brother Enemy*, pp. 27–28.

[9-23]Ross, p. 68.

[9-24]Ross, p. 127;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88–89.

[9-25]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128–129.

[9-26]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87–188, 240–245.

[9-27]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130–131.

[9-28]Chanda, *Brother Enemy*, p. 189.

[9-29]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1.

[9-30]范宏偉：〈周恩來與緬甸華僑〉，《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31–37。

[9-31]參見 Wayne Bert, "Chinese Policy toward Burma and Indonesia: A Post-Mao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25, no. 9 (Sept. 1985): 963–980; Bertil Lintner, "Burma and Its Neighbors," in Surjit Mansingh, ed.,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 田曾佩：《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頁70–72；《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1月26–31日；W. R. 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The Decline of Dual Track Diplomacy," in *Asian Survey* 22, no. 8 (Aug. 1982): 779–800.

[9-32]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4, 6, 1978.

- [9-33]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6, 1978.
- [9-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年4月18–26日，頁36–37。
- [9-35]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96.
- [9-36]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2, 391, n26.
- [9-37]《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7年8月7日。
- [9-3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9月8–13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9月8–13日，頁370–373。
- [9-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9月12日，頁372–373。
- [9-40]潘敬國：《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2004），頁379。
- [9-41]Chanda, *Brother Enemy*, p. 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208.
- [9-42]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207–208.
- [9-43]Ross, p. 208.
- [9-44]《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10月3日。
- [9-45]《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3月29日至4月1日。
- [9-46]Xinhua News Service, March 30, 1978.
- [9-47]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July 21, 1978.
- [9-4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 [9-49]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 [9-5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11月5–9日；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325–326;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2.
- [9-51]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 785.
- [9-52]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 [9-53]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9-54]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p. 786–790.
- [9-55]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November 24, 1978.
- [9-56]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0, 11, 1978.
- [9-57]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 [9-5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 [9-59]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27, no. 10 (October 1987): 1109–1126.
- [9-60]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 [9-61]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2–665. 另據作者2004年11月與新加坡官員的交談。
- [9-62]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0–662. 另見2004年11月與新加坡官員的討論。
- [9-63]2004年11月與新加坡官員的交談。
- [9-64]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7.
- [9-65]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8.
- [9-66]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8.

[9-67]2004 年 11 月同參加過與鄧小平會談的新加坡官員的交談。

[9-68]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8–669.

[9-69]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154.

第 10 章

向日本開放：1978

鄧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出訪日本，是要爭取日本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國以外，或許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像日本那樣有助於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日本擁有現代技術和高效的管理；它在如何加快發展、擴大現代工業、從以管制為主的經濟轉型為更加開放的經濟等方面都能為中國提供經驗教訓；它與中國隔海相望，是中國的近鄰；並且很多日本人願意向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鄧小平知道，為了搞好中日關係，需要讓日本人相信中國是穩定的，而且願意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合作夥伴。他還知道，他必須克服國人對於同過去的敵人合作將會產生的抵制。

在鄧小平訪日期間，隨行的中國電影工作者所拍下的畫面將有助於改變中國對戰後日本的想法。他們製作的電影展示了現代的工廠和鐵路，也展示了祥和友好的日本人歡迎中國客人、並表示願意為中國提供幫助的畫面。鄧小平知道，這些畫面對直接受仇日教育的中國民眾十分重要，能幫助他們將日本人作為客人、僱主和老師來接納——這項任務的艱巨程度不亞於說服日本為中國提供資金、技術和管理技能。日本在 1894 年甲午戰爭後奪取臺灣，使其成為它的殖民地，自那時以來，它便一直是中國的敵人。1978 年時那些 40 歲以上的中國人還對抗戰的苦難記憶猶新；而且 30 年來中國的宣傳機器或學校和單位大喇叭裏的廣播，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一些日本軍隊的戰爭暴行。那些有關日本人侵華期間累累暴行的紀錄，是最有效地激發愛國主義的宣傳方法。

作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個人不難對國家利益作出冷靜判斷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年輕時曾激烈抨擊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但是當他擔任要職時，他會依據所看到的國家利益變化而審時度勢。對於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這一點，他不存有任何幻想；並且在與之合作時，他會堅決捍衛中國的利益。但是在 1978 年，日本和美國警覺到蘇聯的擴張，都想讓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這就為鄧小平帶來了一個可能合作的機會。

對鄧小平而言，要說服中國那些充滿激情的愛國者，讓他們向日本學習，是需要政治勇氣與決心的。尼克遜總統之所以有政治基礎來和曾是舊敵的中國發展關係，是因為他已證明了自己是堅定的反共派；同樣，鄧小平本人是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軍人，他一樣有堅實的政治基礎，能夠採取大膽的措施改善中日關係。

鄧小平在訪日之前首先要與日本談成一個條約，以便為他的訪問鋪路。毛澤東和田中角榮首相在 1972 年匆忙地推動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但此後中日關係一直停滯不前。毛澤東和田中沒有處理建立領事館、通商和促進民間交流等一系列必須解決的法律問題。在赴日之前，鄧小平首先要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當鄧小平 1977 年夏天恢復工作時，為了簽訂一個加強中日關係基礎的條約而進行的談判已經拖延多年，其中關鍵的癥結是日本不願接受中方將反霸權條款寫入其中的要求，該條款規定兩國同意不謀求在該地區稱霸，也反對任何其他尋求稱霸的國家。^[10-1]中方談判人員想讓日本進一步疏遠蘇聯，他們清楚這個反霸權條款會激怒蘇聯。1976 年 9 月一名蘇聯飛行員駕戰機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國人一起分析了飛機的性能，並且拒絕將其歸還蘇聯，從而導致日蘇關係的惡化。不過，日本是一個貿易國家，當時它在境外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盡量避免與任何國家全面對抗，尤其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機以後，它不想跟一個石油儲量豐富的國家對抗。

中方最初提議兩國政府通過談判簽訂一個和平條約，但日方回答說，它已在 1952 年與代表中國政府的蔣介石簽訂過《中日和約》。於是中國又提出建議，就像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所做的那樣，兩國簽訂一個和平友好條約。但是直到 1977 年這一思路仍未解決問題。田中角榮的繼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 1976 年 12 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作出過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拒絕與立場堅定的中方妥協。無論在國內和國外事務上，鄧小平都對慢吞吞的民主議事過程感到不耐煩，他希望迅速解決問題。不過儘管日本人有國內政治的麻煩，他仍然和他們保持著交往。

雙方仍在僵持不下時，鄧小平於 1977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別接待了一些來訪的日本政界領袖，中方認為他們對中國抱有同情，這些人中包括二階堂進和河野洋平。鄧與他們探討了達成條約的可能性。^[10-2]同時，日本國內的各種商業團體和地方社團熱心於增加對華交往，也在游說以更靈活的方式簽訂這樣一份條約。^[10-3]前財政大臣福田赳夫是個聰明的前大藏省官員，曾經提出過由日本向東南亞鄰國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則」，因而得到其他亞洲領導人的讚揚。福田在 1977 年 11 月 28 日組閣時任命園田直擔任外相。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園田直是最有可能與中國簽訂條約的官員。^[10-4]福田赳夫鼓勵園田直與中國外長黃華舉行談判，早日解決阻礙簽約的爭議。^[10-5]

從 1977 年末到 1978 年 7 月中旬，中日雙方幾乎不間斷地舉行了數輪有關條約細節的談判，但反霸權的條款仍然是主要癥結。1978 年 3 月談判出現了進展的跡象，日本似乎願意接受一個稍作修改、措辭更為謹慎的說法。^[10-6]日方認為，如果寫入一個緩和語氣的條款，說明條約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蘇聯也許能夠容忍。

1978 年 7 月 21 日，在鄧小平引導下正式談判開始，雙方舉行了第一輪會談。整個談判總共進行了 14 輪。在隨後的幾輪談判中，雙方交換了若干次條約的修改稿。8 月初的時候在北京的日方談判人員已經充分相信，中國會在緩和條款語氣上作出讓步，於是園田直親赴北京加入了談判。後來據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副局長東鄉和彥說，鄧小平顯然已經作出「政治決定」，當黃華外長接受了日方的措辭時，「我們非常高興，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緊緊握了一下手」。採用緩和語氣的反霸權條款措辭如下：「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10-7]該條約於 8 月 12 日在北京由黃華和園田直簽署。^[10-8]

經過八個多月的談判後，鄧小平為何突然決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語氣緩和的條款寫入條約？一方面是由於鄧確實急於搞現代化，但當時與越南發生衝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談判變得更為迫切。此前兩周的 7 月 3 日，中國政府宣佈從越南撤回全部中國顧問。當時鄧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發生，中國就要被迫作出反應。為了不讓蘇聯插手，鄧小平希望盡快加強與日本和美國這兩個重要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出所料，蘇聯因這一條約而對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為有緩和語氣的條款，蘇聯容忍了它。^[10-9]

這個和平友好條約並不需要中國高層領導人親臨日本參加簽訂儀式。不過對田中角榮 1972 年的訪華，本應有一位中國高層領導人回訪，但六年來還沒有哪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現在很清楚，鄧小平準備出訪這個島國了。

鄧小平的成功訪日：1978 年 10 月 19–29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 60 年裏，有三位訪問過日本的外國政要給日本民眾留下了具有震撼力的印象，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看待對方國家的方式。在 60 年代初，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羅拔·甘迺迪（Robert Kennedy）與日本的學生和普通民眾團體進行了坦誠活躍的公開對話，這在日本民眾有關外國領導人的經驗中是前所未有的。羅拔·甘迺迪朝氣蓬勃，胸懷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精神，真誠地希望服務於全世界的人道主義事業，對他人的觀點表現出十分的尊重。他的訪問加深了日本人對民主含義的理解，增進了日本對美國人的好感。^[10-10]

30 年後的 1998 年，另一個外國政要——南韓總統金大中——向 1973 年救過他性命的日本人表達謝意，給日本民眾留下了同樣難忘的印象。南韓中央情報局曾在東京綁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條小船上試圖將他淹死，多虧一支勇敢的救援隊他才獲救。金大中試圖克服南韓人對日本的敵意，他滿懷真誠地用日語演講，韓日兩國不應當往回看，只應向前看，走向和平與友好的未來。他這一番話感動了日本的聽眾，在隨後幾個月日本和南韓的民意測驗中，兩國國民對於對方都表現出更加正面的態度。

在這兩次激動人心的訪問之間，鄧小平 1978 年的訪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間同樣引起了震撼性的反響。在中國與這個相鄰島國 2,200 年的交往史中，鄧小平是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也是第一個拜會日本天皇的人。^[10-11]鄧小平說，儘管有 20 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他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來。這讓日本人大受感動。他們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多大災難，非常想表達他們的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小平帶著和解的精神而來，也帶來了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的希望。很多人覺得，二戰結束三十多年後，療傷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鄧小平訪日期間，很多日本人對日本曾經給中國造成的災難表達了歉意，日本政要也發誓絕不再讓這種悲劇重演。鄧小平接受了他們的道歉，並沒有要求他們詳述那些暴行。對於很多不同領域的日本人來說，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既是對日本人過去的行為表示懺悔，也是為中國的繁榮作貢獻的方式，這種幫助本身就可以增加兩國和平相處的機會。

鄧小平訪日時，幾乎所有日本家庭都已經有了電視，他們的領導人代表國家向鄧小平道歉時，民眾也能感同身受。在中國雖然電視機尚不普及，鄧小平訪問日本工廠時拍攝的電影和照片，也能讓中國民眾看到日本人對鄧小平的熱情歡迎。此外，人們從影像中看到的那些新技術，也證實了中國其實還多麼落後。

鄧小平曾在 1974 年和 1975 年負責接待外國高層領導人，當時他所會見的日本客人，遠多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通過與日本代表團的個人交往，他知道各個階層的日本人都對中國文化抱有好感。日本東道主一再向鄧小平說，他們要感謝中國，它是日本文化——佛教、文字、藝術、建築——的源泉，這在被日本人視為傳統日本的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其如此。在日本的十天訪問中，鄧小平會見了各行各業的人：政府領導人、執政黨和反對黨成員、大企業代表、不同社區的普通公民和媒體人員。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款待，他們都是鄧小平在 1973 至 1975 年和 1977 至 1978 年在北京接待過的人。鄧向他們致以問候，稱他們為「老朋友」，這是中國人對熟人的稱呼。

鄧小平於 1978 年 10 月 19 日抵達日本，當時他尚未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但已被當作中國的代言人看待。^[10-12]鄧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滿。作為一個對紀律嚴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員，他對於東道主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就像日本工廠裏的質量控制工程師一樣，對細節的關注無微不至。

10 月 23 日上午，福田首相和 400 名日本人在赤坂迎賓館大廳舉行了歡迎鄧小平的正式儀式，然後兩人參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出席活動的還有 28 位主要國家的駐日大使，但是按照中方的請求，蘇聯大使未獲邀請。^[10-13]

儀式結束後，鄧小平在與福田舉行會談時打開了一包熊貓牌香煙，遞給每人一枝，氣氛立刻變得輕鬆起來。鄧小平說：「幾年來我一直希望來東京訪問，現在終於實現了。十分高興和首相相識。」福田回答說：「近一個世紀來日中關係的不正常狀態終於結束了。條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日中兩國的永久友好關係。這是鄧小平副總理下決斷的結果。」福田說，他只瞭解戰前的中國，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訪問中國。鄧小平立刻答道：「現在我就代表中國政府邀請首相方便的時候訪問中國。」^[10-14]他的東道主當場接受邀請，「我一定要訪問中國」。然後福田談到了要加強兩國關係，鄧小平笑著說：「日本也把窮人（中國）當朋友，真了不起。」^[10-15]

園田直和黃華簽署並互換了正式文件後，鄧小平出人意料地給了福田一個熱情的擁抱，福田顯得有些尷尬，但很快就恢復了正常，將其視為善意的表達（鄧小平通常對外國的共產黨同志才會有這種舉動）。鄧小平說，和平條約將推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也將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十億中日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10-16]

鄧小平還在皇宮花了兩個小時與天皇共進午餐。為保證天皇能夠與客人隨意交談，日方不會保留此類談話的紀錄。但是鄧小平後來說，他們談得非常好。據在場的黃華外長講，鄧小平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我們兩國的和平方友好關係」。黃華提到天皇用了「不幸的事情」這個說法，黃華說，這「相當於對戰爭損害作了間接道歉」。天皇和鄧小平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現在兩國能夠共享和平友好關係，要把它永遠保持下去。^[10-17]

當天下午鄧小平與福田進行了 90 分鐘的會談，然後福田為鄧小平設宴，大約有 100 名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的重要人物出席，包括自民黨總裁大平正芳、前外相藤山愛一郎和政壇新星、後來擔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福田在宴會的講話中回顧了中日兩國兩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後說：「到了本世紀，經歷了不幸關係的苦難。」這時他脫離講稿補充說：「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中方把這看作是一種道歉。福田繼續說：「這種事情是絕不能讓它重演的，這次的日中和平方友好條約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相互宣誓的。」^[10-18]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中，這不過是短暫的一瞬。」^[10-19]

鄧小平對他的東道主說，他來日本有三個目的：一是互換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幾十年來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日本友人表達中方的感謝，三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日本人聽後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傳說中，兩千兩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東渡扶桑，尋找能使人長生不老的仙草。鄧小平又說，他所說的仙草，其實是指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他說，他要來學習現代技術和管理。日本國會下院議長保利茂隨後善意而風趣地說，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關係。^[10-20]後來鄧小平參觀京都舊皇宮禦所時，東道主對他說：「這裏的文化，全是我們的祖先向中國學來，而後又以獨特的方式培育起來的。」鄧小平馬上答道：「現在，這個位置（師生關係）顛倒過來嘍。」^[10-21]

鄧小平對自己在國內的權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輕鬆展示他的自然魅力與率真。當人群聚在他身邊時，他意識到自己可以打動他們，就像一位自知正在贏得聽眾的政治家一樣興致勃勃地作出回應。

鄧小平在日本的主要嚮導是廖承志。在日本、香港和華僑事務上，他在北京與廖承志有過多年的密切合作。廖承志比鄧小平大四歲，很受日本人的喜愛。他們知道他生於日本，在日本唸完小學，又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多年來在北京接待了很多日本客人。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孫中山的重要接班人之一，1925 年遭政敵暗殺身亡。廖承志像鄧小平一樣參加過長征，1945 年成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對日本有直覺上的理解力，與日本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在中國又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無論他之前還是後來的中國領導人都難以與他相比。他是鄧小平日本之行的理想旅伴。

在參觀日本的現代化工廠時，鄧小平意識到好的技術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個國家的制度聯繫在一起。他表示有興趣學習日本的經驗，即它如何從二戰時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閉經濟向 1950 年代以來更開放和有活力的經濟轉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現代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鄧小平對於在工廠、公共運輸和建設項目中看到的現代技術也很著迷。他要想辦法將現代技術和現代管理帶入中國。日本的商人，尤其是日本侵華時期在中國住過的商人，很樂意為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

鄧小平拜會了前首相田中角榮、參議院議長保利茂和自民黨黨魁大平正芳，然後又去國會參加了招待會。當時田中角榮正因洛克希德（Lockheed）醜聞而被軟禁，很多日本人都躲著他，但鄧小平主動提出前往田中角榮的私邸拜會。他對田中說，他來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為發展中日關係做過工作的老朋友表達謝意的。他要感謝田中前首相為兩國友誼作出的貢獻，感謝他簽署了《中日共同聲明》。^[10-22]鄧小平說，田中訪華時他還在「世外桃源」裏（指他下放江西的歲月），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你為兩國關係所作的貢獻」。然後，鄧小平正式邀請田中作為政府的客人訪問中國。當天稍後，田中對記者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帶來的兩國的團結，是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喜事。他說，在他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給他的印象最深，「今天會見鄧副總理，使我有當年會見周恩來一樣的感受」。^[10-23]

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為維持日中關係發揮過作用的日本人，1978 年時多已亡故。10 月 24 日的下午，鄧小平和妻子卓琳在赤阪迎賓館招待了這些人中仍然在世的幾位和其他人的遺屬——主要是在那個困難時期與中國保持交往的已故政治家的遺孀和子女。鄧小平向他們表達了歉意，他說，他沒有時間親自去拜訪他們每一個人；就像周恩來（1917 年至 1919 年曾住在日本）一樣，他想對日本朋友說：「飲水不忘掘井人。」他又說，即使在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他們就相信兩國總有一天能實現正常邦交。鄧小平說，雖然他們不能分享今天的歡樂，但他們的努力不會被人忘記，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於兩國友好關係的史冊，激勵兩國人民繼續前進。^[10-24]鄧小平還說，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遺孀及子女，都是中國的朋友，使中國人民更加「堅信中日兩國人民一定會世代友好下去」。鄧小平然後請他們常去中國看看。^[10-25]很多聽到他講話的人都感動得潸然淚下。

這天下午，日產公司總裁川又克二陪同鄧小平，花了一小時時間參觀了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廠。該廠剛在生產線引進了機器人，號稱全世界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汽車工廠。鄧小平參觀了生產線，聽人介紹說每個工人一年平均生產 94 輛汽車，鄧小平說，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出 93 輛。他在參觀完日產公司後表示：「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10-26]

次日鄧小平再次與福田首相會面，出席了日本最主要的工商團體——經濟團體聯合會——舉辦的午餐會，稍後又召開了日本記者招待會，會見了祖籍中國的日本人，並主持了一個晚宴。出席經濟團體聯合會午餐會的有大約 320 家公司的執行官，超過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來訪時 300 人的紀錄。^[10-27]

鄧小平在中國從未舉辦過記者招待會，而他在這一天成了第一位舉行西方式記者招待會的中共領導人。來到日本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大約有 400 人。鄧小平首先談了一些國家謀求霸權的危險和中日兩國共同對抗霸權的重要性。不過，他也感覺到日本有強烈的中立主義情緒，因此他說，中國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中國為了搞現代化，其實也需要和平的環境。之後鄧邀請記者提問。當有記者提出釣魚島歸屬的問題時，氣氛驟然緊張，然而鄧小平回答說，中日兩國看法不同，對釣魚島的稱呼也不同，不妨先把問題放一放，把它留給後人，他們會比今天的人更聰明，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在場的人如釋重負，感歎鄧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最後，在回答毛澤東在文革中給國家造成的災禍時，鄧小平說：「這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錯，而是我們大家的錯，我們很多人都犯過錯誤；我們缺少經驗，缺少判斷力。」他又說：「我們很窮，也很落後。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學習很多東西。」^[10-28]

在回答有關四化的問題時，鄧小平宣佈，中國已經制定了目標，即到 20 世紀末要在四化建設上實現突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需要好的政治環境和正確的政策。「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他說，「必

須承認自己的缺點。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在被問及訪日給他留下的印象時，他對日方出色的接待表示感謝。他說，他受到了天皇、日本工商業和各界人士十分友好的接待。又說，他與福田首相進行了很好的會談，中日兩國領導人以後每年都要見面。他說，訪問時間雖然短暫，但他要讓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很希望聽到這樣的話，他的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為他鼓掌，掌聲持續了好幾分鐘。^[10-29]

一個共產黨領導人首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鄧小平具備在國內向不同的人解釋政策的長期經驗。但是他的成功也來自於他對日本國情和觀點的瞭解、談到中國政策時的自信、承認中國有問題時的坦率態度、對日本明顯的善意、輕鬆風趣的語言。此外，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人普遍認為，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標誌著一個歷史性時刻。日本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劇道了歉，並立誓幫助中國的現代化，日本人希望這次訪問能開創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新紀元。^[10-30]

次日，新日鐵社長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乘氣墊船（當時在中國聞所未聞的一種快船）穿過東京灣，參觀了新日鐵的君津制鐵所。君津制鐵所是一個自動化鋼鐵廠，僅此一家工廠生產的鋼鐵量，就相當於當時中國全部鋼鐵廠總產量的一半。鄧小平參觀完工廠設備之後，立刻宣佈他希望在中國也建一座君津這樣的鋼鐵廠。事實上，在鄧復出之前，以君津為範例的寶山鋼鐵廠已經在籌劃之中。

鄧小平乘坐新幹線「子彈頭列車」從東京前往京都，然後又參觀了鄰近的奈良和大阪。鄧在關西地區的一家飯店走過一個充滿喜慶氣氛的房間，瞧見一個穿著漂亮白衣的女子，便問那裏在做什麼，當聽說正在舉辦婚禮時，鄧問道他是否可以看一看。一對新人很高興他們的婚禮將成為國際新聞，愉快地擺好姿勢和鄧小平合影，旁觀的人都覺得頗為有趣。

鄧小平遊覽了有 800 年歷史的京都，它的城市規劃、藝術和建築皆模仿唐朝古都長安。他在那裏會晤了京都府知事、京都市長和當地的工商界領袖。然後他從京都乘專列去了奈良，這座城市也是依照中國樣式興建的，建城時間甚至比京都還要早。鄧小平參觀了按南宋寺廟風格建造的東大寺，與奈良市的官員共進午餐。

離開奈良這座古都，鄧小平又去參觀了松下公司在大阪的電器工廠，在那裏會見了松下幸之助。上世紀 20 年代松下以製造自行車燈起家，帶領他的企業不斷成長，鄧小平到訪時松下已是全球領先的電器公司。就像許多日本企業領袖一樣，松下也對日本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深感內疚，他表示願意幫助中國人改善生活水平，生產出質優價廉的電視機，讓當時還買不起電視機的中國家庭也能看上電視。^[10-31]

鄧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規模生產的彩色電視機，還看到了尚未進入中國的傳真和微波設備。鄧小平知道松下幸之助的名望，稱他為「管理之神」，並請他把所有最新技術都教給中國人。但松下幸之助接下來的解釋顯然是鄧的顧問未曾提醒過他的，松下說，像他這樣的私人企業要靠開發的技術養活自己，因此不願意轉讓最新的技術秘密。不過此後松下的工廠在中國發展迅速，也確實教給了中國人技術，並在十年之內就幫助中國實現了松下的夢想——生產出中國民眾能買得起的電視機。^[10-32]

當晚，鄧小平和大阪政府官員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已故的高碕達之助的女兒。鄧請她來是為了向她父親的貢獻表達敬意和感謝的。高碕達之助曾與廖承志合作，在 1962 年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協定使兩國得以互設貿易辦事處，並且在 1972 年中日建交之前就能進行有限制的中日貿易和新聞交流。

日本廣播公司（NHK）全程報道了鄧小平參觀工廠的經過，展示了一個精力充沛、觀察力敏銳而又自信的鄧小平。他充滿好奇和熱情，但並沒有對他看到的日本新技術一味說奉承話。如果過於謙恭的話，他可能會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責，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鄧訪日之後，中國的小學生被教導說，當記者問鄧小平對新幹線列車有什麼看法時，他給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認外國技術的價值，又沒有傷害中國人的自尊。

日本領導人在鄧小平訪日期間的言行，也對日本民眾起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多年以後，年輕人在評價接待過鄧小平的老一代日本領導人時，都將他們稱為「大人物」——這個稱呼的意思是，他們不同於後來那些陷於財政瑣事和無聊的派閥之爭的人。接待過鄧小平的各界領袖（福田赳夫首相、園田直外相、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以及公司領導人稻山嘉寬和松下幸之助）都是大膽的計劃者和建設者：他們引領著一個荒蕪破敗、不敷溫飽的戰敗國，將其建設成為一個在 1978 年時仍在快速增長的生機勃勃的國家。這些老一代日本領導人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造成的災難都有親身瞭解。他們知道日本給中國造成的破壞無法彌補，但他們希望能讓子孫後代生活在和平之中。他們願意用他們的經驗和技術創新幫助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僅僅看重自己公司的利潤。因此鄧小平在重建自己的國家時，能夠與這一代日本領導人交往，並向他們學習，因為日本從戰爭浩劫中復元時，他們自己也曾面對同樣的挑戰。

稻山嘉寬是在日本招待鄧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從 1957 年就開始向中國出售鋼材；到 1971 年，他的公司已在改造武漢鋼鐵廠、使之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僱員對他向這家過時的蘇聯式鋼鐵廠轉移如此多的技術、而不是去建新廠賺錢而有所不滿。稻山回答說，他很樂意改造這家工廠，因為 1901 年他的鋼鐵公司八幡製鐵在日本開辦第一家工廠時，鐵礦石就是從武漢運來的，他很高興現在能回報這個城市。^[10-33]

稻山信奉「隱忍哲學」，對其他公司和國家非常大度，甚至不顧自己公司的利益，他為此而受到部下的批評已不是第一次。他並不想讓自己的公司損失錢財，但他也想造福社會。他認為轉移鋼鐵技術對南韓和中國有好處，給其他國家送去這樣的禮物，與它們分享繁榮，對雙方都有利。他甘願冒著日本人所謂「自食惡果」的風險——即向中國轉移技術，然後中國會把更廉價的產品再出口到日本，損害日本國內的生產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國的市場足夠大，能夠消化中國生產的鋼材。在乘氣墊船去君津的途中，鄧小平和稻山在閒聊中得知他們原來是同年出生，稻山便問鄧小平怎麼把身體保養得這麼好，鄧小平說，因為他「只是一個丘八（當兵的人）」。^[10-34]稻山後來說，鄧小平很感謝那些願意幫助中國的人。

鄧小平希望他的日本之行能推動在中國沿海地區建一座完全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廠的計劃，一年前稻山嘉寬和李先念副總理就曾討論過這個項目。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君津鋼鐵廠，鄧小平參觀了新型的連軋生產線和計算機控制技術，它後來成為了上海以北寶山的中國第一座現代鋼鐵廠的樣板。鄧小平說，為了管好寶山，需要日本人幫助中國人學習管理技能。他還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學生做得不好，那就說明老師沒教好。」^[10-35]

鄧小平訪日之後，對「管理」一詞的含義有了更深的理解，開始更頻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時代教給他們的東西，認為西方工人受著剝削，鄧對他們解釋說，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日本工人掙的錢能夠買房子、買車、買那些中國還根本沒有的家電。鄧小平在日本不僅看到了他過去只是讀到過的東西，他還要學習日本人是如何組織工人、如何將他們的敬業精神和效率發揮到最大的——他將其總結為「管理」。他從日本之行得出的結論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產是不行的，還要提高質量。」^[10-36]百年以前，中國的愛國者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鄧小平用「管理」這個中性詞提倡學習西方，並同時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這就使他既能夠引進比技術更多的東西，又能減少中國保守派的抵制。他確實認為，社會主義也能運用現代管理，共產黨也可以提倡現代管理。

日本媒體對鄧小平訪日的報道大力渲染這次訪問取得了成功，並加強了日中關係；中國的報道則更為正式和低調，但傳遞的信息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在中國，鄧小平訪日的電影和照片使中國民眾看到了現代工廠是什麼樣子，使他們明白了中國多麼落後，要追趕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

訪日的成果

在鄧小平結束訪日之前已經安排了一個經濟代表團去日本進行更具體的考察學習，成員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主要經濟官員。由鄧力群擔任代表團顧問，團長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袁葆華，他們在鄧小平離開幾天後就抵達日本，在那裏考察了一個月。考察之後代表團寫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概述中國應如何學習日本的經濟管理。

考慮到讀報告的中共領導人仍然深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因此代表團的報告裏解釋說，日本對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員聰明地學會了如何通過激勵工人獲得利潤，他們努力工作是因為他們得到的待遇要比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剝削的工人好得多。代表團回國後，鄧力群牽頭成立了新的協會，包括質量控制協會和企業管理協會，這些都是以代表團在日本考察過的協會作為樣板的。根據考察中學到的東西，他們為各省負責經濟工作的高層幹部制定了培訓計劃，向他們講授日本的做法，例如如何調整價格使其反映生產成本、如何依據市場需求而不是主觀臆斷的指令性計劃來制定生產指標、如何依靠細緻的生產過程而不是檢驗方式來實現質量控制，以及如何利用指標來評估生產過程的績效。^[10-37]一些中國的工廠打出了標語，強調學習日本管理體系和制定培訓計劃的重要性。

鄧小平也啟動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電影、故事、小說和藝術——進入中國。比如日本的電影就很受中國觀眾的歡迎，這增進了中國人對日本人民的理解。鄧小平知道，這可以為擴大中日兩國的經濟和政治交往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鄧小平領導時期，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大為改觀。

可以說，鄧小平在為堅實的中日工作關係打基礎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他訪問日本之後，由於中國的緊縮政策限制了外國投資，有三年時間裏商業交往受到了阻礙。儘管有波折，但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裏，中日兩國繼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事實上，到 1980 年 12 月時中日關係已大為改善，使兩國能夠第一次舉行內閣級的聯席會議。^[10-38]此外，黃華和日本外相伊東正義在該月還簽訂了協議，由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向中國提供條件優厚的長期貸款。從 1979 年到 2007 年，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多於它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貸款，總計達到 2.54 萬億日元（按 2007 年匯率計算約合 250 億美元）。^[10-39]日本企業在中國各地設廠，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前身）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它利用與日本企業廣泛的關係網，尋找願意對中國各部門的培訓計劃請求作出回應的日本企業。在鄧小平時代的鼎盛期，日本在為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提供援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10-1]中國經常提到的「反霸權」一詞，最初是由基辛格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見 Henry Kissinger, "The China Connection," *Time*, October 1, 1979。

[10-2]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 50–54。

[10-3]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 47–50。

[10-4]園田直的回憶見園田直：《世界日本愛》（東京：第三政經研究會，1981），頁 174–185。

[10-5]黃華對中日關係談判的記述見 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pp. 308–342。

[10-6]據布熱津斯基說，1978 年 5 月他訪問北京後在東京停留，給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國贊成「迅速簽署條約」。他說，日本此後很快便「同意了條約」。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rev.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5), p. 218。日本在 3 月就決定加快條約的完成，但直到 7 月才使問題得到解決。5 月 2 日和 3 日福田起夫在華盛頓會見萬斯和卡特時，也討論過這些問題。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65–66。

[10-7]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3: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2nd ed. (Leiden: Brill, 2005), pp. 134–135; 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80。

[10-8]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26–27。

[10-9]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pp. 134–135。

[10-10]George R. Packard, Edwin O. 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1]一本講述鄧小平拜會天皇的日本著作十分詳細地記錄了此事。見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秘史》（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10-12]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15–209。

[10-13]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0。

[10-14]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1–122。

[10-15]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2。

[10-16]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5。

[10-17]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3–334; 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37–140。

[10-18]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4–335。

[10-1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6。

[10-2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47–148。

[10-21]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82。

[10-22]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1。

[10-23]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0–153。

[10-24]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4–155。

[10-25]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0–155。

[10-2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6–159。

[10-2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202。

[10-28]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4。（關於毛澤東的一句不見於裴著。——中譯者註）

[10-2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2。

[10-3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4。

[10-31]1979 年 6 月對松下幸之助的採訪。

[10-32]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は語る：情熱がなければ人は動かん》（松下幸之助說：沒有熱情人就不會行動）（東京：講談社，1985），頁 13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94–197。

[10-33]2004 年 10 月對 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Hanai 住在東北，當時年僅 13 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 1949 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 年回到日本，1962 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

[10-34]2004 年 10 月對 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Hanai 住在東北，當時年僅 13 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 1949 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 年回到日本，1962 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

[10-35]2004 年 10 月 30 日對 Hanai Mitsuyu, Chihaya 和 Sugimoto Takashi 的採訪。在 80 年代寶山鋼鐵廠的談判中，Sugimoto 擔任新日鐵的中文翻譯和談判代表。另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74–178。

[10-3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4。

[10-3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90–195；鄧力群：〈訪日歸來的思索〉，《經濟管理》，1979 年第 3 期，頁 7–14。

[10-38]〈第一回閣僚會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未公開文件。第二次內閣會議舉行於 1981 年 12 月 14–17 日。

[10-39]Lanqing Li, *Breaking Through: 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8–324.